

悠悠岁月 话当年

友誼叢書之三

2001年抄

悠悠岁月
话当年



友谊丛书之三

2001年抄

《友谊丛书》出版说明

砂拉越百五十多年的反帝、反殖斗争。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最为广泛、深入和持久。从斗争的形式来说，1950-1962年以地下和宪制斗争为主，1963-1990则以武装斗争为主。

1950年开始，砂拉越的革命者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以之教育和组织广大群众，终形成磅礴的赤道雨，打醒近于沉睡的大地，掀起波澜壮阔的反帝、反殖斗争。

1963年英帝关闭宪制斗争的途径，迫使革命者转入地下，到农村和边区进行暴烈的武装斗争。

有诗为证：大地惊蛰赤道雨
山林咆哮暴烈风

“赤道雨”和“暴烈风”涵盖了砂拉越全部的反帝、反殖斗争；“风雨”也表示了革命斗争的困难和险阻。

在风雨中凝成的友谊历久弥坚，浇灌了《友谊丛书》使之开花结果。这套丛书正是以多种体裁，从多方面，多角度反映这场斗争。

(4-9-2000)

《悠悠岁月话当年》目录

- 《友谊丛书》第3辑 -

《友谊丛书》出版说明

Page

目录

历史回顾

- 拉让江反帝反殖斗争简述 - 洪楚廷 1-10
北加人民游击队最后十二年的斗争 - 曾佩雄 11-24
牢内斗争历史简述 - 黄冠俊 25-34

历史片段

- 七年多重建边区基地的回顾 - 重建 35-72
血汗浇开山林路 - 雁飞 73-87
波波折折创新业 - 雁飞 88-94
民族工作的片段回忆 - 黄祥云 95-102

当年生活、战斗、经历

- 艰苦活泼的游击生活 - 红兵 103-111
边区，可爱的地方 - 永战 112-123
喜看土厂出“洋枪” - 敢攀 124-129
潜伏在地下 - 黄厚基 130-132
当年我吃在边区 - 丹心 133-138
紧张、刺激、有惊无险 - 鹏翔 139-147
赤脚军队 - 山川 148-150
火药烧死烧伤的几宗事件 - 奋飞整理 151-157
边区两场缴获战 - 老温，奋飞整理 158-160

好人好事

- 海口区传来的赞歌 - 红心 161-165
向罗丁积极艰苦的工作作风学习 - 江宏 166-169
部队的“神行太保” - 黄牛 170-172
人老志不老的红军 - 黄牛 173-176

转载

- 我看《荒山月冷》 - 冷眼 177-184
离乡65载忆当年 - 许保由 185-199

编后话

- 编委会 200

历史回顾

拉让江反帝反殖斗争的简述

(初稿)

一、非武装斗争的开展

拉让江的反帝反殖斗争，是在古晋中华中学学生斗争的带动下，以及砂拉越解放同盟的领导和组织下而开展的。

1951年10月29日古晋中华中学爆发了砂拉越史无前例的反对英帝在学校的代理人的罢课斗争。斗争由於过左而终告失败了，但它仍能带动诗巫和泗里街的华文中学生奋起而斗争。

「一〇·二九」罢课斗争失败后，学生青年有的去中国，有的消极下来，有的更坚定地為砂拉越的自治独立而奋斗。於是他们大约於1952年创建了砂拉越解放同盟，继续领导和推动砂拉越的革命斗争。

砂拉越解放同盟成立之后，不但在古晋积极吸收成员，也同时在诗巫和泗里街的华文中学生中吸收成员，并领导和推动他们去开展学校的革命活动。诗巫的中华中学、卫理中学、圣心中学，泗里街的华侨中学等，都曾出现了革命的活动。到了1957年年底，诗巫和泗里街的砂拉越解放同盟成员已有十几位，有的还留在学校，有的到了社会，但多数处於消极状态。

1955年3月30日古晋中华中学又爆发了类似「一〇·二九」性质的「三·三〇」罢课斗争。在这次胜利罢课斗争的鼓舞下，涌现了大批的革命积极份子。解盟捉紧了这个大好的时机，大力对新涌现的积极分子进行思想和理论教育，快速的把他们培养成为革命干部，并把学校里多出的干部立即派往工农运及社

会的其他领域。在短短的两三年里，把古晋社会各方面的活动都蓬蓬勃勃的搞起来。这是一种很成功很典型的工作样板。

1958年一开始，就把古晋好的工作办法，在拉让江的华文中学加以推广。在各个华文中学中发掘革命的积极分子，并努力的培养成为干部。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学运还能派出干部去掌握工运和广泛的开展了农运。到了1959年年初，古晋更派来一批民族干部，分派去泗里街河、民丹河、如楼河、达河、牛麻河和卡地巴斯等等河去开展伊班民族工作。

当1959年6月4日，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成立之时，当时的地下组织已为它准备了必须的干部条件和群众基础。可以说，砂拉越解放同盟为砂拉越人联党准备了必须的干部条件和群众基础，并推动了它的成立。而人联党的成立，也很大的促进了革命的发展。

从1951年10月29日至1962年12月8日，砂拉越的反帝反殖和争取自治独立的斗争，能够顺利和迅速的发展。首要靠的是当时国内外人民反帝反殖、争取独立的要求。其次靠的是当时革命组织的正确领导。所说的正确领导，是表现在三大政策上，即：第一项，通过大力搞好学运、培养和运输送干部到社会各方去。第二项，是大力搞好伊班民族工作。第三项，是通过组织公开政党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总之，有了革命的形势，也需要有正确的革命政策，才能有革命的胜利发展。

二、被逼走上武装斗争道路

1962年12月8日汶莱爆发武装起义。随着11日英帝殖民地政府又在砂拉越实行大逮捕，这彻底粉碎了革命者和革命群众对和平宪制斗争的美梦。多数的革命者和革命群众已确

认只有走武装斗争的道路，革命才会有前途。

1963年初，解盟提出了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任务。这个任务得到拉让江地区革命者和革命群众的热烈响应。紧接就积极进行实际的武装斗争准备工作。这些准备工作，包括广泛的宣传武装斗争思想，献捐武装斗争基金，学习军事理论，掌握军事技术，参加军事训练者多达1、2千人，储藏军事物资等。到了1964年初，有很大部分的革命者由於武装斗争还没有开展，看不到革命的前途，相继纷纷离开了革命组织，不革命了。能够留下坚持斗争的革命者，继续潜伏华族农村和城镇之中。起初隐藏群众家，受到军警追杀之后，有的挖地洞住，有的住群众的后芭坚持斗争。住进了后芭，不时受到可疑土著的干扰和军警的围捕，需刀枪自卫就油然而生。没有枪，就自己造。拿起了枪，双方遭遇时，就被逼开火还击，武装斗争就是这样的爆发了。

1967年4月，泗里街的革命者和革命群众被逼武装起来开展锄奸反特斗争。这次斗争的顺利开展，有效的恢复了大家的斗志和斗争热情，也初步的证明，我们是能够逐步的开展游击斗争的。

1967年年底，印尼边区革命武装力量已经跟我们接上了关系，传来了对武装斗争的有力鼓舞，我们也随即掀起支援边区武装斗争的热潮。

1968年8、9月间，在印尼边区武装力量的带领下，我们先后派出两批人员到边区去，大约60多位。到了就接受短暂和简单的军事训练。到了没多久，北加里曼丹人民军设在印尼马罗河的总部就受到印军轰炸，随后北加人民军总部（总部主任兼政委黄纪作，副政委贝文对，副主任洪楚庭，委员蔡瑞庆）决定留下一部分继续坚持边区基地斗争，其余大部分人员回到国内第二、三省开展武装斗争。

当时被派往拉让江开展武装斗争的人员，大部分是才到边区的新战士，小部分是边区的老战士，及带回少许的几把现代化武器，其余一切武器装备和军用物品皆要回国后，自行解决。

1968年年尾开进拉让江的武装力量，在不超过一年的时间内，相续成立了三支武工队。

中游武工队，成立时由邱亚陶（铁军）任宣委，陈天来任队长，队员约30多位，活动卡地巴斯、牛麻、南溪达、杯、加那逸等等河流。

下游武工队，成立时由黄理生任宣委，沈耀彬任队长，队员约8、90位，活动於泗里街、民那丹及诗巫的大部分地区。

OMT武工队，成立时由王连贵任宣委，纪平任队长，队员约4、50位，活动于拉让江、伊干江和达岛河之间形成的广泛地区。

每支武工队成立的时后，最重要的任务是宣传组织伊班群众，及适当的开展杀敌夺武的斗争。下游武工队和OMT武工队，还要肩负宣传组织华族群众、大力开展拥军运动和吸收新兵的任务。

在武工队的大力推动下，华区迅速呈现武装斗争的高潮，在民族区也出现了开展伊班民族工作的高潮。

武装斗争的初期，我们认为武装斗争主要须靠边区和民族区，所以每个武工队都把动员伊班群众当作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每个队员也以勇敢、热诚、不怕苦不怕死的决心和行动面对这个任务的严峻挑战。但由於队员的民族语言差，山地活

动力不强，民情地情都不熟，武器装备很简陋，也很缺乏军事斗争经验，又加上民族区群众基础弱，民族群众觉悟底，对我们很不了解，有些甚至有误解和成见，非但得不到必须的支持，反而经常受到坏群众的陷害和民防队的伏击，屡遭流血牺牲。同时还要经常吃不饱、吃不好，背重和长途跋涉的煎熬。因此，每个队员如不是有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怀，是任谁也不易经得起考验的。

为了开展伊班区的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我们也蒙受了最大的人力和物力损失。

各个武工队在开展伊班民族工作的过程中，面对的难度大，遭受的人力物力的损失也不小，除了主客观种种原因之外，在主观领导上不够自觉，盲目和冒进也是重要的因素。

在1973年年底和平谈判的前夕，拉让江三支武工队已有4百队员，并已经组织起一支约30人的战斗队。武工队已广泛活动和战斗於拉让江两岸，经受过许多大小的军事围剿，打了几场较大的仗，也缴获了几把现代化武器；还组织了武装特工队活动於诗巫市和郊区，斗争还处於高涨之中。所以当大家获知已通过谈判并签订了《谅解备忘录》时，都感到突然和难于适从。

在和平谈判的震撼之下，武装斗争低潮已提早到来。但许多革命者和革命群众还是认为有必要坚持武装斗争和保留革命的火种，并同时加强非武装斗争；还有利用《谅解备忘录》重返家园的同志，也认为只有这样做，他们才有保障。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坚持武装斗争的长期性和艰险性，所以只有留下精干才能胜任。

在过去，拉让江地区为什么会掀起一个武装斗争的小高潮？首要的是跟当时革命组织所提出的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和开展武装斗争能够得到华伊，特别是广泛华族的同情支持分不开

的。其次是跟领导这次武装斗争的革命组织和军队，具有坚定正确的服务对象、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一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也由於领导这次武装斗争的革命组织，理论水平不够和缺乏斗争经验，所以不够自觉的领导斗争，致使盲目冒进还是突出的，以致减弱了斗争的成果，付出了过多的损失和牺牲代价。

三、怎样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低潮

1974年之初，和平行动结束之后，拉让江地区留下的130多名武装人员，在北加共产党中央第二分局（书记洪楚廷、副书记王连贵、委员温贤定）和北加人民军总部（司令兼政委洪楚廷，副政委王连贵，副司令Ubong，委员温贤定）的领导和带领下坚持斗争。

从1974年至1977年9月19日，我们把留下的武装力量分成三股，一股活动於拉让江中游地区，一股活动於OMT地区，一股活动於拉让江下游地区。主要的任务是整顿和重组，搞清路线问题，探讨坚持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以坚定武装斗争的立场。在这期间，主要的武装力量集中於华区，但群众越来越多到外地找生活，许多留下的也表现消极，甚至更多向政府军警提供情报，军事上的威胁和心理战的打击都更大，队员动摇离队或驳火牺牲也不断的发生，斗争环境是更艰苦了。虽还有坚持斗争的条件，但没有灵活的应变，势必要付出更大的牺牲代价。

1974年3月9日，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主席文铭权公开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并号召重回武装斗争。

1977年9月19日决定重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大家都把重建基地当作巩固发展武装斗争的主要依托和希望，所以都以很大的决心和热情投入战斗。

重建边区武装斗争基地突击队，在刘小雄的带领下，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负重和爬山涉水的艰苦行军之后，终于在1978年2月19日抵达印尼边区的德卡兰河。同志们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劳动之中，有的同志就砍芭，烧芭，抢种远地运来的各种种子；有的打猎、捉鱼和采果子；有的还要赶回国内联络。每天不但吃不饱，而且还要抢早摸黑的苦干。很幸运，同志们到后，果子日益成熟，山猪和各种动物也日多，依靠山猪肉、果子和青菜，就吃得个个肥肥胖胖，令国内的同志感到羡慕和向往。

果子季节过了，我们的主粮靠青菜和少许肉类，体力就不足。抢种并收成金瓜、金豆和番薯等杂粮之后，才缓和了粮食的矛盾。杂粮只勉强满足了口粮的需求，但它不方便收藏和运输，不能当战备粮。于是又砍大芭种稻和伴种木薯。收成了稻和木薯，既大大的改善了生活又有了战备粮。

在这战天斗地的过程中，没有粮向森林要，没有盛东西的器具自己做，没有船自己造，没有屋子自己建，凡需要而“运”不到的东西就动手做。

到了1982年2月6日，我们经过了4年的奋斗，已建立并坚持了德卡兰基地，还另建一个后备基地，准备与来犯的印军作广泛和长期的周旋。

在印尼的军事行动中，德卡兰基地大部份藏粮，由於地面留下痕迹而被发现和烧毁。后备基地，又有一队员被捕并暴露了所有的粮仓。在反围剿期间，战备粮的大部份被烧毁。增加了不少的困难，又不能给来犯的印军予必要的回击。

从1983年3月30日至1985年12月26日期间，我们仍然坚持边区基地，生活和战备粮主要靠生产板督粉以及结合鱼猎肉。斗争环境显然更艰苦，病痛也更多，斗志已更低落，主动离队的也日多，1985年发展到了高峰。先后离队的人数约占边区武装力量的60%，成份包括高中级干部。

经过了7年多印尼边区基地斗争之后，印尼边区和国内的斗争形势已出现了新的变化。坚持印尼边区基地斗争条件已没有那么好和意义也没有那么大，重回国内边区和民族区建立基地却已具备了新条件，即基地的粮食主要可靠木山和群众供给，也更方便联络群众。因此，1985年12月26日正式把印尼边区基地撤回国内边区和民族区。

为了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和创设武装斗争的广泛回旋余地，1984年2月12日成立东北突击队，正队长俞诗东，副队长刘华荣，并在他们两位的带领下於2月18日踏上征途。突击队从出发到重回老区经历了整整3年。在这期间，面对各种心理战和8次大小的围剿，又要面对孤军作战和长途跋涉的种种困难，始终没有一个离队，也没有一个伤亡，还接触了一千二百多名各族群众，其中包括华、伊、巫、加央、肯雅等九个民族。他们有来自马来亚、汶莱、沙巴、砂罗越各省的不同阶层群众。所接触到的各方面人士中多数以友好，热情招待，并不同程度地给予支持和帮助。通过这次的突击活动，提高了我们长距离活动的能力，也创设了广泛回旋余地。

1987年，我们的武装力量又作了一次新的战略部署，即把武装力量分成两部份，一部份由洪楚庭带领坚持老区（即拉让江地区）的斗争，一部份由王连贵带领开展新区（主要指民都鲁和美里）的斗争。

再经过新老区3年多的奋斗，显示都能坚持下去，而且新区已活动到了林梦河，还吸收了几位本南族和普南族青年参

军。实际上所面对的困难也不算大，只是少数人坚持长期斗争，精神压力日益增大，斗志也日益被削弱。

1990年初，政府通过关系找我们谈判，以求和解。我方也希望通过和谈以结束斗争。通过和谈结束斗争的主要依据是：

- (1) 广大各族群众还没有参加武装斗争的要求；
- (2) 由少数人坚持武装斗争的意义已不大，这时放弃武装斗争造成的破坏也不大；
- (3) 坚持武装斗争的同志，一般也难于再承担更长期的个人牺牲。还有马共已通过和谈结束武装斗争，也起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派人去和谈。经过了几个月的反复会谈，在不损害群众利益和武装人员个人尊严与权利的情况下，终于在1990年10月17日於古晋签署和平协约，十一月三日全体五十四名成员走出森林，至此全面结束武装斗争。

四、结语

我们这场武装斗争，为什么能够坚持长达26年，有五大原因：

第一，这场斗争能够得到各族广泛同情和默许，小部分还能积极参加，是能够长期坚持的首要条件。

第二，有广阔的森林可作回旋余地，使强大的政府军难于发挥作用。

第三，领导这支军队的党，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不但以此作为团结战斗的武器，也以此作为研究和制订

政策和战略战术的思想理论指导。

第四，这支军队的指战员继承了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战斗风格。

第五，这支军队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一定程度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以上五点，就是能够坚持长期武装斗争主要根据。

这场武装斗争，为什么不能胜利也有三大原因。

其一，各民族，尤其是伊班族缺乏武装斗争的要求。

其二，缺乏国际大而持续的实际援助。

其三，领导这场武装斗争的党和军队，不够自觉和统一的进行领导。

以上三点，就是斗争不能取胜的主要原因。

从现在看，在过去武装斗争的过程中，要实行杀敌夺武的困难就不小；要实行武装夺取政权，更可以说是没有条件的。所以过去我们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只能说是实行武装自卫和武装宣传组织群众的武装斗争。

（完）

洪楚廷 于 2000 年 12 月 8 日

北加人民游击队最后十二年的斗争

- 曾佩雄-

一、“斯里阿曼”事件影响后的北加人民游击队

1973年底，“斯里阿曼”事件的消息传到正被政府军队“追剿”的马当山区的领导中心和第二中队时，引起上下全体同志的震动和混乱。

当时的领导人提出根据个人自愿选择，要参加“斯里阿曼”或坚持斗争。经过数月，反复开了大小无数次会议，由各自决定，最终剩下五十一人要继续坚持武装斗争。

五十一人中男的占29人，女的占22人。属北加的29人；属西加的22人，数年后在印尼后方联络一位属西加的地方工作者，这样总数算是五十二人。

五十一人的队伍，从总体讲是弱小的队伍，不精干的队伍，更加严重的是不够稳定，还处在波动中的队伍，只有极少数干部和战士坚决坚持武装斗争，就算这少数人是坚定的，但对“斯里阿曼”事件后的形势和武装斗争的艰苦性、长期性、复杂性的估计是很不足的。因此可想而知，这样的队伍要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是危险且困难重重的，稍微处理不妥当，随时都有可能散掉。

当时我们本来打算再要求政府方面能够延长“斯里阿曼”结束的时间，好把那些还想回返家

园的成员安排出去参加“斯里阿曼”行动。谁知杨祖国战友等返回联络我们时，政府的军队就随尾追到。我们当时，根本就没有时间再犹疑不决了，及时撤离险地，转到较安全的地方去。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危急！形势迫人，我们只有横下一条心，继续坚持战斗下去。

二、主要在国内活动(1974年中至1980年中)

要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下去，当时我们成立了一个领导核心，领导这一支部队。

1. 核心领导组成员：曾佩雄、潘瑞清、杨祖国、黄元兴、官木荣。

职务分配：总负责曾佩雄、副潘瑞清。
军事工作：正杨祖国、副黄元兴。
后勤工作：正潘瑞清、副官木荣。
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财政工作，由曾佩雄兼任。
马当、石角、十哩的二支小队由杨祖国负责。

2. 分成四支小队：

十哩地区	一小队 8 人。
马当石角地区	一小队 13 人。
马当山区	一小队 16 人。
伦乐印尼边界	一小队 15 人。

3. 为了继续坚持斗争，我们领导组提出“保存自己，争取群众，坚持武斗”的目标，实践的结果我们办不到，也坚持不了。

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巩固部队，稳定部队的思想情绪是首要任务。当时我们要求和安排所有的干部和战士们，通过集体与个人反复学习文铭权发表的《声明》，还编写了有关毛泽东对共产党、武装斗争、战争与和平、群众问题、群众路线、艰苦奋斗等论述和语录，供大家学习，同时还出版《革命》刊物和《战斗》小报供大家阅读。规定时间让大家收听北京电台、解放军之声和马来亚革命之声。希望通过这些学习，能稳定内部情绪以达到巩固队伍，坚持斗争。

4. 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的进攻对我们的压力是强大的，也算是前所少见的，他们企图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我们剩下的武装力量全部消灭掉。

⊙首先随杨祖国战友返程就发动追击行动，想在我们未能稳定立足之前消灭掉。第一招不能得逞，接下去的军事行动是频繁和反复的，是前所未有的。他们除了出动正规的军队之外，还特地组织了由边防队、民防队和叛徒等所组成的所谓“反共突击队”，甚至把军人伪装成普通群众对付我们，还使用了所谓反游击战术。

在群众中还布置了暗害分子，还使用了“拉出去打进来”的政策，一有情报、密告，一发现有蛛丝马迹，就马上发动军事行动。

在马当区除了设炮台，白天夜间打大炮进行心理战外，还动用直升机，一个小小的马当区就有六十个以上的直升机场（壮观的）大

小山垄，大小河流，甚至小山沟都有政府军队搜索过的痕迹，有些地方是反复搜索的。

⊖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攻也是少有的，特别是心理战，强迫家属，亲友等上台呼吁，还印刷大量的传单《新生活》《新闻简报》等等在群众区，在马当山区和伦乐印尼边界等地散发。

5. 群众的大变化。“斯里阿曼”事件给群众极深极大的影响，政治部的压力也是极大的，特别是使用拉出去打进来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能坚定积极支持我们的群众少得可怜，多数是采取观望的态度，还有少数或同政府合作并与我们对立。

因此，我们在群众区活动，想争取教育他们，有不少的群众却是反而劝我们出去，不要浪费时间和生命，可见要争取群众不是容易的事。群众之间相互不信任也是极其严重的问题。我们本身又没有一个熟悉群众，搞地方工作的干部。

6. 面对上述情况，队伍的经济和粮食来源就成了大难题。在马当山区活动的小队，时有缺粮的危险，特别是后期，玉米成了主粮。在干部战士心里，出去解决粮食一次，就是准备打一场仗！出去同群众区活动的小队联络也是要准备打仗！

7. 在国内六年的时间里，我们在开展群众工作方面可说没有什么成绩。队伍损失过半，仅仅剩下21人。

- ① 1974年到1976年初，在十哩、马当、石角地区的二支小队全垮了，6人牺牲，13人脱离队伍。
- ② 马当山区(1976-1979)有七位牺牲(二位在群众区石角)，2位脱离队伍。
- ③ 伦乐边界(1975-1976)有2位牺牲，1979年1人失踪。

8. 六年来，我们的生活是很艰苦和危险的，我们完全是处于动荡和被动中，我们靠自己坚持斗争，有如茫茫大海中失去灯塔照明的一叶扁舟。在危急困难的时刻，谁不想得到领导上的指示。六年来，我们也想尽办法，尽了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同领导上联系，但都得不到回音。

三、印尼境内活动：(1980年中 - 1986年中)

为了摆脱被动、被消灭的危险，我们决定转移到印尼境内去立足。

当我们还在马当山区活动时，我们就曾安排一些战士同他们一起寻找地点，熟悉那里的地理环境，并做了一些准备转移去的必要布置工作。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断的侦察、了解、熟悉和比较，我们就决定选“沙龙芭”为立足点，建营地。从这里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没有事先的思想准备和实际工作，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安全，和不仓促地把队伍转移到这陌生的新地点。

1. 基地选择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沙龙芭”做基地呢？

- ⊖它是中间地带，这里到国内，去印尼后方，去伦乐边界的丹绒拉督，算是较中间的地方，对工作较为方便些；
- ⊖它是沼泽地带中的小山丘，几乎是无人活动的地方，利于隐蔽；
- ⊖它离砂印边界线约一天路程，平常马印军队极少会搜索和巡逻到这些地方；
- ⊖普通的达雅人几乎不会到这里来打猎，只要我们不暴露，注意清除痕迹，这样的点比较安全。

2. 粮食的解决

来到印尼境内，军情不紧，面对最大的实际困难是解决粮食问题。粮食能得到解决，印尼边界境内活动和立足是完全可能的，否则就根本无法生存和立足。自古军事家都有这样的说法，“兵马未到，粮草先行”，而我们的现实情况是，转移到此，每个人除了随身的背包之外，能够负重背的粮食也不多，就算极其省吃，也顶不了二个月。面对着这生疏的茫茫的原始森林如何长期立足，坚持斗争下去，摆在每一个干部战士面前，确实是一个伤脑筋的大难题。幸好上下团结一致，发扬敢于奋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怕牺牲的精神，终于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创造出自己的新天地。中国的工农红军能吃树皮、草根取得长征的胜利；陕北延安，能丰衣足食，靠的是南泥湾的开荒，发展大生产。中国红军能，我们同样是革命的军人，为什么不能！有了这样的信念，有了这样的要求，我们就是主要靠着一支枪，一把刀和坚韧的意志力而艰苦的奋斗下去！

谈起解决粮食，就是向森林要粮食，向自然开战。

要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不能仅仅靠打猎、捉鱼、采集森林中一切人所能吃的东西，更主要是要砍芭进行生产。要生产出粮食，最快要数月或整年的时间。但在眼前这一段时间内，确实是很难渡过。

这初期的整年里，一，由于我们不熟悉地理环境，那里有河流可以捉鱼，那里有猎好打，什么时候是果子季节，分布情形如何等等都不很清楚。想要打猎，有时几个月都打不到一只小猪，一年内只能猎获几只；捉到的鱼只也极少，要找“利蒙”也没有几棵可砍，看起来这里确实是个穷森林。二，匆忙砍得二块小芭地，在雨季时，费了很大的气力，烧不好；赶紧种下的番薯、木薯、菜类等，以为会有好收成，以便于减轻难关的渡过，但实际上确实令人失望，番薯不结薯，苗藤向天望，我们都称它变为“望天神”；木薯却黄黄不长高，连叶都难吃，谁还敢指望它生大薯。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只得采集“海柳树叶”找“猴头”（蕨类）种达雅菜来充饥。这些东西吃多了，实在是脚软软，脸脚浮肿，有时头昏昏。

我们极其缺粮，营养不良，身体很弱，但是，我们不能停下来休息。我们要寻找粮食，还要砍芭生产。回想当时，我们走路脚飘浮，肚打鼓，头冒汗。我们要砍倒一棵像人头大的树都要休息几次，身上要冒出几次的大冷汗。出外打猎的战友，经常饿着肚子出，还要设法猎物回呢！但是，我们毕竟没有屈服倒下，我们毕竟是能够渡过最艰苦的二年。

经过约二年的努力，艰苦奋斗，我们大胆地和小心地在印尼境内的“幸地末”河的两边砍了大大小小七块芭。在这些芭地里，我们种了山稻、水稻、薏米、玉米、木薯、番薯、芋头、南瓜、达雅黄瓜（地文）、花生、赤豆、芝麻、甘蔗、黄梨等等，应有尽有。为了保障农作物有好收获，我们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把芭都围上篱笆；有的篱笆有意的留下缺口，布下陷阱，捉野兽。

在此值得提到的是，我们不会忘记“凤凰岭”（自取）的小队，他们最先到伦乐印尼边界活动，他们也砍有几块小芭地，他们是我们的先行者，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启示。

一年后，我们的生活逐渐改善，二年后我们迎来了大丰收。就这样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3. 储藏

农作物有好收成，不等于问题全部解决了，要知道我们是处于军事斗争的环境，是处于森林生活的环境。只有把大量的粮食储备好，才算是较安全可靠和有保障。

收割了稻，晒了谷。我们用自制的木磨，磨出米，除了日常的吃用之外，大多数都储藏起来，做战备之用。

木薯可以收成了，要晒成木薯干，才能收藏，没有及时做成除了老、坏变质之外，还要遭到野兽的破坏。因此我们想尽办法，尽快收成。为此我们自制了绞木薯的工具，这样可以减少人力，加快速

度，绞好的木薯碎，又用较重的木桐压榨它的水份，这样较快晒干。

谷磨成米，木薯干晒好，我们用已锯好的木板，钉成箱，加上塑胶袋，装好密封，运去仓库储藏。

甘蔗，除了吃之外，就自制木较，较蔗汁煮成蔗糖，便于吃用和储藏。

我们当时所储存的粮食是足够的，米、油、盐、糖、肉干、鱼干都有。一直到我们离开森林时，还存有相当的数量。

4. 食盐

食盐，我们吃用不多，但又不可少。但要我们长途到群众区去解决一费时，二有危险性。斗争的实践教育了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前人固然可以海水晒盐，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海水煮成盐呢？我们活动在“凤凰岭”的战士们决心去实践，突破这一难关。结果成功了，战士们终于第一次尝到了自己煮成的带有一点苦味和不够洁白的盐块。经过多次的实践，终于煮出了有如市场卖的卫生盐。

回想起来，想要吃一小汤匙的盐可不容易。夜晚到大海边拿深远一点的海水，担心碰上印尼的巡逻兵，沙滩留下痕迹大，难清除，内河拿水，盐量少。加上煮盐选夜间，燃烧木材要很多。不要看一小粒的盐，这是战友们的辛劳汗水所换取的。

5. 打猎捉鱼

最初由于我们不熟悉地理环境，不懂得各种果子的季节和分布情况，也不太懂得山猪活动的规律，所以猎获不多。随着不断总结经验，熟悉各种果子成熟的季节。我们每年随便都可以打到二、三百只山猪。因此，我们在后期肉类完全不缺乏。在守猎的季节，就把山猪肉当主粮，各自能吃多少就多少，喜欢吃什么肉，由各自选。

山猪肉除了当粮食之外，我们还把猪肉炸成干肉脯。山猪脯和山猪油，除了储藏在仓库里，就用塑胶桶密封，深埋在我们活动路线上的泥土里。要吃用时，才去挖，二、三年或更久都不会坏。

捕鱼比打山猪来得容易些，只要知道那一条河流有没有鱼？有什么鱼？加上天气就行了。鱼具多用鱼钩、网和“鱼笼”，吃不完的鱼，我们多数是烘干，储备起来。

后期，我们才真正知道，原来这里的有些河流的鱼，多到你不敢置信。有一次我们有五位战友去捉鱼，做了两个鱼笼，傍晚放在小河里，隔天早上去取鱼，谁知两个鱼笼几乎要进满鱼只。这些四、五寸长的“沙鲁旺鱼”，战友们只得把它烘干。仅仅装了四天鱼笼，烘干了数袋的鱼干。原先认为是穷山区，原来是鱼肉之乡！

6. 果子季节

果子季节，是打猎的好季节，也是粮食来源的季节。在这茫茫的原始森林中，生长着不少的果树；尖必腊、淡沛、青兰、山红毛丹、仁打安、黑橄榄等等以及不知名的果子。

尖必腊果在初期粮食不足时确实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我们曾经把它当主粮，从它小小粒没有肉直吃到它成熟掉下地。谁也数不清我们吃了多少、采了多少？我们只知道它好吃，富有维他命。

我们也曾把它的种子，煮熟烘干当粮食以及储备起来，但不耐久藏，容易变质坏掉。

烘干的尖必腊肉，确是香甜可口，另有一番滋味，不能多吃，因为它太热了。

我们把淡沛和青兰煮成果汁当饮料。

7. 政治思想教育

这里不多谈，大家都熟悉这个问题。

在印尼境内六年的时间里，除了进行劳动生产，空余的时间不少，我们就安排进行集体学习和个人学习，大家都学了不少的毛泽东著作和语录。

定期开组织会议，庆祝会和谈心会等。

定时收听北京电台，解放军之声和马来亚革命之声等。

8. 在印尼后方建立“点”

从八一年到八四年间我们先后派出数人（多数是西加籍）到印尼后方去。他们在不同的地方立足，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出现和生活，并搞到印尼的合法身份证。

由于我们部队在85年中有一位脱离队伍的成员，向政府透露，我们部队有派人到印尼后方去，引起印尼情报部的注意，并采取行动，而导致1986年我们在印方全部人员都被捕。

9. 谈判走出森林

印尼的西加情报部逮捕了我们九位干部和战士后，当时他们的局长，特地找潘瑞清等商谈，要潘等同他们合作，想办法同我们联络，尽量说服我们放弃武装斗争，回返家园，结束西部这场武装斗争，对大家都有好处。假设我们愿意谈判走出森林，依谈判条件全部人员一样处理和对待。

潘等的意见，认为我们只剩下十人，继续坚持斗争下去，困难重重，意义不大，也不是办法，不如一起谈判出去，但主要看我的意见如何？因此潘等就同西加军事情报局长建议，用我们自己的人员回森林去联络，印军不要跟去，较为方便和妥当。印方同意，依此做法，在联络点联络上我们。

我们得知情况后，马上召集干部、战士开紧急会议讨论，讨论结果，几乎全部战友都认为，再坚持斗争下去，意义不大，同印方谈判，同意结束武装斗争。实质上大家都明白，我们根本没有条件和本钱同印方谈判。

随后，大约是1986年6月时，我同印尼西加军事情报局长谈判。

西加军事情报局长表明，要我们放下武器，结束西部这场对抗斗争，希望我们回返家园过和平

生活，生活上和医药上他们会照顾。他欢迎我们在印尼居住，会公平合理对待我们，如同他们的人民一样。

我方提出：

1，印尼政府要保障我们全体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

2，让我们自愿选择马来西亚籍，或印尼籍，并成为该国的公民，同时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

3，印尼政府应给予我们足够的在生活上、医疗上的经济照顾；

4，印尼政府不能逮捕和迫害部队成员家属和亲属，以及过去同我们部队有来往的群众。

最后西加军事情报局长表示接受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并按照会议商定尽力去做。只有原来属于西加出生的成员，应属于印尼公民，不能选择马来西亚国籍。

谈判结束，我们剩下的全部10位战友都回返家园。西部的武装斗争到此就结束了。我们西部继续坚持了十二年的武装斗争是完全失败了，人们要如何看待和评估，就由他们自己去，一个人参于革命只要问心无愧就是了。

牢内斗争历史简述

黄冠俊於2000年12月

随著反帝反殖斗争迅速高涨发展，特别是汶莱人民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进行武装起义，促使英帝国主义在北加三邦的统治根基起了严重的动摇。英帝从过去的驱逐、限制居留反帝反殖人士，到彻底撕破其假民主的面具，于1962年12月11日在全砂劳越各地同时进行大逮捕。当时许多在政党、工运、农运、学运以及其他战线上的活跃者，都纷纷被捕下狱。那些漏网之鱼，不是转入地下，就是越过边界到印尼去，参与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监牢这条战线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我们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被敌人逮捕而囚禁在监牢里，我们之中除了少数是来自同地区的战友互相认识外，大部分是素昧平生，互不相识。但是由於反帝反殖这个共同的目标，把大家的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牢内这条战线之所以能够建立的最根本的基础。

我们被扑后，最先被关在各省的监狱里，不久就陆续被送到古晋三角坡中央监狱。我们在古晋中央监狱楼上，被关了三个月。监牢这条战线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陌生的，我们既缺乏实际的经验，也没有从书本上获得间接的知识，所以在这三个月时间里，我们尽量了解周围环境和监牢制度，它对我们实施的所有法律条文，以及我们的活动空间。在牢外的时候，我们都是革命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和生活，而今在那艰苦与非常的环境里，我们是多么渴望和等待革命组织来接我们的组织关系，来领

我们的斗争。但事与愿违，我们痴痴地等了三个月，始终没有任何的动静。后来才发现，其实当时的我们与关在一起的人之中，就有一位是革命组织的牢委，本来他可以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担负起牢内的领导工作。然而他在牢内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他不仅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反而起了不少破坏作用，甚至最后竟走向对立面，为虎作伥。俗语说：真金不怕烘炉火，是真金是粪土，在革命斗争的炉火中，显出真正的面目来。

三个月后，我们男同志被迁移到古晋对面江临时集中营，那是由警察宿舍改建而成的。到达那里后，我们对整个形势作了评估，从武装斗争的迅速发展速度和阶级斗争的空前尖锐来看，我们纠正了短期就会被释放的错误想法，也消除了革命组织会派人来领导我们的幻想。为了准备长期坐牢，我们的著手部署建立牢内战线，以配合牢外的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的需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进行了下面几项工作：

第一，建立领导核心小组

不言而喻，我们之所以会被英殖民政府逮捕，是因为我们在外面的时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反帝反殖斗争，争取祖国的自由解放，而这个斗争是在革命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在牢内，我们也很想建立像牢外那样的组织系统，但在那样的环境里，我们是完全无法实现我们的愿望的。我们只好把条件放低，把各省来的朋友以省为单位，以反帝反殖的革命者的身份组织起来，然后从各省派出代表生一个领导核心小组，而这个小组是秘密的，是牢内的最高领导小组。

一九六六年后，我们男女政治拘留者，全部都被监禁在六哩集中营。牢内的生活是集体生活，虽然我们被监牢当局划分为许多等级，分别关在不同的座，而男女政治拘留者，又被关在不同的地方，（共有A, B, C, D, E, F, G, H, I, J, K, A2, K2, M等座），男座每座平常人数大约一百多人，女座最多六十四人。为了照顾大家的日常生活，也为了方便与监牢当局交涉，我们决定要有一个公开的小组负责领导各座，於是各座公开选出代表，有总务、体育、文艺、书报等，组成一个公开的领导小组，处理座内的日常生活问题。而公开小组则是属于秘密小组领导之下。

在牢内，我们始终坚持以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互相结合的组织形式展开工作，仍然以秘密为核心，秘密领导公开作为组织的基本指导原则。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保证了牢内领导核心小组没有被催毁，直到斯里阿曼后牢内阵线崩溃为止。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要在条件极其恶劣的监牢里建立起一条新的战线向英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展开斗争，就必须建立一个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的领导。因此在牢内建立革命组织，是牢内革命斗争的先决和必要的条件。

建立革命组织不仅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而且也是我们长期追求的目标之一。成立一个秘密的领导核心小组，这是牢内组织建设的第一阶段。

我们之所以以省为组织单位，主要是从各省来的人，彼此比较认识，在牢外时他们有许多还是同一地下秘密组织关系里的人，大家曾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过的，有的虽然没有相同的地下秘密组织关系，但却是公开工运、农运或者是学运的人，大家都有一定的认识，有基本的信任基础。但以省为组织单位，在长期的牢内生活中却也同时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最明显的莫过於以省为界线所形成的宗派主义思想。所以在牢内组织建设的过程，始终是与宗派主义思想斗争分不开的。这些矛盾有时是表现在现在对敌斗争上，有时是表现在生活问题上，有时甚至在体育场舍上也表露无遗。幸亏经过了几场轰轰烈烈的对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牢内领导小组开始在战友中逐渐建立起威信，加以牢外武装斗争也在国内迅速蓬勃地开展，牢内外取得了联系。这时我们决定开展一场思想整风运动，打破了省的界线，清算了山头主义，纠正许多错误思想，为在牢内建立党的组织而铺平了道路。

第二，进行思想教育

牢内政治拘留者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对现实不满，当革命形势处于高潮时，他们都热烈地参加革命斗争，但当革命形势趋向低潮，特别是处身於困难和危险时，他们的不革命思想便会油然而生。为了建立牢内这条战线，更重要的是在长期尖锐的斗争中能坚守阵地，不被催

毁，并为长远的革命事业的需要，那么进行思想教育的工作便是为了完成上述任务的重要保证。

在进行思想工作方面，首先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们发动大家学习毛著作中的《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百求恩》。我们以秘密和公开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学习和落实，通过学习，检讨和批评斗争，牢内精神面貌和生活内容都焕然一新，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其次，在学习《老三篇》的基础上，我们提出破私立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及自我革命等等运动，而每场的运动从酝酿、落实到检讨，都高潮叠起，触及大家的思想灵魂，对大家的思想改造起了巨大作用。再其次，我们发动了一场牢内思想整风运动，除了学习《老三篇》外，再加上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以这五篇毛著作，作为理论标准，批判当时根深蒂固地盘踞在牢内的宗派主义思想，主观主义思想和左右倾思想。思想整风，为牢内统一领导，准备建立党组织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第三，丰富生活内容

大家都知道，在那漫长暗无天日不自由的监牢生活，如果缺乏生活内容，那是很难挨下去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们把牢内变成一所大学，把每天的时间编排得结结实实的。在公开方面，我们开办语文学习班，如学习马来文、英文和华文，文学创作，音乐以及其他专科知识等。我们也安排每天早上和傍晚锻炼身体，以备将来冲出牢笼后，能为革命献身。此外还轮流值日，负责座内卫生和膳食、种菜等工作。总之，在那失去自由，处处遭受迫

害折磨的漫长监牢岁月里，大家的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内容不但丰富充实，而且充满革命的气息，因为我们胸中充满著革命的理想，希望做好一切准备，有朝一日冲破牢笼为革命干一番事业。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理想和目标，使大家都积极乐观地面对一切严峻的挑战，准备坐穿牢底做为第一个目标，回到自由世界，为革命献身是我们最终任务。

第四：统一战线

导师说，“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牢内的领导就是按照这个教导来进行工作的。十多年中，我们竭尽所能，在牢内进行组织建设工作，以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长期、艰苦和曲折的牢内斗争。我们也把全体牢内的战友，当作是一支军队，虽然我们手上没有枪，但我们要把这支队伍锻炼得像军队一样，必要时可以上刀山下火海。当然我们也在牢内搞统一战线的工作。记得当年我们提出要在牢内搞统一战线工作时，就有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这四面高墙，即使是战友也被重重隔离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什么条件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呢？经过深入研究分析后，我们认为凡是有人的地方，都可以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的。首先，在战友中，还有一些是民主人士，有的是不同组织的反帝反殖人士，比如初期时还有印尼国民军，马来族反帝反殖地下成员，这些都是我们应该争取和团结的对象。其次，在牢内看管我们的狱卒，为我们煮食的刑事犯以及在某些官员，也是我们统战的对象。再其次所有战友

的家属，社会人士，政党里开明的资产阶级份子，也是我们要争取团结和教育的对象。

事实证明，经过长期坚持进行统一战线的工
作后，我们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首先，我们争取
到了少数的狱卒，并把他们发展成为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也争取到一些在集中营里煮食的刑事犯，
通过他们的帮助，我们打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首
次把牢内各座联络起来，使牢内各座有了统一的领
导。牢内之所以能够在非常恶劣的环境里发动四场
无限期绝食斗争，以及无数次的有限期的绝食斗
争，就是因为我们长期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结
果。同时，我们也不间断地在会见家属的时间内，对
众多家属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教育工作，使绝大多
数家属能够与我们站在同一战线上。因此一旦我们
发动绝食斗争，我们的家属都坚决地与我们站在一
起，做为我们的后盾，在牢外也开展斗争，形成一
波又一波的牢内斗争与牢外的群众运动联成一气。
我们的斗争也成功地争取到开明的资产阶级人士的
支持。所有这些都与长期坚持统一战线的工作分不
开的。

第五：正确的路线与政策

“革命党是群众的响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
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革命党之所以会领
错路而使革命遭受失败，就像我们的组织那样，主
要是所执行的路线、方针以及政策是错误的。是的，
在十多年的牢内斗争中，应该承认的，我们犯过了
不少错误，如以省界线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
误，脱离实际的左右倾思想的错误，以及其他许多
小资产阶级思想，好像自私自利，名利思想，个人

英雄主义思想等等。但从总的方面来看，牢内所执行的路线与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大方向是对的。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牢内这条战线才能在那漫长的岁月中，继续存在和发展。监牢是一个特殊的环堵，我们不仅失去了自由，还被分隔成许多小部，彼此互不来往，无法沟通。我们虽然都有一颗炽热的反帝反殖的心，但大家不能生活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构成一股力量。从总的方面来看，敌人是集中的、强大的、主动的、进攻的，而我们却是分散的、弱小的、被动的和防御的，这是牢内敌我矛盾的特点，这个矛盾的特点规定了，我们的战略只能是防御的、被动的，但在“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原则指导下，在策略运用方面，有时我们也是采取进攻，好像9.9与6.6两场无限期绝食斗争，都是配合当时有利的形势情况下，进行策略进攻，结果在各方面充分配合下，取得了胜利。无论如何，由於整个形势的规定了，即使我们当时的斗争是进攻的，并取得辉煌的胜利，然而策略的进攻仍然是为了战略防御这个目的服务的。长期来我们都是有这样的路线和政策指导下，进行工作和斗争的。只有2.9绝食斗争，由於当时K座战友无法掌握牢内对敌斗争的政策的精神实质，在不利的形势下爆发这场斗争，违反我们的路线和政策，失去了一切的主动权以至这场斗争只能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草草结束，给牢内斗争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

总之，牢内的路线和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如果不是当时斯里阿曼事件的出现，牢内这条战线是不会崩溃的。

暗房 - - - 地狱里酷刑场

牢内这个人间的地狱，如果不是为了实现人类崇高的理想，即使叫你在里面呆一天都觉得太久了。但我们的朋友却为了崇高美好的理想而在牢内坚持了十多年。在那十五年失去自由的生活中，所面对的考验是巨大的。牢内生活，除了面对长期的自由的煎熬外，当绝食和其他对敌斗争时，还要遭受肉体和精神巨大痛苦。人是万物之灵，长期的牢内生活也要面对感情和欲望折磨。在牢内斗争中，暗房的严刑酷打是极其尖锐的考验。所谓暗房，就是敌人榨取情报的秘密地方，当他们需要情报时，就会利用各种恶毒的手段，包括各式各样酷刑，欺诈、诱惑，无所不用其极。王仰仁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壮烈牺牲的。如果你说监牢是人间的地狱，那么，暗房就是地狱里的酷刑场。

“斯里阿曼”对牢内的冲击

正当牢内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思想整风后，正准备积极开展建党的工作时，牢外发生了斯里阿曼事件。当时牢外通知我们，革命组织在政策上作了巨大的改变，从今以后放弃一切斗争，恢复和平生活，从事国家建设。牢外要我们自己和监牢当局谈判，争取出牢。这简直是在牢内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大家都傻了。大家议论纷纷，六神无主，到底革命组织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将何去何从？

是的，当时国际方面正吹袭修正主义的风，国际工人运动出现分裂，这是不利的因素。但在中南半岛、越南、柬埔寨及寮国的人民正在进行激烈的抗美战争，而且胜利在望。中国正在日益强大起

来。在国内武装斗争也在继续发展著。牢内虽然走向暂时低潮，但大家正在作好思想准备，坚守岗位，迎接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不论从实际的情况来研究分析，从理论上联系，都不可能理解“斯里阿曼”出现的根据，我们万万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斯里阿曼”的事件。因此我们通知牢外，那是阶级投降，是错误的决定，我们认为一个人一把枪都不是可以交出去，否则对不起广大各族人民，我们将不是历史的罪人。但我们能做什么呢？“斯里阿曼”毕竟已经发生了，许多人已经陆续从森林里走了出来，数以百计的枪支已交出并被销毁，整个形势已成了定局。

牢内的战友们经过了剧烈的思想斗争和感情挣扎后，牢内出现分崩离析，十多年辛苦建立的牢内战线终于崩溃。

总之，牢内战线的形成、斗争与发展，都是当时历史时代的产物。据统计，十多年来，超过万名的反帝反殖人士被逮捕。北加牢内斗争具有自己的特点与风格，这是世界其他国家的监牢所没有的。

历史片段

七年多重建边区基地的回顾

(1977-1984)

- 重建

一、重建基地

在77年9.19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在重建边区基地政策的推动下，我们在会议之后，第一支队立即组织了一小队的突击队再上边区建立基地。当时主要负责人是刘小雄支队长，成员有征远、志明、爱国、毅坚、耀武、立武、学英、连英等同志。在刘支队长的带领下，经过同志们的艰苦奋斗下，终于在78年2月19日于Sg. TEKALANG重建了边区第一块基地。

万事开头难，重建基地也是艰苦的，一切都得从头干起。然而突击队的同志们怀着殷切的期望，决心尽早把边区基地重建起来，他们不怕疲倦地工作，长途的运输，爬山涉水的远征，面对的困难也一一的克服。在路程中虽然部分同志与敌方驳了火，但仍然斗志昂扬向南方挺进，奔向那响往的边疆。

TEKALANG的水哗哗响，周围的雄山峻岭更是引人入胜。花果山蜂蝶招舞，果树上结满了清甜的青黄红绿的果子，处处皆有，恰好这时是果子大季节，吃得同志们笑口常开，游荡花果山，真是忘记了远征的劳苦。在满树果子的橄榄树上“老兄”（猩猩）在吱吱打招呼。长颈的鹿儿一双双，一对对在鹿湖悠闲的游荡喝水。林中王的野猪更是成群结队在果子树下团团转，漫不经心的吃着它们的口粮，每条猪都吃得圆滑而肥胖。而那顽皮的猴子更

SARAWAK (砂罗越)

砂印边界

S. Pait

S. Rajah

2.19 点

8.26 点

S. Piyang

S. Kanjau

S. Tekalang

S. Dadioe

1.12 点

INDONESIA (印尼)

1978 - 1986 年重建边区基地的范围

是令人乐趣，蹦蹦跳跳看见林中来了不速之客，伸长颈，张大眼看个不停，有时跳来跳去吱吱咕咕不停的叫，好像在欢迎同志们跳起欢迎舞。这样的美景，就更使同志们坚定了建设基地的决心，要把这美丽的边疆，建设成更加使人响往的边区基地。

由于路途的遥远，运输的困难，同志们的生活是困难和艰苦的。然而林中果、山中肉就是我们的很好口粮。住在山中就要会利用森林，才能生在其中，乐在其中。同志们收集果子，打了山猪用来解决当时吃饭问题，使到有更多些时间投入开辟园地，进行生产。同志们把果子晒干、烘干以备急用。为了解决贮藏的问题，同志们砍树做成船来装油，把猪肉烘干，或炸后装在油里浸，以便长期食用。突击队的同志们就是这样利用森林，利用双手丰富了生活，使到同志们吃得胖胖的。每一次与国内联络，都使国内同志感到鼓舞和响往，这就是当时重建边区基地的生活写照。

在当时的生产方面，由于各方面的因素，园地只开辟4块，平均每块大约一依甲左右。主要是种些木薯、番薯、菜类等。园地小，加上是新地种东西是很慢且不容易的，就如种出来的菜是很“窈窕”，长豆像铁线那样细，这些都很不理想。为了突破生产关，刘支队长带头搞科学种菜，仔细观察研究，要怎样使长豆长得肥又大呢？他挖开泥土，研究其根与土壤等，发现了长豆的根不能正常生长，这可能与土壤有关，于是他把长豆周围的土壤拨开，加上粪便及火烧土。经过栽培，长豆果然茁壮成长，长出了丰满且又长又大的长豆。其他菜类也是如此，特别是番薯，起初只有乒乓球大，后来土地经一段时间日晒及加工管理，产量得到较好的提高，这就大大有利于同志们解决吃的问题。

1978年7月洪书记率领一部分同志支援边区基地。在洪书记领导下，先后又开辟几块园地。其中稻芭生产地和8.26生产地都有收获不同程度的战备粮。由于重建边区基地，我们的底子是很薄的，一切战备物质少之又少，特别是战备粮几乎没有。为了更快突破战备粮，我们开展了“加强战备运动”。运动的开展，使同志们更加斗志昂扬地辛勤劳动。在同志们的艰苦奋斗下，边区基地有了初步基础。为了纪念重建边区基地一周年，指挥部发出苦战一个月迎接2.19的号召。一时同志们的斗志更加旺盛，各个组都异口同声表示要以实际行动迎接2.19；运输组同志表示要搞好运输；菜园组决心多种青菜；打猎组要多打猎；营地同志表示要搞好营地卫生迎接2.19。文娱组同志为了表示对2.19的纪念编了《光辉的节日2.19》的革命歌曲，歌中歌颂了光辉的节日、战斗的节日2.19。“前进的明灯，引路的红旗，想起2.19，斗志更昂扬，要用物质和政治的双丰收迎接2.19，让基地生活更美好。”

节日来到了，人民军总部更是焕然一新，各工作组都带着喜悦心情回到总部，更使总部热闹非凡。青菜组送来了好几“拉龙”的长豆、萝卜、山东大白菜等等，打猎组背来了猪肉（猪、鹿、狗熊和猩猩等），钓鱼组带来了几十斤重的白鳞鱼（SEMAH）。由于各组都带来了丰富鱼、猎、菜，因此营地更活跃和热闹。这边在烧肉，那边在切肉。炊食组同志就更忙，这一碗是红烧扣肉，那个是猪排，内脏炒酸菜，猪脚炒萝卜。这个酸，那个辣，这一盘，那一碗，共煮了十几种，样样美味可口，使同志们吃得津津有味。做糕组的同志也不逊色，做出至少十几种美味可口的基地糕饼。再加上甘蔗水煮的红豆汤，薏米水，就更是十全美味。

联欢晚会上，文娱组同志就更显身手，有歌有舞，真是欢乐无穷，特别是歌舞剧很受同志们的欢迎。歌舞剧描写的同志们重上边区建基地与大自然奋斗的豪迈活泼生活，歌颂了群众对基地的支援，以及支援突击队同志们对基地的关怀和殷切期望。歌曲《扛枪挥锄为人民》、《苦战迎接2.19》等歌曲都是比较雄壮动听，反映当时大家的心声。同志们在欣赏演员们的歌舞演出时，嘴里还一边啃着金瓜子，好不享受。同志们深有体会的说，基地真是好呀！

1979年5月温委员率领一批同志来支援边区基地。这一年我们开辟园地9块，以及扩大原有园地数块，总共大约有40依甲。这次的大生产，为我们囤积了大量战备粮，为未来的反“围剿”创设了物质条件。在这次丰收季节，我们除了收获谷、薏米之外，还兼收副产品，如大量的木薯、金豆（玉米）、豆类（梅豆、黄豆、红豆等）、金瓜、甘蔗、菜等。由于这些作物的丰收，大大改善了基地的物质生活。

边区基地的建立，重要的在于自力更生解决生活问题，因此，艰苦奋斗，勤劳工作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了更好的鼓舞同志们的艰苦劳动，在79年我们选举了劳动模范。一位菜园组的求严同志被推选为劳动生产模范，被奖励二条又长又壮的甘蔗，吃得她笑咪咪甜丝丝的，同志们都为她鼓掌祝贺。1980年我们把选举模范扩大，除劳动生产模范外，还选举了运输模范、勤俭节约的模范、军事训练模范、技术革新模范、卫生工作模范等，并奖励手表或收音机给予劳动生产模范和运输模范，其他模范则给予口头表扬，有效的鼓舞了同志们，增强了同志们的干劲。

二，81年大生产

在80年的丰收鼓舞下，81年在军区委员会和指挥部领导下，提出了50依甲大生产运动，虽然在79年初以来就不断有敌方直升机、侦察机飞越生产地周围上空，但经过不断研究，同志们都决心与敌地方再做一次“冒险”。计划一定，砍芭、守园和运输等分头进行，一时掀起了生产热潮。这一年2.19生产地开辟了30依甲，1.12点生产地开辟20依甲。由于同志们的积极和充足的干劲，2.19生产地很快就砍完芭，还派兵支援了1.12生产地的砍芭工作，使到砍芭工作能按期顺利完成。在下种期间，同志们更是忙碌，你一组，我一组，在烈日当空下进行你追我赶的竞赛。副司令老人家更是老当益壮，一人顶二人，他插洞还要两个灵活敏捷的女同志下种，否则一个女同志难于追赶上他。

正当同志们在辛勤劳动之时，花果山的果子又开始生产，榴连、龙眼、橄榄、“当杯”、红毛丹等在菜园里不难找到。同志们干完了农活，背起了“拉龙”上山采果子，捡榴连去了。你一组，我几个都为了吃果子忙开了，你背一“拉龙”，我也背一“拉龙”，吃得同志们心满意足。一位年轻战士在背回果子说：“我已经吃下20多粒榴连，肚子都吃饱了”。榴连大熟季节，在附近工作的同志们几乎天天都吃得很爽快，有时还当饭吃，而较远些的同志们也几乎天天都吃得上榴连。在龙眼熟的季节，一棵树就采了许多龙眼果，每当晚饭后，三五个坐在一起，一边谈心，一边吃龙眼，真是忙坏了嘴巴。1.12点的同志们在果子季节时也是吃了许多果子，就在住点周围就有许多果树，在家的女同志一有空就会自动背起“拉拢”捡榴连吃。我们有时

一次就背回四、五“拉拢”的“当杯”或三、四“拉拢”的红毛丹，七、八个人吃得牙软口酸。当我们背回橄榄时，我们的女同志就快手快脚泡了一大锅来个“过瘾过瘾”。橄榄果含有大量脂肪和维生素，且又很耐饱，食量大的同志们当饭吃，一人只吃上一百五十多粒就满足了，食量小的吃上百多粒就很够。有时果子很多，为了不让果子坏掉，女同志就积极把果子晒干或做成橄榄酱来贮藏。山树胶果（加郎杯），也是一种很好的果子，果肉含有大量脂肪，当果子大跌时，女同志就你一篮，我一篮的捡回来。吃“加郎杯”首先将果子浸了，然后炒再煮就可食，或者将它弄碎，做成一块一块的饼，经过煎就是一块香美可口的“加郎杯”糕。总之，在这次农忙又逢果子季节，使我们吃上了许多果子，增加了营养，也使我们的生活增加了乐趣，提高了工作效力。

艰苦的劳动，迎来了丰收的果实，由于当年天气好，芭烧得不错，农作物长得茂盛，短期作物如“瓜菜”就收成好多担。玉米更是丰满结实，任同志们自由吃，吃得同志们津津有味。稻也长得茁壮，可是，就在同志们紧锣密鼓的抢收当儿，马印两国就在1982年2月6日发动向2.19生产地的进攻，使我们这一次的生产蒙受了损失。

三、关于战备点问题

除了生产地之外，我们也创设了多块后备生产点，如2.7点、8.26点、（1979年）和1.12点。其中2.7点只开辟了一块小菜园，但因缺乏料理和动物的破坏而后放弃。8.26点除辟有菜园地外，也另外有

开辟四块生产地，有一小组人员进行看顾料理工作。由于8.26点离2.19点只半天多一点的路程，且园地开辟较大以及其他因素，不能发挥后备点作用，后被放弃。

在这期间，也还有积极创设秘密后备点，刘支队长就是在创设后备点的过程中不幸因山崩于1979年尾牺牲在TEKALANG河边。刘支队长忠于革命，有魄力，有勇有谋。他的牺牲使党、军失去一个有前途的好干部，是第一支队的一大损失。但他的牺牲使我们感到深切的怀念和悲痛。

1.12点是在80年初建立，辟有五块生产地，离2.19生产地大约六天路程，是在S.Kanjan的支流S.Dadjoe河中段。81年又开辟四块生产地，于81年8月26日被印尼兵进攻。

四，我们的9号园

9号园是我们园地中最理想，产量最高的一块园地，大约有四、五依甲大。这里的稻谷产量较高，这里的副作物也是产量多和高，特别是金瓜，不但多且最大粒，直到第二年其部分老藤还产出第二批金瓜(南瓜)；其他如金豆、梅豆、红豆、黄瓜等产量都很可观；木薯产量更甚，平均二、三棵就一“拉龙”(50-60斤)。9号园地地形斜平，多粉石，中间有小沟，有少量水流，地潮润。右边有一小沟，有水流下，左边有一支垄由北向南伸。由于地形位置很好，芭烧得好，加上同志们的精心管理，形成了9号园作物冠于生产地。同志们都很欣赏9号园，提起9号园个个竖起大拇指赞好。同

志们在赞扬9号园的金瓜时说：“圆圆长长排满芭，使人看了眼也花”。由此可见，金瓜产量的可观。为了照顾金瓜，我们还专门设一个金瓜管理员。9号园位于生产地的中心，加上作物产量多，以及周围园地还有种上数万棵的木薯以及大量的芋头、甘蔗等作物，因此引来动物和虫害的破坏。

为了对付山猪和鹿的破坏，同志们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园地围起一个大篱笆。从9号园起，右边越过8号园到6号园，再从6号园绕过5、4号园到新芭15号园，左边绕过1、2号园等与15号园连接，形成一个大篱笆。在篱笆的适当位置留有出入口，并在一些出入口挖有陷井，以防动物跳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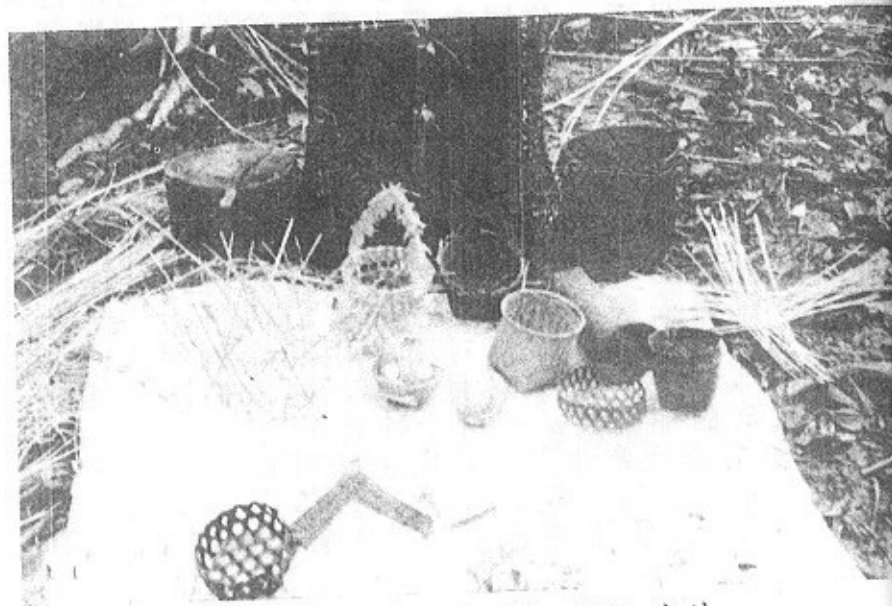
除了围篱笆之外，有时也派小组同志到各园地防守山猪对作物的破坏，多时一个下午就打到三条猪。如果没有人守时，就按时派人到篱笆附近巡逻，巡逻时只要一位同志带上我们的两只猎狗就可以。由于篱笆大，走马看花绕一圈就要半天多时间，这样一定程度减少了动物的破坏。

至于虫害更是利害，特别是豆类如金豆、梅豆等开花结果时，虫害就不得了。可是同志们并不屈服于这些虫害，发扬了人定胜天的精神，捉虫赶虫的应付虫害；有时同志们就不厌其烦的一棵棵去捉，一棵棵去喷药水，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大大减少了虫害的影响。蚱蜢对稻的生长影响很大，东飞西跳令人厌恶，为了对付蚱蜢，同志们不怕艰苦，清晨就到园地捕捉，一两个钟就捕到一百几十条，同志们把蚱蜢拿来炒，其肉美味可口。

总之，9号园是2.19生产地的代表园地。



看！“Panjok” 刚刚装到动物



自制的各种藤背篓、盛物篮等

五， 鱼 猎

谈到基地，就不能不涉及到鱼、猎，特别是猪。它在基地的日常工作和物质生活中占着相当大的位置。由于油与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在于猎（菜的相当比重也是），所以在边区同志们对猪肉有一种特殊的渴求，特别是猪肉更是首屈一指。

Kanjan 河由于河长人少，河尾很多大支流都是群众活动所鞭长莫及的，因此鱼就特别多，TEKALANG 自然也不例外。这里的鱼主要是“Semah”鱼。在果子季节更是捕鱼的好时机。不仅鱼群多，而且条条都是滚瓜溜圆，脑满肠肥，味道鲜美。但由于当时工作繁忙，加上我们又没有掌握在这水流急的河流更多的捕鱼方法，只是用钓钩钓，时常又只是附带，即使是这样我们大鱼也没少吃，吃到自己满足。如果是三几个沿河去执行任务，那就更加常以鱼当饭了。记得同志刚到基地时，以鱼当饭，吃得不适应，吃得手酸脚软，有的甚至抽筋。这里的鱼白天难钓（除非未曾钓过，又是滩头滩尾激流处或是鱼群不惊动它们方能钓到），一般只能等到晚上，才能有较多收获。

猪，我们的伙食里几乎是很少断的。我们猎猪为最多，鹿次之，还有猩猩、吠鹿及狗熊（黑熊），有的地方也有些绳陷（panjok）捕捉小动物。猪我们猎得多不仅因为量多，特别在有果子时，而且因为它有油，而且味道最为鲜美，身体也比较能适应。鹿肉（包括吠鹿）一般人吃多了就会泻肚，有的还会抽筋，特别是刚开始吃者。猪肉当饭要有适当比例，如果过量，一般都会使人手脚软、气喘（特别是上山时），适量吃自然就会使人很快肥壮。

说到打猎在TEKALANG人们很自然的就会想到paku河(S. pait, 由于河边产很多paku, 我们加以取名)及鹿湖。Paku河口, 河尾都有瀑布, 特别是河尾, 很难行走, 然而中段却别有天地。河床平坦, 河边开阔, 又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果子, 尤以榴连和龙眼更是整个TEKALANG之冠, 也是我们边区有见过的榴连之首。由于果子多, 河边又好跑好挖, 所以猪、鹿也就特别喜欢来, 所以这条河就成为我们的猎区。这里的猎不会越打越少, 打了, 过一段时间其他地方的又会来, 真可谓前赴后续。同时巴古河两岸是沃土良园, 可惜由于在军事上考虑难以应用, 不然它也定会成为我们之好粮仓。由于这条河给我们许多好处, 自然同志们对它的情感也深, 它的名声在我们同志中可以说比其他河更高一筹。到了后来离开TEKALANG, 同志们仍然会时常念叨着巴古河。

“鹿湖”这是一个野兽饮水处(水从石缝渗出, 有锈酸味)。野兽来此就用舌头舔水。由于鹿特别喜欢, 由此得名。整个TEKALANG河我们只发现一个(有的河像piyang就很多), 所以很多鹿都来此, 几乎打不完, 只是常打了, 一段时间会害怕、机灵、较少来。单就这一“鹿湖”就贡献了几十只鹿。以后我们在其他地方发现的“鹿湖”, 再也没有这么多的鹿了。不知什么年代开始这些鹿就一代又一代的往这里跑, 这些路连石头都被踩成一条沟了。

在边区我们几乎认为我们需要(吃)的动物都打。这对于生物和生态上有什么不利我们没有研究, 对于有关方面学者、专家有什么意见我们不懂。为了革命, 为了生存, 为了祖国的基本利益, 我们只能让这些自然生物也付出一些代价, 作一些贡献。

六、实践是统一意见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

由于我们是在建边区基地，因此劳动的、生产的课题就必然是我们的新课题。我们重建基地的同志都是来自不同单位，对生产问题都有各自的不同看法和经验，因此要统一意见和经验确实要花费不少精力去解决的，而实践是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是解决争论的行动手段，唯有实践才能统一意见，才能克服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弊病。就拿种菜来说，山地与平地就有不同，把平地经验搬到山地来用，就必然会犯上经验主义的。由此可见不同的生产经验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唯有统一意见、观点和经验，才能在集体劳动中发挥作用，减少矛盾。在初期由于意见观点和经验的不统一，因此矛盾争论是相对比较多的。就拿农作物怎样种法比较好的问题就有很多意见，就如木薯要种多远，薯干种要多长，刀口向上或向下，粗壮三、四个眼是否最好，嫩薯干是否可行，一、二个节眼是否会长薯；番薯是否要翻藤；豆类下种要放两粒或一粒；种稻下谷一个洞要多少粒；你的经验是听来的还是亲身经验等等，都存在许多矛盾争论的地方，这些争论矛盾体现出了当时生产斗争的新课题。

四年来的生产劳动实践正是逐步总结经验，统一意见观点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在生产劳动中，为了更好实践经验，在初期我们都有分组进行工作，如稻芭组，主要负责指导种稻，收集稻种等；木薯组负责木薯的种植，研究和改进技术；番薯组负责番薯的料理，实验番薯是否要翻藤；其他又如金豆组、芋头组、菜园组等等，各组都有组长带动，在总结会议上向同志们做报告，交流经验。

总之，这几年的劳动生产，为我们未来建设基地、自力更生劳动生产问题提供了实践经验。

七、我们的土制小型加工厂

在森林建基地，很重要的就是要靠自力更生，解决生活必须用品，因此边区基地就根据自行设计建造了土制小型加工厂。这些小工厂主要是压蔗机、陶器厂、制油厂等。

压蔗机是由一条约两丈长的木桐做成，木桐的前端削成圆形，并做有推舵，在下方有一半月形的顶木，开有小小流水沟，以便蔗水流下。推舵一人或两人齐推皆可，一手推，一手将洗净的甘蔗压在木桐底下，一推一压，蔗水就自然顺小沟流到锅里，将蔗水过滤，然后拿去煮，煮成糊状（不可过火，过火会焦苦不能吃），煮够之后，冷却成块状，煮差些冷却就像亚答糖。通常我们一“拉拢”的甘蔗会煮出2、3斤的蔗糖。有时将刚压出来的甘蔗水煮红豆汤、薏米水都是香甜的饮料。在整训、节日、假日喝上一碗清甜可口的红豆汤、薏米水更使你精神爽朗，回味无穷。

陶器厂座落在1号园与8号园之间，主要由一个烧窑、轮盘、调泥场组成。窑是用砖叠成，用以制造模型。创造时将泥土调整均匀之后，然后滚动轮盘，将泥土放进轮盘，顺着轮盘滚动的惯力。同志们用灵巧的双手，一压一拉就成了各式各样的陶器，如瓮、茶壶、碗、盘等等就展现在眼前，然后将一条细线一放，双手轻轻一提，这些陶器就脱离轮

盘，然后将这些陶器放进窑，经过烧取出就是可用的瓮、茶壶、碗盘等。可惜由于这里土质差，我们的技术还不精，烧的过程还会破裂又加产品不实用，一段时间也就停厂。

制油厂主要由压碎机和榨油机组成，特别是榨油机制造很费气力，我们的技术人员花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设计制造出来。压碎机类似压蔗机，是由压蔗机经过某些改良而成，其主要作用是将洗净晒干的树枳(ENGABANG)压碎。制油时，将压碎的树枳拿去蒸，蒸时要蒸得够透，然后将蒸好的碎树枳乘热装进一用藤编制成的漏斗状的篮子，再将藤篮放进榨油机，在压油机的顶上插个大木塞，拧紧这个大木塞，压油机的两块压板就随着紧缩，藤篮被这两块板一压，油就顺着藤篮的尖端流到容器里。经过冷却就是一块黄色糕状的树枳油。这种压榨机声响比较大，后来又改做另一种杠榨油机，减少了声响。这个加工厂出产的油有一斤庄、五斤庄、十斤庄等，成百斤、成百斤的大量生产出来，很大的满足了我们食油的需要。树枳油美味香喷，炒起菜来不比花生油逊色，出门方便携带，因此很受同志们的欢迎。

TEKALANG 河两岸是一座座美丽的花果山，除了丰富的果子外，树枳树也很多，在山洪的冲击下，仍然屹立在河的两岸。八一年，山间结满了树枳果。同志们你一组，我一组的乘着船儿到处收集。据初步估计，已制成油的就有七百多斤。

除外，我们还有“锯板厂”。板是我们建设基地的一个重要材料，总部会议所二层楼建筑须要板，粮仓需要板，同志们的住宿也都需要板，因此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我们的“锯板厂”就发挥了

这方面的作用。我们的板多数是将木桐用人工锯成，虽然费力，但却很适用，我们的锯板工作在不同时期都有生产。其他如盖建住舍的劈瓦工作，藤工等手工业都很普遍，特别是藤工，我们的女同志是最拿手，各式各样的藤篮她们都能编制出来。因此基地的“拉拢”藤席都很流行，这是边区基地手工业的特点。

船对基地的水上运输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基地一建立，我们的造船工作就自然积极搞起来。在初期，我们做了三艘小船，每船只能载两人和一些东西，同志们利用它捉鱼打猎，给了我们很多方便。后来由于小船载量少，不够满足于我们，又先后造了十多条大小船只，为基地在水上运输方面做出贡献。在造船方面，我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独木舟；另一种是普通舢舨。我们的技术工作同志一个人一般在5、6天就能做好载至5、6担的船，这就是我们的造船工作。

八、关于物质、爱情和文娱生活

物质生活问题是关系到我们能否重建基地，巩固发展边区基地的问题。由于万事开头难，在初期建设基地的物质生活是较清苦的。77年底78年初，突击队的同志们除了靠自己运输的有限粮食外，重要的口粮都是来自于森林。恰好这时是果子季节，果子多，猎也多，猪也肥，这就为同志们解决了许多吃饭难题。78年下半年果子季节基本已过，而这时生产又还没有搞上去，还不能自力更生解决吃的问题。再加上又增了一批人员，因此，这时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物质生活除了少量的鱼猎之外，

几乎都是叶菜。叶菜主要是番薯叶、木薯叶、金瓜叶以及青菜，饭菜都是菜叶，不同点在于菜有放盐，而饭是淡的，这就是所谓“叶菜饭”。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三几个月的时间，过后番薯、木薯逐步有了出产，生活也逐步有了改善；起初每人有一粒番薯或两块木薯，慢慢发展到有一碗至自由吃到饱。在吃叶菜饭期间，每位同志每星期还可喝到二次的饮料，一甜（糖精）一盐的番薯汤、木薯汤或红豆汤来补足。

在粮食青黄不接的时刻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领导上积极灵活处理物质问题，提出了“科学吃饭”。所谓“科学吃饭”就是以杂粮代主粮，口粮多样化。实践证明，科学吃饭好，这是解决我们物质短缺的有效办法。在这科学吃饭精神鼓舞下，同志们是更热爱基地生活，再加上总务的正确处理伙食问题，虽穷但基本都能满足同志们的需求。在有条件时就做做糕饼，特别是基地的木薯包是同志们常吃的。当打到猪时，同志们除了吃上一小碗的肉外，晚上还喝上一大碗的艾草猪骨汤。79年下半年，我们的木薯已大量生产，因此木薯就成为主要口粮。木薯的大量出产，不但解决了我们的口粮，还为我们囤积了战备粮。即使到80年下半年第四支队进来一批同志，我们的口粮仍然是够供应。我们除了每日三餐吃得饱外，每星期还会吃上二次的木瓜。熟透的伊班茄也是同志们日常喜爱吃的果品。

在节日或集中整训期间，我们的物质生活更是丰富，除了大鱼大肉外，基地产的“红毛桃”、“酸梅水”都是上等好饮品。“红毛桃”是用伊班茄煮熟，加上糖精，冷却后食用起来好似罐头红毛桃，因而得名。“酸梅水”是用森林出产的一种小小红藤果煮成的，可与酸梅水比美。

总之，基地的物质生活虽然是艰苦的，但还是幸福的。特别是依靠自己劳动，自力更生的解决吃饭问题，其意义更大，况且能容纳那么多的人，且为革命的巩固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基地在处理同志们的恋爱、结婚问题，一般都经过爱慕阶段和恋爱阶段，最后才申请结婚。当男女双方或男女单方对某方有感情时，不得先向对方透露感情，而须向有关领导报告情况，经过有关领导处理和解决后，双方都认为有意结合时，领导上就根据实际情况批准有关同志成为爱慕关系，允许他们发展的感情。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感情的发展，在双方的要求与领导上的同意下成为爱人关系，但这时双方还不可发生性关系。在这恋爱时期，双方如认为须要结婚时可申请结婚，在批准后有有关领导处理结婚问题。

重建边区基地以来，就有8对同志在基地人民军总部举行结婚典礼。这里就介绍其中一次。在81年3月的一天，人民军总部热闹异常，特大的双喜白纸红字贴在一座座“朗高”的门框上，门的两侧悬挂着两朵大红花，在红花的下边挂着令人瞩目的对联，“喜上眉梢，全心全意为人民”，“永炼本领，爱国为民最光荣”，“一心一意为革命，征途迢迢英豪”……等等，在“朗高”正中挂着“互敬互爱”等的横副，一间间“朗高”由花草点缀得美雅大方，这正是新居也。唔！原来今天我们有6对同志举行集体结婚。天气是格外的晴朗，在我们的操场上，早已布置好会场。会场正中横副写着“结婚典礼”，下方有一个特大的双喜红字，两旁对联写着“团结创造新生活，基地宏图大施展”。八时正仪式开始，一双双一对对的新人上了正座，先由领

导向新婚同志戴花，然后新人共读结婚决心书，并由双方和证婚人签名，接着领导上发表了热情勉励的讲话，随之同志们也热烈发了言；有的表示祝贺，有的表示要正确对待恋爱、结婚问题，新婚同志的代表也讲了话，最后是小茶点。我们的许多“小姨”、“大姨”、“小叔”、“大叔”都忙着替新婚同志背背包，拿枪枝，这时整个会场笑声贯耳。会场沸腾起来了，一下子就拉成长长的大队伍，准备送新婚同志回“朗高”，领导带路，新婚同志手牵手跟在后，再后面就是“小姨”“小叔”们背着背包拿着枪枝，再后就是“乐队”“吹鼓手”敲敲打打的助兴。当送一对新婚同志回到新房时，新婚同志合唱一首歌曲答谢同志们。集体结婚典礼，就是在这样热闹气氛中结束。

结婚仪式结束后，同志们都参加了简单的茶会。过后，由领导召开了一次“新婚座谈会”，欢迎已婚同志参加。座谈会上，同志们都谈了许多有关婚后的生活、经验和一些必须注意的问题等，使新婚同志上了一堂很好的家庭生活课。当天下午新婚同志集体拍了个照及双人照片，傍晚同志们又为新婚同志举行晚宴，晚上又举行了新婚联欢会，联欢会是热闹的，首先由文娱组同志来个节目，“贺新婚”。许多同志都上台一边唱一边演，向新婚同志贺新婚，这时台上台下笑声一片。同志们向新婚同志贺喜，新婚同志怎么办？新婚同志没有准备，来个机灵弄巧，新婚同志有的拿碗，有的拿茶，有的拿杯，立即上台，来个淡茶表谢意，这时整个会场更加沸腾。接着新婚同志都先后表演了节目，有对唱，有对演，使联欢会开得喜气洋洋，充满了幸福美满的气息。

关于基地文娱活动也是多彩多姿的。在初期

虽然我们的生产任务是很繁重的，但我们每星期天晚上大家都会在一起学唱歌。会创歌的同志在不同时期都创作了有关基地的歌曲，如初期创作的《加强战备歌》、《苦战迎接二、一九》、《基地对歌》和后来创作的《基地道路光辉无比》……等歌曲都深受同志们的欢迎。在文娱演出方面，我们曾经演过两部歌舞剧，都很受同志们的赞赏，一部是在二、一九重建基地一周年时演出。这部歌舞剧主要是歌颂重建边区基地以来，同志们与大自然搏斗的情景，以及描绘了同志们建设基地的雄心壮志。另一部的歌舞剧，主要歌颂了重建基地以来同志们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收的果实，怎样与害虫作斗争中抢收获，又怎样在收获时运输。这其中有着许多动人活泼的舞蹈，反映出收获金豆时的喜悦心情；在采金瓜时，同志们又是怎样在不同意见时统一观点减少采瓜的矛盾；在水上运输中，同志们是怎样热爱水上运输，在运输中船头船尾活泼的对歌等。舞蹈除了《基地鲜花人人爱》之外，还有《斗笠舞》，表演唱有《晒谷歌》。在乐器方面我们还比较缺乏，除了口琴、笛之外，其他乐器都没有，但我们照旧能乐在其中。

九，我们的政治学习工作

政治学习是基地巩固发展的一环工作。在重建基地的几年中，要如何处理政治学习是很费神的，特别是要如何正确处理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生产的矛盾。尤其是政治与生产的矛盾较为突出（基地重建初期军事上的矛盾还不很紧迫）。当时为了解决政治学习问题，规定了每星期学习五课，即政治理论课、军事课、生产课和语言课（主要学伊文）。上课时间通常都在晚上，由于同志们参加劳动生产，忙了一天，精力上受到很大影响，加上负责备课的同志也没有充足时间备课，因此学习起来不够生动活泼，同志们听起来无精打采，学习效果不大，往往流于形式，也成了一种思想负担。后来又把五课减少到三课，由于主要矛盾没有解决，结果还是出现同样弊病。把学习改在下午上工前五分钟来学习，这样的学习也有毛病，因时间仓促，加上同志们的一些自由主义，就影响了工作且效果也不很好。

怎样克服矛盾呢？经过不断的研究，提出了短期集中整训的学习方法（如每月整训学习一次，每次三两天，必要时也多个别天）。这种短期集中整训学习，就有力的克服了以上几方面的弊病，比较能够起政治学习课的作用，收效比较大。因为集中整训，我们比较能够集中干部力量，突破某个理论关和解决实际问题。由于集中，各组同志都集中在一起，互相鼓舞，交流经验，领导上也比较能够及时掌握各种情况，干部方便总结工作，有利于解决内部问题。劳动生产松一松，政治学习抓一抓，劳学结合符合同志们的心理，使到同志们有充沛精

力集中学习。另一方面在整训期间，总务处适当改善和处理伙食问题，使到同志们集中整训更加美满。这种短期集中整训的学习方法直到敌方“围剿”之后我们还继续坚持，只是某些形式上的改变（时间有时拉长到两三个月一次），这主要是经济条件的限制。在后期，这种学习方法对巩固内部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一些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同志，也派人照顾进行辅导。对其他一些政治问题，如组织关系问题、报告制、日记制、检讨会、表扬会、思改等政治工作必然会随着基地的发展而有所改进和完善，使到基地政治工作做得更好。

十、军事问题

我们能不能解决好军事斗争问题，对边区基地前途有着很大关系的。但由于我们是重建基地，又是处于秘密的进行，因此，军事问题在初期还不很突出，除了一些战略部署之外，我们所能做到的只限于一般的训练和预防措施，如防御敌方的忽然进攻时，必要的一些防御准备（如陷井、树雷等）。

1979年的一次军事训练是比较有组织有计划，取得一些效果。当时，我们放下繁忙的劳动生产工作，集中了三天的训练。由于根据过去边区斗争的经验，认为敌人的进攻较可能首先是轰炸，然后降兵。于是，训练就在这一基础上练起来。首先练被空中轰炸时的必要基本功，怎样撤离轰炸点等。过后，就分组到各个园地进行实地演习，熟练基本功，如一旦在园地工作时遭受攻击，另一个园地怎样配合支援，怎样对付空降兵和突然出现的地面部

队等。

后来也训练同志们的开山认路的能力，如把女同志分成二组，带到不同的地方，由女同志自己开路指挥割山回营地，并事先说明在营地某地方有敌情，必须避开，以增加难度和训练提高她们的割山水平。还有一种训练是到园地周围研究和观察地形，找好伏击点，然后设下埋伏，有的当敌人，互相对打并进行反复训练。有些地形很险要，有的同志建议，仁达、亚逊他们能利用木桐、石块把侵略军打得焦头烂额，我们也可学习他们，以石块等为武器对付来犯之军。一时石头等滚滚而下，同志们你一粒我一块就实践起来，有的同志高喊说：“同志们！别推啦，石头滚完，一旦敌方来犯，我们可没有石头好用了！”这样同志们才停止。

最后我们还训练营地突然被袭击的紧急应对办法等。通过这种训练，提高了同志们的某些军事技术水平，增加了一些应敌知识。

正当基地欣欣向荣的建设起来之际，敌方也反反覆覆向我基地进行侦察行动。为了应付突然事变，我们也相应成立了一个战斗组，战斗组成立后一段时间，也积极开展军事上的一定训练，包括对基地周围环境的熟悉。战斗组任务，除了应付突然事变外，平时也负责巡逻基地周围，负起安全任务；同时也负责处理预防、对付敌方的一切措施，如陷井、地雷等工作。但由于主客观上的困难，军事上并没有多大加强和准备，未能给敌方有效打击。

十一，1.12点被攻

81年的大生产正紧张的开展，1.12点生产地的五块园地已基本收拾完，其中一块已种下谷子。就在这一天，即8月26日早上7点左右，一股兵从河尾一路打枪而下，约中午到达园地。27日中午直升机降落可能是撤兵。约一星期之后，我们侦察园地，没有发现什么痕迹，连敌方营地都没有。过后，我们倒回抢运了一批物质。在事前，即8月23日，有直升机从园地上空飞过，过后就感觉河口一带飞机频繁的飞。24日平静无事。25日由于有一位女同志即将临产，於是当天派出一组同志在园地周围打猎以滋补。当时连打五枪，可能由此引起暴露。当天下午约四点，河尾方向传来了二响枪声，有的同志说是倒树声。经过研究，决定第二天（26日）派同志去侦察，随之第二天早上7点多就不断传来枪声，证明了敌方的进攻。这是敌方第一次进1.12点。当敌方从1.12点撤退，就扎在1.12点河口约一个月。

10月初，敌方又第二次来犯1.12点。在接近生产地时，也同样一路开枪。当时该组同志都在生产地工作，因而有时间撤离。敌方在该园地住扎约一个月就撤走。

82年2月17日中午，当华联队长与认真同志沿河尾撤退时，一股敌兵从河尾搜索下并发现了他们，一场驳火又再发生，华联队长背部中弹受伤。在敌众我寡面前，两位同志英勇地向敌人还击，乘机安全转移。

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他们去一个粮仓拿粮，谁知粮仓已被叛徒出卖，其他宿营粮仓也被叛徒出卖而破坏精光，他们不得不沿河而上靠钓鱼过活。3月22日，华联队长不幸在过河时，因为身体过

于虚弱而被无情的急流冲走而牺牲。认真同志在万分困难情况下单独战斗100多天于7月11日才和同志们联络上，

敌方第三次进兵1.12点，是从2月9日始，至5月24日才撤兵。过后在10月又一次进兵，大约在11月底12月初才撤。

这次进攻1.12点主要是印尼兵。第一，二次主要是印尼641连地方军，而后二次是印尼642连地方军。从第一次进兵到最后撤兵，大约16个月，即480多天。

我们在1.12点的财产几乎全被毁掉，其中有谷22担，其他还有木薯干、金豆和豆类；工具包括斧头8把，锄头3把，以及其他铁器、物质，枪枝损失LE和猎枪各一把。

十二，总部的反“围剿”

1981年9月中，温委员带一组同志到约定联络点与1.12点同志联络，可是1.12点同志由于种种原因失约了。这时敌机频繁往返，估计可能有事故，温贤定赶回总部，立即商定着手反“围剿”准备，区委会开会通过了反“围剿”战斗号召，并提出“避敌锋芒，隐蔽力量，抽出精干，打击敌方”的战略战术。同时也提出怎样看待这次的反“围剿”，以及过后如何评估反“围剿”的胜败问题。接着把部分人员转移到临时后备点即4号点。战斗组做好战斗准备。

10月中旬，1.12点联络同志突回2.19点联络。指挥部根据新的情况提出新的对策，贴发《告印尼士兵书》传单。传单有华、伊、巫三种文字，内容大意是说，我们利用他们的土地多年，表示感激；同时也说明印尼士兵是我们的朋友，应该携手共同对付苏越霸权主义；最后也告诉他们，在我们园地有埋下地雷和陷井，希望他们避开，不要误中，在贴发传单的同时，也积极组织人力，抢做木薯干和树积油，抢运准备物资和分散转移粮点、谷仓；另一方面，为了迎接边区基地会议也花了一些人力在做营地建设。

1982年2月4日王连贵副政委带领的部分国内同志来到总部营地。分别已久的战友高高兴兴的互相问好。国内同志兴致的参观总部的各种设施和建筑，而边区的同志们则忙招呼开来，大家紧张、欢快动手准备当晚的聚餐，厨房里不时传来战友们的朗朗笑声。

由于大家感受情况不妙，二局领导经商议决定改换地点，翻过总部背后一条山脉。2月5日，领导机关转移，另一部分同志由林其清（支队长）带领於当天傍晚去抢收附近田里已成熟的稻。正当大家动手收割忙碌之际，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轰”之声，接着一架大型直升机冒着云雾而来，同志们迅速就地寻找隐蔽物，有的同志子弹已经推上了膛，准备战斗。但直升机在上空转了二圈就飞走。这时战斗组的同志给激怒了，组织人力，四把步枪（两把半自动）对准园地上空，准备痛击再次来犯的敌机，算它识时务，一去不再回头。

2月6日，飞机在新种的最大一块园地降落，整

天往返运兵。大兵压境，一场边区反“围剿”斗争终于在2月19日展开了。同志们并没有被来势汹汹的敌方所吓倒，大家还是镇定积极的收拾、收藏好物质，并做好转移准备。第二天，除留下四个战斗组同志准备打麻雀战外，其他同志全部转移。总部是在河的左岸，生产地在右岸。

当战斗组来到Tekalang河边，我们经常来往於生产地与总部的过河处，敌方也在那里吃中午饭，可能是水大不能过来。由于距离太远，不利于我火力发挥。后来在移动侦察过程中被敌方发现，只好另找埋伏点。2月8日下午，一小队兵果然来了。同志们估计他们到营地后必然倒回。不出所料，约一个钟头左右，敌方满以为可以安心的倒回，有的颈上还挂着在我营地拿的藤。“打！”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可把“敌方”给吓懵了，胡乱的打枪打炮，一时还摸不着枪声那里来。经一阵射击，同志们主动从容转移，而敌方仍在“朝天打鸟”。可惜由于地形不好，距离太远，视线也不好，加上第一阵火力有的枪枝子弹又不响，未能更有效的发挥。

当时，对于敌方的动向并不太明确，只能边转移边掌护。大队人马在转移了一天的路程就住扎下来。二局领导继续开会，有的同志则去粮仓背粮。为了查明敌是否已发现我们转移的痕迹并跟踪来。於是派二个同志去侦察。半路他们就与跟踪而来的敌方遭遇驳火。二位同志立刻机警的利用树头还击安全撤退。这下敌方，就误以为大营地在此，忙着调兵遣将向左岸搜索。而我则绕了个半圆圈倒回右岸的S. pait。路途中还美餐了一条肥猪。此后接近一个月时间，敌方就在左岸找想象中的“共产恐怖分子”，而我们则开我们的会议，互不干涉。

二月底，二局边区基地会议胜利结束。会议对之前的政策做了总结，重申“巩固、保存、发展”的中心任务，并强调了力争发展；对国内华区的工作，人员作了重新的调整、部署；并积极筹备进军第四省。虽然处于反“围剿”中，同志们还猎回二头猪、一条大蟒蛇，为会议的顺利召开，为战友的告别而饱餐了一顿惜别大餐，晚上又开了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的联欢晚会。

3月2日，全体同志分成三个单位：一由温委员负责，继续坚持Tekalang流域；一由洪楚庭书记带领转移1.12生产地；一由王连贵副政委带领转回国内。与此同时，敌方也发现自己错误估计，重新调整兵力，把重点转向右岸。由于王副政委等先走一步，所以他们一路顺风回原工作单位，而且路上还猎到十几头猪。可谓美哉！

洪书记等一开始行动，敌方也开始搜出，所以他们的痕迹很快被敌方发现并跟踪（后来发现），可能因刚好过后下了一场大雨，敌方没能继续跟踪痕迹。他们过了Kanjau河来到1.12生产地，在联络洞拿到XX留下的信，说明联络地点和路线。同志们对这个路线产生怀疑。为了慎重，特派二位同志先到粮仓侦察，发现已被毁，没粮，这是个严峻的问题，坚持原地显然缺乏条件。於是决定大队折回2.19，留下一组三个人负责与华联等同志联络。

大队返回的困难可不小。粮食没有了，还好扛有几十斤准备带去1.12点的盐。这时可谓盐头如黄金了。每天队伍一停下来就要为肚子忙了，主要就是砍板督(Pantu)芯。这是一种类似硕莪的棕榈类植物。还未开花的嫩芯可食，味清甜。稍老一点的则会苦涩，要煮过，将其水压干再炒，也可腌起

来。同志们一砍下来，就先生吃一些，填肚为快。接着拿回嫩的先吃，老的则当作第二天的饭。稍老的纤维比较多，吃了会便秘；嫩的有的同志不适应吃多会泻。但这时除了这东西，没有更好的了。有时也钓一点小鱼叫Ensuluntai的，一餐每人分三几条。过了Kanjan河，钓到大约整担的鱼、鳖，也打到三几只不大不小的动物，在当时来说可谓幸哉。但无奈僧多粥少，不过解一时困境，况且还要留底，所以肚子照样经常打鼓。

经过二十八天半饥饿行军，同志们已经明显消瘦，步履艰难，队伍在缓慢的前进。该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返渡Kanjan河后一、两天路程，就连续打到猪、鹿。这时大家自然是兴高采烈，一片欢腾了。

暗尽则明来，这是一个由饥饿到剩余的转机。因为接着就发现一个“大猪栏”，由于当年恰逢Selaban Batu树积大结之年，满山满坡果子到处飘落。这种果子大约与黄豆大小差不多，生有翅膀，跌时旋转而下。它含有大量脂肪，山猪特别喜欢吃，人也可吃，吃了又特别会长膘。这下可真可谓大旱逢雨，由穷变富。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天任务就是打猎、炸肉（因为缺盐，又要当饭吃，所以只有把它炸了放在油里，它的耐久性则依肉里水分多少而定），每天每餐都以肉当饭，找些野果当菜。这些野果有“山番薯”，它是一种藤生果，有成人拳头大小，生吃或用火烧来吃都有剧毒，要用水煮滚一个钟头左右，然后放在水里浸，会流动的水更好或换水煮二次，然后炒或煮水都行，味道倒不赖。还有“山花生”（englanbanyau）、“马兰迪”树的果（这些果味道有一点甜且涩，脂肪多，性质似树积）和nibong

芯。其他如“打板”树果、榴连核等也可吃，不过一般果子的核都有毒，需要吃时都要煮够、浸够，初时不要太多量吃，一般有毒的，吃了都会感到头晕，重者会吐泻。

这一带(S. Pengaoh)刚好是敌方当时搜索的边缘区，因此给同志们有了安身“享福”之处。每天都有猪好打，最多时一天打到五头。可谓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这段时间，可给Api同志真是出尽“风头”，打猪几乎他一个人包了。全部打倒十几头，大家几乎置身于猪的世界。

在安定了营地之后，就立刻派两位同志与另外一部分的同志联络，三月底终于联络上，互通了情况，这一部分同志的反“围剿”斗争算告一段落。

再说温委员带领的一部分人马，事先原想在S.Pai坚持，还准备开辟一点小生产地，为以后“围剿”结束后，搞大生产做准备。但情况远比原先预料的严重，敌方在三月初就把搜索重点移向右岸的五条大支流(除S. Pegaoh外)。

为了掌握情况，决定派出一组三个人去左岸侦察，并顺便开展战斗，转移敌方视线。出去同志行半天路程就发现一个小仓库已被烧毁，于是立刻回返通知后，又继续出发。原有同志准备向上转，但又听到前进方向有飞机降落，於是派二位同志往下游侦察，没有发现敌方的新痕迹，于是队伍就往下游。事有凑巧，他们到达的第二天，敌方也到他们昨晚过夜的地方。还好他们那天早上转移一个地方且下过一场大雨，敌方没能跟踪到他们的痕迹，不然一场驳火就势所难免了。当发现到敌方的新痕

迹时已经是傍晚，因为新营地距此很近，只好先转移附近。这时刚好是敌方大搜索时期，不远不远处都会有敌方的新痕迹。山脉是不能跑了，队伍只好沿半山腰前进。这支队伍的人员本来还算差不多，但此时少了三个战斗人员，队伍里又有两个婴孩，又要负重，又要在难跑的半山腰行军，自然思想上会有压力。怨言、脾气在有的人身上自然就体现出来。但在大家合作下，谨慎前进，十几个人总算安全的通过敌方搜索区来到 S. Pajau。要坚持斗争，粮食自然是非常重要了。队伍一安顿，立即出动了从领导到战士几乎所有的男同志去粮仓背粮。这粮仓很大，虽然拿了一部分，但还剩相当多。同志们胆大的心的摸索侦察接近，发现没什么情况，於是迅速的在戒备下装运了木薯干。这时敌方的炊事器具声清晰可闻。事后证明很可能敌方当时已经发现了该粮仓而想埋伏我军来拿粮，可是他们错过时机了。

坚持了一段时间，虽是安全，但长久多人原地坚持，粮食有困难，而且也不积极，经商议决定一部分人由温委员带领於五月中转进国内，一部分则由林其清支队长负责坚持原地。

战斗组三个同志和队伍分别后，回到总部侦察，发现敌方已经转移没仗好打。后来经商议决定到敌方的大本营。新稻芭去摸营。

3月27日傍晚6点多二位同志开始逐步摸索前进。但四周一片鸦雀无声，两人只好在黑暗中一前一后到处摸索。终于在10点钟左右发现了敌方营地。等到12点，没发生可疑情况，於是二人把心一横，提刀摸进营寨。一路无阻，直至敌方帐幕，先摸床底，只发现水壶、罐头，於是又摸床头（当时是

一个摸，一个在旁警戒），正想触摸看有无枪，突然几盏手电齐照过来。一位同志见事不妙，立即上前一步，一刀向最近的一位劈去，可惜他已向后退走没能劈中。两位同志乘机撤跑，敌方随后追出营地。由于我同志地形熟悉，很快消失在黑暗的树林中，敌方也没敢继续追来。这很可能是在同志经过稻芭时，由于老天不断的闪电造成事先暴露。虽然当时只给敌方一场虚惊，但后来也给敌方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不得不花多一些气力在营地周围设障碍，以防不测。

此后由于其他同志多次转移，三位同志多次往返寻找联络没能接上，经过一个多月独立战斗方与大队联络上。

在反“围剿”中，同志们为了联络在敌方驻兵区行军自然也有一些风险。有二组同志曾多次闯到很近兵营，但都因同志警惕、机灵、事先发现帐幕或闻到香烟、肥皂味或听到声响而避过。敌方在密集的穿插中连我们的一个影子也没见到。

大约五月底，洪书记一队和林其清支队长一组结合在一起，同志们经过一小段的休整，过后又分兵两批。一部是洪书记率领向新区侦察和创设新的条件；另一部由林其清支队长负责，坚持原地，一方面看形势变化，一方面和从国内回来的同志联络。

这段时间，同志们除了靠过去储留的木薯干和稻谷为老本外，还以肉类和Petai果为主粮。同时也开辟一个小园地。9月底这部分同志也撤离到新的地区。9月中，敌方也已经开始撤离生产地，历时半年多的反“围剿”也宣告结束。

到此，结束了我军在Sg. Tekalang 的四年半的基

地斗争。Sg.Tekalang - 这倾注了我们同志的血汗、情感，分担我们的艰辛和欢乐的异乡之河，将永远和我们的基地一起，写下了光辉的历史一页。

边区基地本来是一个开展战斗的好地方，可惜我们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还不能开展更多战斗，这受到多方面所影响，除了我们人员还不够精，战斗力较弱、任务比较多以及对开展战斗还有缺点外，恰好这时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二局在此召开边区基地会议，也一定程度影响了开展斗争。

十三，新的奋斗

转到 Kanjau 的另一条大支流后，又着手於反“围剿”的基地重建工作。这时主要任务自然就是解决粮食。因为这里有天然的粮仓—Pantu 树。在有经验的同志指导下，参与的同志很快就掌握到了制作技术。做“板督”粉的技术和制造硕莪粉的方法一样，只是在不断的实践中同志们有某些改进。

制造“板督”粉也是一个艰苦的劳动。首先是砍，这种植物，在大森林中往往多长在岩石和陡峭地方，树又很硬，用力一斧下去震得虎口发麻。砍了以后还要一节节推或者扛回，集中在小农场。然后还要经过削皮、磨碎、冲洗、过滤、晒干等程序。树的大小。质量影响数量很大，有树大粉多，有的则是树小粉多。最多的一株能产三几十干冬，少的只有个别干冬。一棵平均也只有四千冬左右，这种生产一大好处，就是能现产现出，像硕莪粉洗净就可煮，而且吃了身体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同时也能像面粉那样方便做糕饼。对于建基地白手起家和在森林里长途行军，或缺粮食时，实在是一种很好办法，它是有功於游击斗争的。

除了两组进行“板督”生产，还有一组开辟新的生产地。这个生产地已经转入半公开式的，其特点是园地小（一英亩左右），园地中间还间隔留树，一共只开三块，准备逐步扩大。由于是靠近大河边，阳光充足，土地也肥沃所以农作物生长还相当可以。后来考虑到太靠近河边，大家认为要转入较深入地方，即 piyang 河支流的河尾较妥。多数人

於83年4月转移，留下一组人看守，后来於84年初完全放弃。在新的生产地也是开辟两块，但这里农作物的长势还不如大河边。又加上当时人力吃紧，平常只能保持一强一弱的劳动力，所以青菜供应也不太多。到部分杂粮收成时，又要放弃了。

物质生活初期是比较困难，主要是“板督”心配合一些鱼肉。鱼在piyang河可以说相当多，所以同志们经常派出两、三个人去钓，最多两个人装的连和手钓一个晚上可钓七、八十斤，三几十斤是平常的。后来也有用鱼网。

值得一提是拖网捕鱼，就是两个人各执一张网的两端细绳，由上而下顺水将网拖下，然后以弧形收网合拢迅速拿上沙滩。因为鱼一般由上而下退到滩头会往上冲，有时逼得无路也会往下窜，所以如果能够有人在下面赶，或用鱼网在下拦截会更好。一般在拖之前我们都要先“炮轰”一阵，用石头往上游方向丢，一方面把鱼往下赶，一方面使躲的鱼吓了跑出来。但这些鱼也很机灵，一旦拖过一、两次就躲在洞里不出来。有时我们就把网拦在洞口，人潜下去赶，但经常不知它们躲何处而空手。这种拖网与众不同处，就是网要绑石头，以防网底向上漂，由于石头是用小绳系吊着，所以鱼一旦中网、挣扎，石头就会往洞里跌来跌去把鱼裹住，只是收网后要花相当时间解。这种捕鱼法比较适用於天晴水浅时，这时鱼比较集中，也容易观察，水流较缓同时河床相对平，最好是浅滩（河床平，鱼难躲）。一般上没有拖过的地方，看到鱼群就会拖到，多时一次就三、五十斤。拖一次约十、十五分钟（不包括解网），可谓方法简单、收效快。但由於受时机和地点的限制，有时不适合的地方也只是空空如也，可也不能普遍采用。

这里的猎是远不如Tekalang，只有到果子季节才比较多，所以有时肉也会断食，青菜后来逐步也有一些补充。

主粮自然是“板督”粉，但由於受产量限制，再加上要供应给出外联络运输、种植的同志及战备粮，头一年生活比较艰苦、紧张。主粮一般只能吃到饱，还不能让同志们自由变花样，如做面条、糕等但还是比当年2.19艰苦时期好多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大家认识到要改善基地的物质生活，在没有进行较大规模生产时，必须实行三结合，即板督、种植、鱼猎，而且一个单位人员不能集中太多，要有较大的范围活动，才能更易于寻找鱼猎和板督。为了这缘故也为了作更长期打算，於是洪书记和一部分人於84年3月转向Sg. Karoap（Kanjau右岸的一条大支流）。另外一组人则在原地坚持。这时这一部分，由於原有一些青菜，生产板督主要是生活需要，打猎也比较能够抽出人力，所以生活有了明显好转。工作，学习和休息也得到较好的调节。这个生产地后来由於内部出现了分化淘汰於84年10月被放弃。

要坚持基地斗争，后勤物质供应是个相当吃力的，特别是长途运输，但它又是必不可少。因此83年初一组同志就被派往上游木山负责物质供应，中游仍有供应一部分，主要是药物，在木山难买的東西。为了减少运输负担，基地一时没有开展公开种植生产，更学习积极开展国内的群众工作，大家都认为边区又要留一组同志继续坚持斗争，同志仍可固定或轮换到国内活动。於是從83年底进国内的同志就逐步增加，到84年底大部份同志都转进国内。

Sg.Karoap 的 3.29 生产地在这河的河尾，是靠近河边的小块生产地。当时带来的种子也很少。芋头（福州人讲的红毛芋）的种子是一粒切成几小块的。由於土壤适宜，这里的作物长势收成都不错。另外一块稍高一些，虽然是小块，但由於地势陡，芭烧的好，所以长出的木薯并不比大园地的逊色。这里园地里留的树比在 piyang 河边的生产地更多，可以说小块生产地在这里是成功的实践。特别令同志们喜爱的是满树结果的木瓜和长势粗壮的芋头。

由於有了过去的生产基础和一段时间运输的物质，加上一段时间又有果子，猪，主粮也从“板督”为主逐步转为杂粮配板督。由於人少，有了相当的油与肉的剩余，后期灯火也从基地长期的传统“打马土”灯转为猪油灯，这灯火比平常自制土油灯还光亮，晚上和凌晨营地处处的灯火点点，一派勤学上进的好气象。这时是反“围剿”后生活最安定最好的了。

同志们一面生产，一面准备等进国内的同志回来联络，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九月直升机在生产地上空盘旋。同志们感到情况异样，於是作了暂时临近转移。十月中领导派两位同志来联络，传来令人震动的第一支队大分化消息。近一年时间，情况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对同志们来说实在意料之外。所以同志们虽然没有足够思想准备，但大多数同志立即当场表示坚持武装斗争的决心，精神面貌没有低沉的气氛。

按照通知，这部份同志於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 3.29 营地，“一定

要把武装斗争坚持下去！”“感谢基地对我们的贡献”口号声回响在营地上空。

十四，结语

七年多边区基地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的教训。它不但实现了“9.19”会议（一九七七年）提出的重建基地的战略任务，而且实际发挥了它的作用：一段时间对保存革命内部起了积极作用，为今后的革命斗争和政治工作提供了经验。同志们为自己的奋斗精神与成果感到自豪，我们不为遇到的挫折感到悲观，我们认为这还只是北加革命漫长征途中所要走过的一段路程。

注：（一）这里的名称如2.19、1.12等都是以当时到达生产地的时间命名。

（二）文中的时间距离是以我们森林行军速度为计算。

（三）文中的用词是保留当时的原句，以保留历史原貌。

血汗浇开山林路

- 回顾 OYA 河武工队 -

雁飞

一九六八年，国内和印尼边区两股力量会师了。从此，各支武工队（即武装工作队）相继在拉让江畔成立起来。

一九六九年六月，一支小小的武工队，OYA河武工队（简称O河武工队）成立了，一共分为两组：一组由老莫带领，在SG.Poi对面一带活动；一组由纪平（蔡布家，武工队长）、林猛（宣委）率领，在加拿逸市对面一带活动。当时我是在纪平（烈士）一组，除了我们三人，还有李红、白鸽两位同志。

我们在华族群众家后芭住了一小段时间。人员到齐后，我们一组五人从比带坡向混合区〔注一〕Bunau河出发。我们跑的是伊班群众常跑的羊肠小径。事先派两个同志化白（即穿着平常人的服装）请伊班人领路，因此跑起来还算熟路。到了长屋附近，我们安了个“点”〔注二〕。不久，又有二女（护士、家尼）一男（尚武）同志加入我们的组，护士（叶天星）是我在“学医班”时的老师，重聚一堂，大家分外高兴。八个人的队伍决定分为两组活动。

在分组之前，白鸽、尚武最后一次化白上长屋宣传。依稀记得握别时，尚武开玩笑说：“三天后我们没有回来，你们可就要搬家罗（口旁）。”果然三天过去了，还不见他们的影子，这下可把我们急坏了。结果由纪平带李红武装去侦察，在靠近长屋的“朗高”〔注三〕了解到长屋就住着政府兵；但一提到两位同志，群众就面露惧色，推说不懂。至此可以断定他

们已遭出卖被捕了。

在冒险出华区〔注四〕与领导上联络后，我们六人马上收拾行装，又向民族区〔注五〕进军了。六个人当中只有纪平是从边区回来的老同志，有跑山经验。其他的都是第一次踏入山区，而三个女同志都是刚从城市下乡没几个月的。人员是这样的弱，地形、民情更不懂，生活能力又很差，摆在我们这些开路先锋面前的考验可真不少。

一路上断断续续宣传了一些伊班群众，经过二十几天的行程，到达了OYA河边。我们在某一支流的山沟陡坡处扎了营，还上了长屋。这里的伊班族对我们不错，於是决定搞粮、囤粮，以便迎接更多的人进民族区。

八月十一日，纪平、林猛和李红三个男同志去碰群众，在一间小屋里遇到了热情的招待，於是拿了钱（约二、三百元）给群众购买粮食。当时确实已得知附近上下有驻兵。告别群众时已是半夜时分，三个人就跑去附近该群众的稻芭“朗高”里过夜，准备第二天天蒙蒙亮就回去。

十二日凌晨五时，正当李红在烧火煮木薯时，听到“咯”一声响，紧接着爆炸声、枪声连珠炮似的响了起来。激烈的驳火声惊醒了我们三个驻“点”的女同志，而李红、林猛在第一时间已被手榴弹炸伤，头部及脖子中弹的李红还昏迷了一阵子。李红、林猛忍着伤痛摸黑撤回“点”，而纪平（蔡布家烈士）掩护战友，坚持与敌战斗七小时，最后英勇牺牲。

这段时间我们是够困难的了：一来面对着撤不回华区的危险（因为主心骨纪平已牺牲）；二来政府兵“围剿”我们（戒严期间我们亲眼看到政府兵巡逻至我们住“点”的山沟口，还站在那边张望好一阵。

)随时有再驳火的可能；再来两个伤员伤得不轻，尤其林猛，胸部（肺）、下腹部各一弹孔，并发气胸兼腹膜炎，肚子像板那样又硬又红，痛得他整天不吃不喝，十天下来，只剩皮包骨。

由于我们认为男同志战斗力较强，因此把重要的药全都发给三个男同志背，恰巧三副吊带（连枪）全丢了，没有相应的药治疗两个伤员，只得以盐水洗滌伤口，以极少量的眼药膏涂。李红脖子的伤口比他的食指还深（他试过），林猛胸部的伤口直透肺部，不缝合是不行的，没有麻醉剂，全靠思想过硬来顶痛。所幸在护士严格注意消毒下，伤口痊愈得很理想。

驳火的地方就在我们住点的下游大约半个多钟脚程的地方，由于伤员伤重，我们无法转移。虽是八月天，却连绵不断的下雨。在那最初的几天里，我们每天都是吃着夹生饭，仅有的一点干菜留给了伤员。

我们的“点”是在陡坡上，十分难行，我与家尼根本没法拿水，洗衣、煮饭全包在具有男子气概的护士身上，伤员主要也是她负责照顾的。还记得当时的水袋是把大油纸袋套在布制面粉袋里。每晚天暗后，护士下山清洗衣、取水，我（或家尼）则持枪站岗，然后她把湿衣服缚在腰间，扛着一袋又滑又重的水上山回“点”，我则提着一食格水尾随她，往往回到家我的水只剩半食格了。我们每晚几乎都要忙到深夜才能睡觉。由于水有限，人又累，我们顾不了满是泥泞的双脚（那时全部人都是打着赤脚的），只把它们伸在吊床外就呼呼入睡了。

几经辛苦，我们终于回到华区，家尼回家后不来了，李红脖子后面的弹片被护士取出来（同时还帮华区的红坚同志取出小腿里的弹头）。重整后我们一行九人（阿忠、林猛、猛冲、志锋、活虎、李红、取

明、护士、青松)又倒回民族区了,在 Sg. Paku (巴谷河畔为 OYA 河的大支流)我们分组了,林猛、李红、取明和我留在当地,其余的五个同志向 OYA 河尾的当边(TAMIN 河)进发。

十二月八日,阿忠等五人行踪暴露还不知道,当晚深夜全部上华族群众的家时遭军警包围,活虎(江先予烈士)、志锋(王聪顺烈士)为掩护战友牺牲,而其余三个则被捕。

等不到同志归来,我们四人只好又带着悲痛的心情回华区去了。

当我第三次进民族区时,我已被调到上游老莫一组了。这次也是他们第三次进军民族区。组员计有老莫、江涛(黄天华烈士)、阿清、育文(沈京南烈士)、求勇(包振鸿烈士)、取明、老高、新华、认真、青松等。其实我当时只是“做客”(负责认路),由于严密须要,所以河流、地方名称都不懂。

队伍到达拉让江分界垄后,求勇、阿清和我就负责沿垄开路打通上下两组的通路,结果失败退出拉让江边。

上游这一组虽然没有发生被捕、牺牲事件,但每次回华区都有人离队,第三次连负责人也离队。

尽管队伍不断出现问题和挫折,然而队伍还是三番五次的不屈不挠的重新组织起来。

一九七〇年初,〇河武工队的战斗队成立了。我们十人(三明队长、曾忠、育文、庄平、取明、阿清、胜意(刘殿锐烈士)、华英、青松)在蒙蒙细雨中宣誓就职。不久,与华区民运组结合,我们接受了战斗任务。几个同志先去开路,然而半路遭伊班人开枪

射击，郑金声同志（国会议员），不幸牺牲，路也开不成了。过了约莫一、两个月，领导上再派一组人去开路。正当同志们在密密的“龙基”丛〔注六〕里“沙沙”压路时，一响冷枪射过来，育文同志的手臂中弹负伤了，这次的开路任务又告吹了。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困难，终于我们一行十七人还是向民族区挺进。

为了战斗的需要，我们尽可能精简装备，胶布有限，除了一个患严重风湿病的女同志外，其余的吊床全都藏起来，男同志的短裤只能各带两条。

经过诱兵后，我们终于在巴谷河边找到一个埋伏点。每天早上五点就起身吃饭，并各自打包中午的饭，除绍菜干外，我们的菜还是“布拉占”加盐头，饭也是相当不够量的。

最初，大家精神抖擞，一心一意等敌人进入圈套。可是一天又一天过去，敌方还不来，渐渐的瞌睡虫却来了。正在失望之余，一天我突然隐隐约约的听到“挂尾车”〔注七〕的“摩多”声，不觉精神一振，於是悄悄捡了一颗小石子丢向附近的小文同志（潘启坚烈士）。焉知我这一通知，“挂尾车”突然煞住了。怎么搞的？原来刚才的“摩多”声是小文同志的杰作。我的石子把他惊醒了，那里会有车声呢。

一个星期后，大部分同志要回华区去了，只留下精干的一小组人继续寻找战机。分手时取明同志竟然掏出糖粒分给每位留下的同志。她真会为同志们着想，这是埋伏前每人分得的十粒糖果，我们的早已消化完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参加杀敌夺武行动。

O河武工队到此也就结束。尔后是连接华区及更远的民族区及第四省一部分的，改为OMT武工队（OMT即OYA河、MUKAH河、TATAU河的缩写）。

我们是怎样走路的

第一次从华区向混合区进军，我们走的是伊班群众常跑的羊肠小径，因为同志事先跑过，还算熟路。然而我实在不行，赤脚踩在那满是枯枝、烂叶的地上，直感到脚底痒。更什的是草根、树枝、藤刺还要插入，只得踮起脚走。看到那绕着山腰只一尺来阔又边临山谷的路（其实只是小山丘吧了），头感到晕，就是过不去。纪平队长只好像牵小孩一般牵着我走，更什的是一路像跌冬瓜似的跌着前进。（我有“本事”一天跌几十跤，一架崭新的手表给我跌得变“马表”，眼看着时针、分针飞也似的争着转，才几天就报销了。）这一来，四个钟头的行程竟然花去了我们三个不眠的夜晚。

XXX

XXX

大热天，“龙基”特别坚硬，赤脚走来脚底真是生疼，我们三个女同志越走越慢。往往，在前面压路的纪平队长坐下来休息了十几分钟，我们才蹒跚来到。尤其是我，每当遇上挡路的“马丹”就更糟，上不去，过不了，只好把背包、枪支先交给一个同志拿过去，再来就是一番又拉又牵的过了“关”。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粮食很有限啊，可把纪平队长急坏了，但又奈何不得这几个姑娘的呵。没法，只好来个硬功夫，起早摸黑！这下子我们的腿脚更感到不够使用了，每天扎营都是那样腰酸腿疼。结果，还不到半个月的功夫，一大瓶的驱风油就给我们三个人的腿全吸收完了。每当天亮下床时最为难受，脚底疼得踩不下去。护士心生一计，有了，带来的大膏药布大可派上用场，她赶忙剪下大大的一片，“穿上”脚底。这白底“鞋”果然好用，没那么疼了。可是没赶上两趟路

，“鞋”不翼而飞了，只好再拜铁拐李为师。

“你的脚为什么那样疼？莫非有刺？”一言提醒，我赶紧翻着脚底找，到处给割的花花的，但什么也没找着，纪平队长无可奈何地过来帮我挑。“这一带山蛭多〔注八〕大家要查一查脚。”山蛭！到底是个什么家伙，我忙不迭地找起来，满脚的树叶、泥土，搞得我眼花撩乱，只好报告没有。“这不是吗？哪，这里也有。”我奇异地看着李红同志是那么轻易的帮我发现“新大陆”。

XXX

XXX

从“新加邦”河到“巴谷”河，地图上看来区区不过是四、五寸〔注九〕都足足花了我们半个月的时间，而离目的地OYA河还有好一程呢。急性子的纪平同志责任压在肩上，更是像热锅上的蚂蚁，尤其是跑错路时更什，可越急越容易出乱子，也因此闹了不少笑话；有时发现跑错路了就赶忙掉回头，天晓得到岔路口时转几下，又倒回原来的那条垄。往往在好一程路后才猛然发觉到。一次跑到一条河边，掏出地图、指南针一对，不对劲呀。纪平同志忙放下背包去探路，回来时他已气喘吁吁，满头满脸是汗，眼镜蒙了，帽子也歪了。他把手上的指南针当做地图指指点点，把脚边偌大的一条河上下游颠倒来讲。他结结巴巴的讲着，口吃得更利害（这是他紧张的体现），让听的人禁不住替他使一把力。说着，说着感到口渴了，就往水壶里加糖精，然后把水壶的大盖子死命往装糖精的小瓶上扭。强憋了老半天的我们再也忍不住了，冲着他的怪模样按住肚子哈哈笑个不停。

同志们心急我当然也跟着急，可我是心急脚却不争气，天天还是落伍一大截，有时甚至因而迷路。一次，纪平队长气急败坏的找到我时，半生气半开玩笑

笑的讲：“你看，为了找你，我的裤都给扯破了，要罚你来补。”我只得苦笑耸耸肩。还好我这个新兵，每当看到那迷人的青山绿水，就什么疲劳、苦恼丢一旁，自顾自的拉开嗓门“创”歌去了。

XXX

XXX

求勇、阿清带着我担负打通上下两组之间的通路。我们沿着拉让江垄向西开路。说来难令人相信，区区两三天路程，可我们是起早摸黑，努力的闯了十六、七天，结果还是失败，半途切出江边（其实当时还以为是跑过了头）。这期间，我们曾不断地向前进，竟莫名其妙的兜回五天前跑过的地方；夜间在那隔着一簇簇密密的草丛的树胶行间行进，前面的阿清脚快一点我们就跟不上，喊他，他就在不远的地方应着：“这边！”可我们左闯右闯都老被草丛挡住去路。“这一边——”他拉长了声音慢悠悠的喊。这下我们这两个“巴刹佬”可火了，想撒赖：“什么这边、这边，我们不要跑了。”无奈，他只得倒回来找。事后，我们还得作检讨哩！

还是在老莫一组的时后，我们运一程粮〔注十〕，又倒回来背一趟背包，沿着他们前次开的路行进。这条路，几乎是一直线对准目标开的，因此异常难行，爬壁翻沟都不避嫌，结果老江（黄天华烈士）的脚底给利石划了一个大口子，不知从那里弄来一只袜子穿着，拄着拐杖勉强跑。基于此，我们把傍晚的最后一程拉长，让老江守“点”煮饭，除探路的外，我们全部倒回头背粮。有一次我们竟找不到来路，转了几转就更糟了，天南地北也分不清，甚至连回宿营地的路也顿失所踪。夜幕已经低垂，几个“老马”还在打着手电筒闯来闯去，而我们这些新兵席地被天，一天的疲劳全涌了上来，啥也甭费心了，一心只想见周公。为了驱赶蚊子（在仔青芭），有的同志还把油纸

袋当袜子穿起来。大约是半夜光景吧，探路的同志才把我们找了回去。

XXX

XXX

一路上，我们寻找着前次做的路标〔注十一〕。在失去路标好一程后重又发现，李红同志高兴得一蹦二跳，嘴里还念念有词。可是没过多久，路标又失踪了，当尖兵的李红同志有些气馁了，愁眉苦脸的。跑在后面的活虎（江先予烈士）看到这些变化，拉长声音带笑说：“怎么啦，高兴得太早了吧。”李红似乎给蜜蜂螫了一下，跳了起来：“人家困难时，你还要幸灾乐祸！”你一句我一言互不相让，两个亲兄弟吵开了。阿忠看到此情景，忙喊：“不要再跑了，就地开个检讨会吧。”

从第一步做起

当时群众基础没打下，物质来源困难，低弱的生活能力和活动能力使我们的生活益加艰苦，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煮饭炊事原本是小事，可在O河武工队时期却成了大课题，有时甚至成为大难题。不管是由十七人组成的战斗队，还是三、四个人的小组，每天都是捡干树枝来烧火，碰上雨天或在河边〔注十二〕扎营可就辛苦了。四、五个人活动时，晚餐只不过是两格的稀粥，又没另外煮菜，也没有烧水〔注十三〕，但我们竟然多次创出煮饭五、六个钟头的记录。

行军扎营时，我们很常用胶布搭帐篷，灶就设在一个角落，每次起火，满“屋子”里的人都给烟呛

得一把鼻涕一把泪，难过极了，只好躺下去。但这一躺往往又给周公召去。一次，一个同志睡得半饱醒过来，看到我在灶边手忙脚乱，抬头望望天色，不解的问：“干嘛这么早煮饭，离天亮还早呢。”我只好苦笑，提醒他该起身吃晚饭了。低头一看表，长、短针正好重叠在“12”。

XXX

XXX

在武工队成立的第一年里，每人每天的米粮为一罐（牛奶）半，而通常都是一罐。有一段时间因为算错，每天才半罐。油也极少，甚至没有油吃，糖更不用讲，菜也很缺乏，造成这样的局面并非我们穷至此，而是活动能力太差，背不了多少，也走了太多的冤枉路，耗掉太多时间。正菜我们背不了，野菜除了“米连”、“巴谷”、竹笋等易采的外，其他的就难了。经常看到“板督”、“阿扁”〔注十四〕，但却只能望树兴叹，打猎就更不会了。有一回，活虎与去过印尼边区的猛冲合伙，搞了老半天；累得满身大汗，结果拿回不到一食格盘（直径只有四、五寸）的“阿扁”芯，从此再没有人去试了。有时也有在河边钓鱼，但消磨了差不多一个下午，指头大的鱼每人还分不到两条；看到小沟里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幼虾，我们也感兴趣，用食格盘捞起来煮虾粥；螺更不放过，连那小小的土螺也捡起来煮熟，用牙咬掉它的壳尾，吸一粒送一口饭；鹿眼菇〔注十五〕也算是我们的好菜，洗净后加点“布拉煎”或糖精去煮。有一回，一位同志一下子吃了半食格的鹿眼菇，但才半个钟头，就全拉了出来，可见其凉性。这些“好菜”在我们活动的后期，根本没人瞧上一眼。

XXX

XXX

出到拉让江边时，华区同志送来了珍贵的几罐

午餐肉之类的罐头。同志们不舍得吃，把它们背进民族区藏起来，我们第三次进去时才吃到。有时，同志们也把稀罕的鱼肝丸当油来煮菜。不过我们最常吃的是后期已绝迹的“布拉煎”炒盐头，其实往往盐头大得超过“布拉煎”。犹记得每次准备向民族区进军时，照例买来几条“布拉煎”，全部炒了带去。有时煮粥时（因为粮食有限，早晚间几乎都是吃粥），把炒“布拉煎”洒下一点就算了；有时干脆咬着生盐当菜下饭。说真的，这期间盐头吃起来特别可口，说盐是甜的并不夸张。

那区区的一罐米对女同志来说尚且不够，对于农村出身的壮汉更不待说，有的同志形容说：“肚子饿到傻了才开饭，吃得刚刚意识到饿时就锅底朝天了。”尽管是这样，破私立公的风气还是很浓厚，经常是你让我，我让你，甚至还想出妙计，故意慢慢的吃，使人不那么容易发觉到吃那么少。

为了缓和肚子饿，蹲“点”时总是尽量拖慢时间开饭，并经常以糖精水充饥。往往饭后不上两个钟头就要欣赏五脏庙的交响音乐了。

由于生活太艰苦了，思想少不免出些差错。一次，两个大汉实在太饿了，就偷偷的掏出干粮〔注十六〕来吃。他们又怕被人撞见，於是拿来一床被蒙头盖上，你一口我一口正吃得香。不会做“贼”的他们没想到藏了头却露了尾巴，管人特别严的取明同志从他们的动作看出了破绽，一把给揪住了，两个大汉只好涨红着脸听她的训话。

有一小段时间，由于怕在树上留下绳索的勒痕，除非在大森林里，在“仔青芭”〔注十七〕活动是不准绑吊床的（这其实仅是某个负责人的看法）。由于缺乏胶布，我们往往是把帆布吊床铺在地面上睡的

。晴天还好，碰上下雨就倒霉了，什么都是湿漉漉的，不要说睡，连坐都难，只好几个人背靠背打瞌睡等待天明，乐观的同志就索性唱起歌来。

那时行军洗了衣服，第二天想要有干爽的衣服穿上路几乎是不可能的。清晨里，每当把那冰冷的湿衣服往身上套时，全身汗毛立刻齐刷刷的“立一正”起来。

群众与我们

由于不熟悉民情，加上当时各武工队都有不少给伊班群众出卖的经验。为了安全起见，行军路上若遇到群众，就得加紧赶路。如果是下午五点左右碰上就更苦了，还得赶到天全暗了才扎营。这时解下食格来做饭，可食格偏偏耍赖不肯坐起来。扭亮手电筒一照，好家伙，食格没了“屁股”，叫它怎么坐？

XXX

XXX

一次，我们在胶园里意外（即不在计划内）碰到割胶的群众。略为宣传后，我们就匆匆离开了。可是这里的群众真利害，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已经跑得那么急、那么久了，怎么还摆脱不了，讲话声总不绝于耳。我们只得再加快脚步，也不知翻过了多少岭真是累极了，要想再快也快不了。这时不知是谁“噢嘴”一声大笑起来，指着李红的背包喊：“群众在这里呢！”天！原来是录音机在作怪，真是又气又可笑。

XXX

XXX

有一次，一组同志在一间旧“朗高”休息，一个伊班妇女迎面走来。当她猛然间看到绰号“尼格罗

”又黑又高大的小文同志站立起来，竟像中了邪一样。只见她发狂的挥舞着手中的“巴冷刀”，满口喊个“pantap”（砍）不停。接着她拔足狂奔，并一路呼救，讲得一口流利的伊班话的女同志都没办法安定她。为了使群众了解我们这支新生的队伍，同志们只好尾随着她。那知还没有到达长屋，只见由里面冲出一大群壮汉，拿枪、拿标的，杀气腾腾。为免冲突，同志们只好打消念头，迅速转移。从此这个地方自然而然地被取名为“pantap”了。（后来，当地群众在了解我们后，就积极地支持我们了。）

XXX

XXX

尽管我们与群众相互之间还相当缺乏了解，但同情帮助我们的也不少，这也是武工队能生存的重要原因。

结 语

随着O河武工队的结束，我也离开了民族区，至到1973年的「斯里阿曼」前夕，我又被调回民族区。

这时的民族区已是大大的不同于往日，人数已由当初的一小队扩展至四队一组，而我们进民族区的队伍浩浩荡荡的竟有二十多人，其中多数还是新兵呢。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当我们到达O河某工作队的营地时，大大的会议厅〔注十八〕一角堆满了货，横梁上凉着一条条的海带，还有绿豆、好立克（饮料）、白纸等，真是稀罕。四十几人集中在一起整训〔注十九〕，竟能个个吃得饱，而且吃得好。上长屋就像回家一样，群众都把我们当作一家人，毫不拘束。我们帮

群众医病、劳动，群众则帮我们购物、送情报。群众有好吃的，我们也少不了一份，我思前想后，心潮起伏难平，这些都是前人用血汗换来的硕果啊。

〔注一〕：即华族与土著混合居住或交界的地区。

〔注二〕：通常我们把驻扎地称为“点”。

〔注三〕：“朗高”为伊班语音译，即小屋子、小棚子之称。

〔注四〕：华区为华族居住地，通常是指农村的华族居住地。

〔注五〕：民族区指的是各土著居住的地区，多数为伊班族居住地。

〔注六〕：龙基为一种异常茂盛的爬藤植物，经常纠缠蔓生整个山头，管硬韧非常难压，是开路的大敌。

〔注七〕：（Outboat）即舷外摩多，为长舟的推进器。

〔注八〕：山蛭又称蚂蝗，为吸血软体动物，附着性很强，通常在吸饱后才掉落，伤口往往还会流血。

〔注九〕：平面图上一寸等于约二哩的距离。

〔注十〕：当时一人只能背一长珍（饼珍）米，约十八公斤重，仅有育文（烈士）背两短珍约重二十四公斤，而每人的吊带约有十公斤重。

- 〔注十一〕：路标，即将沿路的小树枝向不同的方向折，但X有异了一般伊班群众只折的路标。
- 〔注十二〕：下雨天，河边湿气特重，干树枝吸收水份多，比生柴还难烧。
- 〔注十三〕：那个时期我们没有能力煮开水，每天都喝河水，还好山地泉水清，也没什么问题。
- 〔注十四〕：板督、阿扁为伊班语译，即两种棕榈树，树芯可做菜，也相当可口。
- 〔注十五〕：鹿眼菇，顾名思义，是一种的球状菇，它像“菜燕”一样无色透明。
- 〔注十六〕：干粮：将炒熟的米、黄豆、绿豆等磨成粉，拌上白糖，就成干粮，平时不能食用，以备不时之须了。
- 〔注十七〕：仔青芭为再生林。
- 〔注十八〕：即营地内最大型的建筑，凡开会、吃饭等集体活动都在此进行。
- 〔注十九〕：整训有分军训和政训，这次我们是军训加政训。

波波折折创新业

- 雁飞 -

为落实1977年的九·一九决议，我们第三支队（原来的OMT）领导机关於一九七八年杪开始在巴谷河（乌也河的支流）建立第一个小基地，主要是种植木薯、番薯、芋头等杂粮及蔬菜，以便自力更生，尽量减少依赖群众。

在这个靠近群众区的基地里，杂粮大量出产前，我们三餐都是限量吃米粥，经常在粥里加些玉米粒。在这样的地区活动很受限制，打猎是奢想，抓鱼也怕遇上群众，所以几乎全是吃素，加上还要强劳动，可以说根本吃不饱。

一九七九年三月间，政府军开始对我方进行“围剿”，於三月尾时，一队巡逻兵发现了我们进出的路模，并跟着痕迹摸上营地来。

我们的基地是建在森林里的一支小山垄，上下两头都设有岗哨。敌兵是从山脚摸上来的。

大概是午间二点多，放哨的同志发现情况先发制人，对方跟着喊叫、还击，还很快拉队至侧面成“L”形。

当时，会议厅里有好几个同志；有的在画地图，有的在制藤篮。枪声一响，身为警卫员的怀全同志（林贵美烈士）自觉发出命令“扑下！”大家服从指挥。

放哨的同志撤回来后，我方以会议厅旁一棵数人合抱的“柏拉弯”大树为主要工事（掩体），机枪、伊宾枪、来福枪、史登枪、猎枪齐响，而对方的M16、枪榴弹等更为激烈，一时真是热闹非凡。

对峙了大约半小时，对方除了呐喊声，已没有了枪声。这时在指挥员的指挥下，我们已各自把自己的背包取来，然后按队列向稍高的山腰撤去。这撤退的一路上，再也没有听到对方的枪声，倒是一群山猪惊慌的闯到跟前来。

据事后了解，由于扫射得过于猛烈，对方竟然耗尽所有的弹药，以致后来哑然无声。据说，他们耗了上千发子弹。同时，在进入营地时，有一个士兵跌入陷井（注一）里去。

当时，我的手折还未痊愈，驳火时还吊着手臂，不能打枪。因此，当阿明的史登枪卡壳不能用后，就与我的猎枪对换。

这一路撤退多波多折，然而，从此北加人民军与板督树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行十四人（队伍当中除了我手折未痊愈外，另有一个男同志脚板枪伤复发）开始了漫长的撤退路程，靠背包里的粮食是十分有限的。我们一路上以板督树芯加上几乎可以数得清米粒的粥为粮食。每天行军到下午四点多，扎营后就派几个男同志去砍板督树。砍板督树本来就难，带着个饥肠辘辘的肚子去更是件十分吃力的事。板督喜长在陡峭的山崖或峭壁上，其树皮十分坚硬，还像刺猬一样满身长着长短不等的尖刺。砍倒了树，除去叶（叶

梗照样长刺)，取下树尾较嫩的一段，然后剥皮取芯。嫩芯清甜可口，可生吃，老芯苦涩，必须切条煮水、浸水去其苦涩方能食用。有一回，一个同志去砍板督芯直至天暗还没有回来。正当大家十分担心想派人去找时，才见他从小沟用四脚爬上来。原来他过于饥饿又出力过度，以致腿抽筋走不动。

走几天后，我们从藏粮点找到半珍白糖。从此，每天男同志们要动身去砍板督树芯前，每人吃一汤匙的白糖，以增体力。

以板督芯当主粮真是一件苦差。这并非说它的味道不好，其实老板督芯去掉苦味后炒猪肉也是挺可口的。问题是吃多了（尤其在缺油的情况下）肚子就要来个严正的抗议：不是泻肚就是严重便秘。泻肚时往往才吃进去一个钟头就原原本本拉出来。那肠子何止七拐八弯，就搞不懂能这么“本事”，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跑完全程，而且还三步五步就整你一次，一天下来也不知拉了多少次，这在行军路上是十分累人的。便秘时则是另一个极端，这些老板督芯纠结一大团堵在肛门口，任你千呼百唤就是不肯出来，胆敢要你喊救命。

有一天我们傍河扎营，天气十分晴朗。我刚冲好凉，坐上吊床。才看到些许树叶漂流在清澈见底的河水之上（这说明上游正下雨），突然惊见一层高出清水面三、四尺的黄浊浊的洪峰排山倒海地盖过来。顷刻间，原本不上三尺深的小清河，这时已成湍急咆哮的“大”黄河了。

事前，有一个同志过对岸去砍板督芯，把鞋脱下搁在河中心一颗比人高的大岩石上。那知道当

他回来时洪水已十分凶猛，水性好的他十分吃力，勉强游了回来，脚已被撞伤，鞋更不知所踪。

这条河看起来地势十分平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凶急的洪水呢？摊开地图一看，才知道其发源地三千余尺，落差太大之故。

既然准备重建基地就要储藏菜。在当时来说，普遍的打猎能力还是差，因此决定毒鱼。

毒鱼前夕还险些发生一宗“命案”。事关一天沿河行军后，在河边扎营，决定第二天一早从这小河的上游放药。领导还带了几个同志去上游查看放药地点。本来我（这时手折已痊愈）和怀坚约定到营地以上河弯处一个小潭游泳。由于她还没有空，我就独自先去。小潭位于沙滩边，并不阔，潭水清澈见底，看起来很浅。脱掉鞋，我就冲入潭中游。连三脚猫功夫都没有的我才扒几下水就气喘吁吁，于是就站住休息。天知道脚一放下水就没过头顶。呀！这么深！这一吓心顿时慌乱了起来，很努力地想再“起脚”游，可总浮不起来，而脚在河底一顿一顿的竟把身子推向更深处。窒息的味道太不好受了，趁着浮上来的那瞬间想喊在急滩处洗衣的几个同志。但声音还来不及发出，反而是“咕噜噜”水倒灌入鼻入喉，呛得额头刺痛难挡，身体又毫不迟疑的沉了下去，这时更是窒息得慌。就这样挣扎始终不得要领，但头脑始终十分清醒，心想大概要等半小时后，看河的同志回来收尸了。

洗衣的几个同志在急滩哗哗声中听到我“嘭嘭”几声后就没有下文了，还在议论着。后来也不知道听到什么异声，几个人大叫着奔过来，“阿

婆”站在浅水里把手伸向我，只轻轻一扯就把我拉上岸来了。灌了一肚子水，挣扎了这么久，我整个人都快瘫掉了。结果一整晚头晕得不行。从此，我发誓若要自杀，第一条一定不选当水鬼，那种长时间在清醒中的煎熬太划不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以营地为中心点，我们拿着自制的背篓、“捞基”等工具向上游进发。来到目的地，就在石头上把白药搅碎，撒在河里，我们也跟着逐流而下。过了大约半小时，开始有鱼在河里慌慌张张地东闯西闯，他们的样子让我想起昨天的自己。时间久点，有的鱼就浮上水面挣扎了，而我们则满河追着、捞着，一些女同志则在沙滩上杀鱼（一块大点的扁平石头就是天然的砧板），然后陆续运回营地。守在营地的同志则负责腌鱼、煮鱼，傍晚时则起大火烘鱼。

这些鱼大多为二、三指阔的小鱼。当晚我们单单以鱼为粮（大概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煮的小鱼刺多要很小心吃，吃了一个多小时竟不觉得饱，看来以小鱼为主粮是行不通的。

这些毒来的鱼若不快速去其内脏，很快就会腐臭掉。这次毒鱼收获相当不错，约有几担（第二天清晨，在下游还能捞到鱼），不过这些鱼吃起来不但失去其原有的鲜美味道，而且还带有苦味，吃后肚子不舒服。印象中这是最大的一次毒鱼行动，也是最后的一次。

“阿德哥”历来身子骨单薄易病。这次长途、艰苦的撤退更是把他累倒了。

清晨五点多，炊事员已起身炊事。身为卫生员的我想乘机熬些草药给病人服用。才走向厨房，就感到脚外踝给什么叮了一下，下意识地踢了一下，用手电筒一照，只见是只大蝎子。找来药油在伤口处搽了一下，觉得不怎么疼，也就没加理会。可是没过多久，感到舌根有些麻痹。到了七点用早餐时，发现以舌根为中心，麻痹感正向四面八方反射开来。意识到中毒了，我站起身想拿一颗猎枪子弹请男同志帮忙掏出火药来。可还没有站直身子，整个人竟晕倒在地。

由于太慢服用火药（注二），以致毒发至全身。在将后的二十四小时里，全身每一寸地方都像蹲太久脚痹般刺痛酸麻，又像千万只蚂蚁在身上不停地咬噬攀爬。最严重时连吞咽都困难。由于神经系统受到干扰；我这二十四小时内走路成了耍“醉拳”，我明明是迈步向前走，可身子却莫名其妙地东倒西歪。

在森林里活动，我被蝎子叮过多回，每次伤口都剧痛难忍，但对身体无大碍。这回并不怎么感到痛，结果却中毒。

这一路撤退要算我最多事，除外，增坚同志大概因为饥饿缘故，全身抽筋走不动以致须要人背着走。这次的撤退路线是从未走过的新路，加上饥饿体弱，有的同志还得背人，有的还得背多支枪或者背包，因此队伍前进得很慢。

几经辛苦曲折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安全转移到乌也河尾靠近阿纳河（达斗河上游）尾的大森林里，建立了新基地——“一号点”。就是在这里，我

们掀开了北加人民军史新的一页；我们勇敢地挑战肚子，以一种从来没吃过的粮食替代祖宗十八代留传下来的传统粮食。

从此，在两年多的岁月里，我们几乎全以板督粉为主粮。

(注一)：我们在营地里挖了几个约五尺深、三尺深、三尺阔的洞，洞壁上及洞底插着柠檬树(一种棕榈树)皮制成的尖棍(这次驳火前刚好撤走了尖棍)，洞口盖着与周围一样的草皮和落叶。

(注二)：火药里的硫磺有以毒攻毒的作用。凡被毒蛇、毒虫咬后，快速服用火药一般就没事。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火药都能服用，我们通常是服用原庄的猎枪子弹的火药。



国内初建生产地一角

民族工作的片段回忆

- 黄祥云 -

一九六一年，我响应革命组织号召，参加开展秘密的民族工作。

巴厘河(BTG. BALEH)为拉让江第一大支流，水流湍急，到处布满险滩，不识水路者常造成人财两失。巴厘河的两岸，除了岸边一带被群众砍伐种植山稻外，深入地区是原始森林；那里不只是地区辽阔，而且山高地险，只要争取到当地的群众，必能成为我们开展游击斗争和建立基地的好地方。

当时被派往加帛开展伊班工作的十一位朋友是郑勇生、黄志平、叶宗洪、江莲辉、刘义忠、黄民生、江志航、林玉江、杨和我。当时加帛镇虽小，但也深受白色恐怖笼罩，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避过当局的监视和逮捕，向巴厘河进发。

(一) 向伊班区进发

大约在1962年，一天清晨，我们十一人分成四个小组，从加帛后山一位支持我们的群众家出发，直奔加帛码头。在那里早已有一艘挂尾车(舷外摩多)等候。船开航了速度非常缓慢，就像划船一样，机器又不好，走走停停，有时还得靠岸修理，因此遇到不少当地群众而造成暴露。当船转进巴厘河时，水流更加湍急，船速更慢。于是郑勇生就决

定接见那里的群众，并向他们借一艘大船和一架大马力的挂尾车，同时换熟悉水路的群众驾驶。这一来，不到三个钟头就达到我们的目的地第一站KAMARI河。但同时也造成轰动，有可能这是日后发生事故的祸根。

到此，我们又分成三组在GAT河、Merirai河（皆为巴厘河支流）及巴厘河上流驻定。从此开展了那里的群众宣传、医药、劳动（福利）工作。由于我们的实际努力和模范行动，在群众中赢得良好的形象和威望，使群众对我们保护有加，避开了当局两次的调查。

来到这么深入的伊班区，许多问题是我们始料不到的。比如靠书本学语言容易乏味；向群众学习，没能搭上几句话；人生地不熟，造成一些人夜间睡不好觉，常倚窗思念家乡。我呢？与领导有隔阂，与当地群众语言也有隔阂，心情不够开朗，还有环境变了，许多同志水土不服，接二连三生大病，我也是其中一个。有一位因为不能适应而回到华区去。

（二）病人加帛医院

当我发高烧、昏昏沉沉，脚步都站不稳的时候，老郑决定把我送进加帛医院就医，同时告诉我只要讲清楚是不必付医药费的；在加帛的同志也会照应，说完掏出十元给我。就这样我住进了医院。

在院里，医生把一块大如砖的冰用布包后缚在我的额头上。多天的呕吐造成身体十分虚弱，我多么盼望有亲人或者同志来看我。左盼右盼，终于在第二天中午加帛的同志给盼来了。他问我的病情

及要吃什么，要用什么，需不需要帮忙等。我顺口就说这里有医生、护士照顾，没什么需要。就这样，他一去就是整十天都没再来。这一来，我又有着急了，仅有十块钱，怎么够还住院费、医药费呢？只好硬着头皮向院方表明钱不够，结果获准以十元还。

出院了，病是好了，但体质仍十分虚弱，走两步就上气不接下气，好不容易才达到加帛市。心里盼望能找到同志处境就会好些，那知道直到傍晚还是仍无消息，可人却累得要命。在这个举目无亲、人地生疏而又身无分文的情况下，几乎难倒了我。突然，我想到曾在加帛西南一幢空屋开过会和过夜，也只好到那里去看看。但那荒屋已上了锁，还好有个窗子没关紧，我顺手一拉就开了爬进去，於是就在那阴森森的、据说闹过鬼的地方过上一夜。由于太累了，倒头一睡就天亮。

第二天会不会找得到那位同志呢？胸中无数，心想昨天已饿了一天，今天总要解决吃的。于是东翻西找，找遍整个荒屋，终于找到一毛钱。后来就用这一毛钱买了一粒“罗地”包充饥。肚子有了底，又开始第二天的寻找工作。差不多又跑遍了整个加帛市，才看到那位同志从码头上来。原来是刚从诗巫回来。

在那位联络员的帮助下，很快我就随着一位上巴厘河的小商人回到了伊班区，见到了老郑同志。

（三）开路上边区

不久后，老郑接到一个重要的指示，要开路上边区。他选了体壮又能闯的老江和另一位同志。不知何故另一位同志没来到，老郑临时又决定由我代替。

我们准备了锅、盘、刀、衣裤、被褥等，同时还从群众中借来一支猎枪。大约是在1963年3、4月间的一个早晨，我们从茅屋出发了。由于当时根本没有跑山的经验，又不懂得看地图，只凭一股热情和年轻人的魄力上路了。

老郑一马当先，背着一个“乌约”，左肩挂着一支枪，右手握着一把刀；每跑七、八步远就向大树砍一刀，转弯角地方就多砍几刀，就这样一路记号。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前面有几只山猪经过，老郑、老江不约而同地喊道：“山猪！山猪！”这一喊，山猪群一溜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下午行军没多久，天公不作美，下了一阵大雨，跑不久就扎营休息。老郑、老江去砍小树搭营，我就负责炊事。由于下过雨，跌在地上的柴表皮全是湿的，无从辨认里面到底是干木还是湿木，只好一把抓。可是炊事时就倒霉了，淋了一次又一次的土油，吹了一阵又一阵，却不见火苗起，因为心急，只好再加多油。在那里搭营的老郑看了不耐烦说：“像你那样倒法，不到两三天就完蛋，我们还能上得了边界！”最后为节省土油我只好靠嘴巴更使劲地吹，逼得我鼻涕一把，泪一把才总算把这顿饭煮熟献给大家。

第二天早上，老郑起大早去炊事，我看他倒土油的次数不比我少。吃饭时揭开锅一看，饭全是夹生的，为了赶路，大家只好吃一些。生饭不好吃

，到了下午成冷饭就更难吃。看到火还未灭，就顺手把锅放在火灰上烤一阵，再打开一看一饭熟了。於是，大家高高兴兴上路了。

经过一天的爬山涉水，第二天下午我们就可以找干柴、好柴，放进“乌约”里背着，看到大片的叶子，也把它摘下放好，供晚上和第二天早晨当扇子用。当晚，轮到老江炊事，我就和老郑搭营。可是到开饭时，仍然是整锅的夹生饭，我叫他们等一下，自己拿去再烤一下，不久就有熟饭好吃了。吃饭时，老江就建议路上由我炊事，他们负责搭营，老郑也同意。于是一路上由我负责煮饭，只有两次因为脚疼，才由老郑代替。

在那原始森林中，我们曾经见过峡谷中的深潭旁的陡壁还停着许多蝙蝠。当人们经过时，它们就倾巢而出，我们还遇见各种奇岩怪石；有很平滑的石壁、还有像大桌子般的岩石，人还可以睡在上面，还有像椅子般的怪石。由于被这些奇特的岩石吸引住，看了又望，竟忘了继续前进。

行军到了第六天，进入一条河。此河布满大石头，有许多高过人，大过大树，走起来十分吃力，尤其因为没有穿鞋脚更疼。大约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后，当我们踏上一条横木过河时，发现前面清澈的大水潭中浮游着大大小小的鱼群。突然，一只大鱼朝我们的方向游过来。老郑眼明手快，举枪就打“砰”一声巨响，浪花溅得老高，鱼早不见了，可是开枪的人却来个仰天倒，还好他背上有个“乌约”挡着，否则打在石头上，后果不堪设想。

到了第七天，所经过的河是比较小了，但据后来跑山经验看来，要跑完这条河至少要大半天，

甚至一天。我们很快遇上一条群众走过的路，沿着它上了山，跑不到十分钟就发现群众砍树和拉藤的痕迹。翻过一座又一座山，上到了高点，举目一望，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老郑以为这就是边界了，大家高兴谈论着，继续向前跑，跑呀跑不知怎么兜了一个圈子又倒回原来拉藤和砍树的地方，大家顿时泄了气。于是老郑就说，现在已是六天半了，粮食不够，只能回去算了。

归途中，粮食少了，背上的重量轻了很多，加上是归心似箭，路也熟悉，他们两个跑得老快。可我呢？一只脚拇指头突然剧痛，跑起路来一拐一拐的，速度非常慢，被他们抛得老远。就这样他们先跑一段路，就休息下来顺便等我，一直到扎营地。

当晚，我没做集体的事，自顾个人冲凉休息。饭后不久，老郑把我叫到眼前，手里拿着一把小刀和一些药布，对我说：“你坐下，那里痛，让我看看。”我平常用针刺肉都很少，那里用过刀，所以就顺口说：“我怕”，老江在旁鼓励我：“不怕”。老郑也说：“你不挖，明天休想跑回去。”于是我只好闭起眼，战战兢兢给他挖，只觉一阵痛过了，敷上药，坐了一阵，倒头就睡。到了第二天，老郑起个大早炊事，准备早早跑。我心想，今天也许更倒霉，没想到一踏地不痛了，这时才真正从心里感谢老郑给我的这一刀。

（四）风暴降临巴厘河

大马成立在即，伊班区气氛比往常紧张，当局进行最后的登记，而且紧接就在我们的长屋逮捕

叶宗洪同志。由于老郑机警和老叶的保护，他得以逃脱。老郑回到后山的茅屋，召集我们开会，对形势做了估计和安排，希望我们能坚持在伊班区。于是他就倒回华区。不久之后，我们听到他遭逮捕的消息。

当时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群众的情绪也不稳定，常劝我们走为上策。当时我们还隐蔽在后山的小茅屋里，离长屋大约一个钟头行程。我们本来是靠割胶为生，刚好那时老天不作美，雨老是下个不停，大约十多天没能割胶。在那较休闲的日子里，为了更好的跟群众打成一片，有时就和一对伊班青年夫妇打扑克牌、捉“安都”，大家都玩得十分有趣，嘻嘻哈哈的过日子。我呢？也在其中学了不少伊班语。有时，下午时间也常到其中的稻芭去帮助做些劳动福利工作。

事情很凑巧，有一天老杨想到长屋去卖树胶，遇到发洪水，本来涉水就可到长屋，这时水却涨有二丈来高，老杨只好游水去。一到长屋，群众叽叽喳喳的告诉老杨：“早上有一艘兵船到我们长屋，因为水大，我们又不肯帮忙，结果去了上游，上面八位同志被抓了。”还说明早要再来抓我们。群众建议如果这地方不安全，是否先回去，以后再回来。老杨带回来的这个消息使我顿时感到事态严重，而且力促老杨当晚到长屋，第二天早上就下加帛，一定要赶在对方前头。于是我们到深山稻田里找芭主。事情真不巧，他们上山打猎去了。据说要半夜才会回来，这时真为难，继续躲在深山里吗？群众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来保护我们，想来想去，还是走为上策。还好群众七点已回到，吃了饭就整装上路，这时已是八点了。

到达长屋已是九点过，收拾好东西已是十点了，心想该好好的睡一觉，明早好上路。没想到雨仍下个不停，而且隔壁可能是捕了很多鱼，叮叮当当砍个不停，吵得我们根本无法入睡，后才朦朦入睡。醒时天已大亮，我们匆匆忙忙收拾行李，化了装，戴上草帽，等待出发。芭主不知是累还是天凉好睡，八点多了还未起床。我们心焦急，但又无可奈何。结果差不多十点才动身。大约十二点左右，我们的船正从巴厘河出到拉让江，一艘兵船与我们擦身而过，进入巴厘河。

终于，我们安全到达加帛市，踏上新的征途。



上图为黄祥云友与房月梅友留影於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友协常年大会前。

当年生活、战斗、经历

艰苦活泼的游击生活

- 红兵 -

清晨，在祖国的一处丛林中，传出宏亮的整队的口令声，“立……正”随着口令声，就是人民军一天生活的开始了。到底人民军是怎样生活呢？这是人们很想知道的，这里就介绍一些。

政治大学

每天早上从6:30到7:20分听新闻（主要是北京和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8:00到8:30就自学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或学习其他革命刊物，这时到处可以看到同志们聚精会神的看书、做笔记。每天晚上八点半进行集体学习，有时主讲，有时采取集体讨论。长期政治教育使干部战士养成了热爱学习的好习惯，经常在深夜或凌晨可以看到小小土油灯下同志认真学习，甚至在执行任务的疲倦中一些同志的灯火仍然亮到深夜。

此外，经常还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政治集会，如：忆苦思甜、时事研讨、思想问题的研讨、亮私会，等。通过这些会议对指战员们进行政治和思想教育，同时也有效的提高指战员们的文化水准。在忆苦会上指战员们申诉着人民的痛苦，民族的灾难，家庭的不幸……，在烈士节和追悼会上献上花圈，戴上黑纱，缅怀牺牲的战友，指战员心中呈现无限崇敬的深情，决心踏着血迹，把战旗高举再高举。在动员会上指战员纷纷向党，人民表决心，立誓言，一定把



战士们在进行军事训练



战士们晚上在小油灯下进行集体学习

武装斗争进行到底，要为革命多作贡献，要为革命献青春。在群情激昂，热气冲天的大会上，同志们互相挑战应战，比思想比贡献；座谈会上指战员畅谈国内外形势，谈学习和斗争的新体会，胸怀祖国，眼观全球，对前途，更树雄心立壮志；在讲评会、评比会、检讨会上，指战员各自对自己缺点进行认真严肃的自我批评，然后彼此又进行热情而诚恳的互相批评，全体指战员在坚持原则，改正错误的精神指导下不断改造，不断改进。党的一批批好儿女，好干部，出色的领导就是靠这些政治教育和实际锻炼相结合而培养出来的。这是任何旧式大学办不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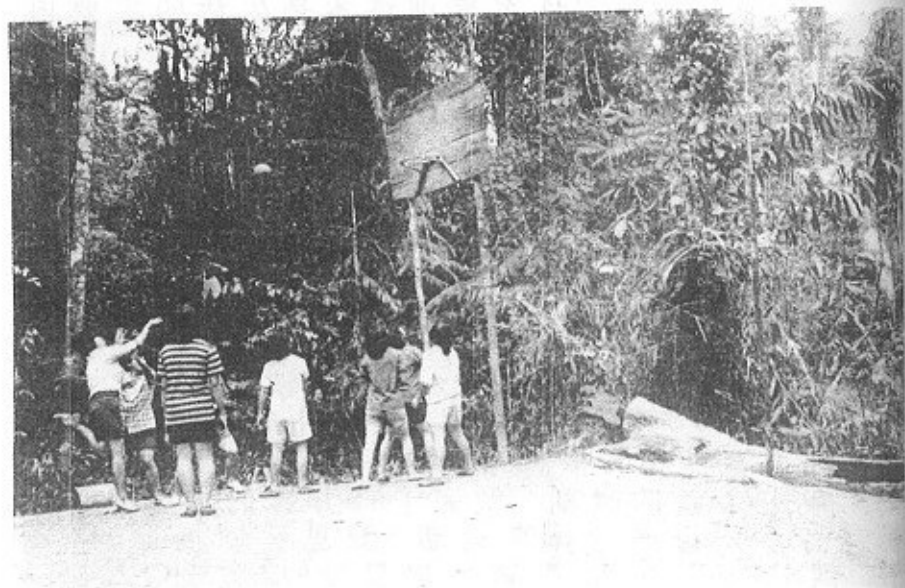
军事训练

做为一支军队，军事训练本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但是，我们这支军队，由于受到种种的限制，军训是很不够。尽管如此，指战员们仍然克服种种困难，进行我们所能做的军事训练，如军事上的基本功：操步、持枪、卧倒、爬行、滚地、拼刺、夜行军、射击……等等，条件许可或情势需求下，也做好实战实习。军事训练是辛苦的，但作为一个军人，务必要要求自己能够胜任，我们就是在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下，要求自己提高军事上的方方面面，站稳军人的岗位。

为了增强体质，指战员们每天早上进行20-25分钟的广播操和其他体质锻炼。傍晚5点是整个营地一天里最活跃的时刻。做完了15分钟的军操，接着就进行不同形式的体育运动。只见运动场上，“一下、两下、……五下”“这是轻量级的，重量级的来”



羽毛球的比赛吸引了一批热心观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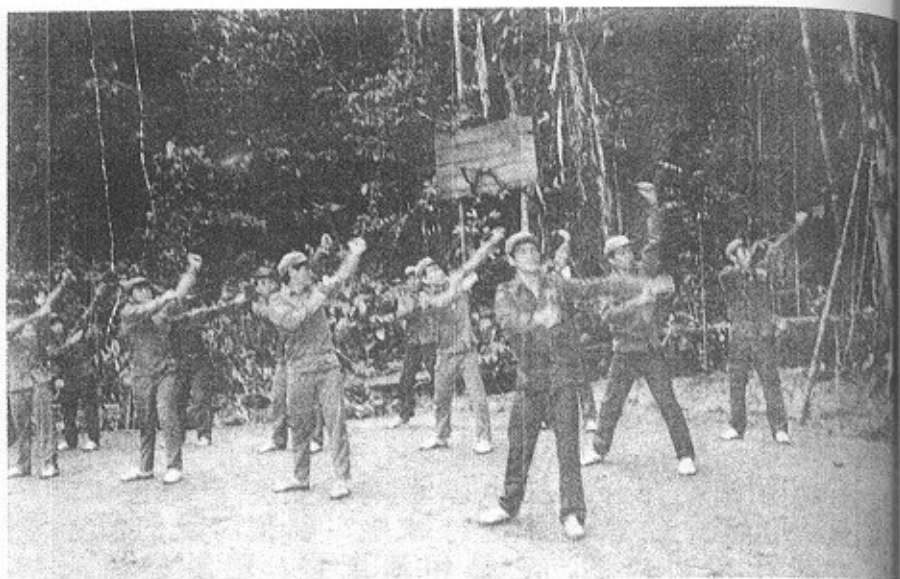
特制兰球的运动也有一批爱好者

这是同志练举重：“加油，XX同志出点力”，左方胜一点了，不行，右方的同志又用力一点，双方相持了，真是龙争虎斗，势均力敌。那边同志正在使劲进行拔河；再看周围，有的同志正在练单杆，有的练爬树，有的练背重，有的练挑重，有的练过独木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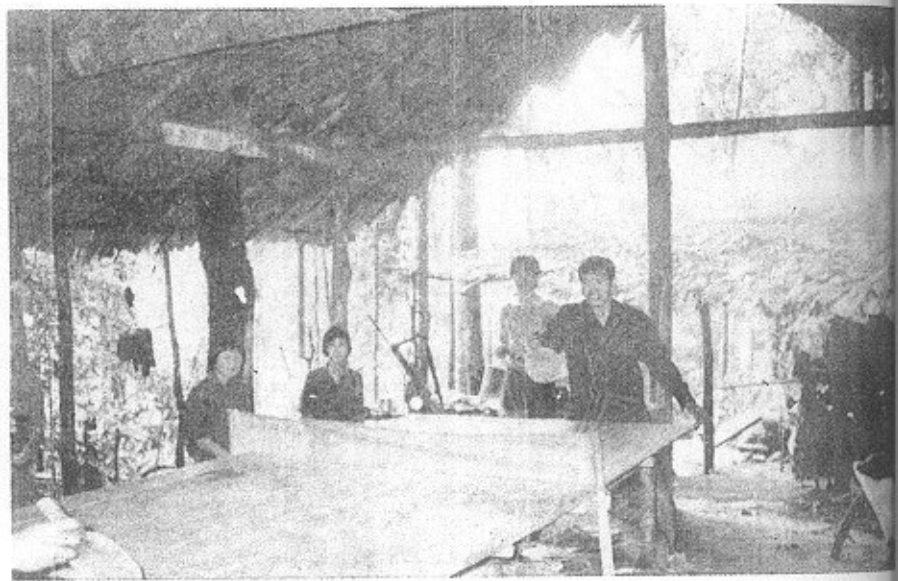
特别引人兴趣可算是打篮球，这是完全游击风味的，球场在山地稍掘平就行了。有的地上有些树根也没关系，球场大小没规格。可是在烂泥芭到处流水，处处是烂泥那怎么行呢？别急，同志们想得厉害办法就有了。把木头树根弄平，拉来树皮，搬来烂木，铺上一层树皮烂木混合料，就是一个球场。尽管有些地方凹凸不平，那也不影响跑烂芭路的游击战士。但这样的球场怎么带球呢？别忙，我们的篮球是与球场相适应的，它是用油纸袋、肥料袋捆成一个圆团或用藤编成的不带球专靠传球，自然这里就有一套“创新”的球规了。至于球架则用小木代板，球栏则是有圈没有网。尽管设备是这么“老牙”，指战员玩得劲头可真足。时间一到就要等着轮，晴天汗水满身流，雨天一身雨水加泥，时间到了还舍不得停，多抛一、两粒球也爽快。

此外，还有玩乒乓球（自己锯板做乒乓桌），每当星期天就分组进行友谊赛，那玩得就更激烈。为了更好的增加同志们的运动热情，我们还举行运动会，虽然规模很小，但大家都以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参加，在比赛中彼此不因胜败而计较，反而还鼓励对方，为对方打气，对方胜了还上前握手祝贺。各个项目都超出了平常的水平，真是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联欢会上乐趣多



战士们每天早上做军操和体操



打乒乓球也是战士们的一项热门运动

文娱晚会，几乎每个同志都喜欢，特别是年轻小伙子更不必说。演出前的几天，负责文娱的同志可忙，又编舞、又编剧，又要写诗歌、快板……又要排练节目，练了一遍又一遍，有时甚至练到深夜。节日的晚上，大字横副，小字标语，挂在舞台背后，精朴美观，又富战斗性，火红的灯火照在会场上，只待节目上演。有的是反映现实斗争的内容丰富的歌舞剧；有感人肺腑的军民关系、英雄烈士的先进事迹和部队生活为体裁的话剧；有生动活泼的相声、快板；有鼓动人心的诗歌朗诵、诗歌造型、诗歌表演，还有对口词、舞蹈、表演唱、剪影、舞狮、杂技……等等各种多姿多彩的节目。观众时而对演出报以热烈的掌声，时而笑得前俯后仰。在自由节目上花样也不少，在激动人心的场合下，许多不大会唱歌、跳舞的同志也上台表演一番，只见他指天比地的比比划划，笑得同志眼眯成一条线。

健康富有教育意义，欢乐愉快的文娱节目使干部战士心情舒畅，乐观积极，热情洋溢的去为自己的理想贡献力量。

我们的物质生活

为祖国求解放，为人民打江山，我们需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生活。平常保持一菜一汤或两菜一汤，指战员们也吃得津津有味。为了改善生活，使同志吃得更香更好，同志们自己动手开荒种菜，经过一段时间的辛勤劳动就可以吃上新鲜美味的青菜。手艺精巧的同志还自己制造木磨，“咕噜噜，咕噜噜”磨了豆子做豆腐或豆腐水，磨了白米做白果（米

旁)，豆腐好煮汤，白果(米)炒青菜，样样清香好送饭。在可爱辽阔的民族区，自然界的物质就多了。上山可打猎采野菜，下河可钓鱼摸螺。这里很值得介绍的是一种伊班群众叫“板督”的棕榈树，它的嫩芯可谓山里的名贵菜，如果加一些肉类煮一下也算菜馆里的一道上菜。在果子飘香的季节里，真是福、口福、肚福都一齐来，各式各样的果子使我们肚子保持常满，多的果子则成为我们的主要菜类，不完又可晒干或腌起来。这时期野兽也特别多，猎手在就不愁没肉吃，真是既解决菜类又节省了米。节日聚餐时有条件我们就尽量向自然界伸手，搞出菜类的花样、名堂、味道都不输於用钱去买的。我们决不像他们宣传饿得那样可怕，实际上我吃的东西的种类比未参军时多得多。但我们也决不主张大吃大喝，我们的原则是在勤俭节约、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尽量改善物质生活。

官兵一致同甘苦

共同的理想抱负，艰难困苦的生活，生命随时遇到危险的环境，使官兵们更能体会到彼此之间，互相依靠、扶持、爱护、信赖、团结、合作的重要，因此很能做到官兵一致同甘苦。除机密问题外，一般问题都在会议上讨论解决。官善于带头，兵严于服从，物质生活上，除非条件许可，或实际需要做特别的安排，否则都是同吃一锅饭，同喝一碗汤，同配一色菜。当然作为干部或中间份子，一般上都谦让得很，工作上干部们处处都得模范带头作用，当然战士们当中也不泛好样之辈，透明也在起督促，甚至模范的作用。

联欢会上战士在台上表演，领导在台下喝采，领导在台上唱歌，战士在台下助威，有时战士拉着领导跳舞，有时领导拉着战士唱歌，无拘无束的欢乐气氛，更显官兵之间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生动现实。

我军也有少数领导和干部有特权思想和作风，官兵之间也有些不团结的现象，然而这些不正确的思想和作风，不是我军的宗旨和思想，是我军所反对的，要受到批评和纠正的。

边区，可爱的地方

- 永战-

想您，

古老的丛林，

爱您，

可爱的丛林，

您，是我们游击队活动的好地方，
是我们游击队生存的好地方。
在边区那块古老的丛林里，

看哪！

高山青，
绿水深，
更有那蓝天阔。
雄鹰翱翔在蓝天，
游击健儿们却奋战在这块
古老的土地上。

这里，

看不到冉冉上升的炊烟，
只见茫茫云雾缭绕山间。

这里，

少有人们的往来，
却有那么一块肥沃富饶的

土壤。

游击健儿们哪！

在这古老的丛林里向荒山
要粮。

马罗河边，

健藤壮树垂阴，
犹如在诉说着游击健儿们
战天斗地顽强斗志。

马罗河边，

辽阔起伏的青苍稻田，
犹如在诉说着游击健儿们
美好愉快的生活。

马罗河里的鱼鳖，

马罗山上的山猪野鹿，
犹如在诉说着游击健儿们
无穷乐趣的日子。

古老的丛林啊，

游击健儿们给您换上了新装，
寂静的马罗河水啊，
游击健儿们给您带来了畅快的欢笑。。。

爱您，

古老的丛林，
想念着您啊，
边区的好地方。

“ 波涛滚滚，浪滔滔，马罗河边武装红旗迎风飘，披荆斩棘，顽强奋斗，建立了人民的武装……”

每当哼起这首歌时，就不免使我回忆起在边区两年多的战天斗地生活，马罗河边的一幕幕，如影历历，内心里不无泛起阵阵激昂、愉快的情感。

边区，那是块印尼和砂拉越第三省交界的某一块地方，是块古老而没有人烟的地带。在那里我们北加人民军曾建设过基地，坚持了六年之久的武装斗争，在这段岁月里，我们过着艰苦朴素、紧张而又愉快的生活，如今回忆起来，还是蛮有意思的。

以下作生活点滴的介绍：

束紧腰带砍大树，战斗歌声遍林野

在那毫无人烟的地带里，要生存，解决粮食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但面对一片原始森林，非得下开辟荒山的苦功不可。人民军，那会被荒山缺粮所难倒。人民军立志在边区建基地，用他们坚强的革命意志攻破一道又一道的难关。

1968年，那是部队建军第三年，也是比较艰难困苦的一年，也是部队最为缺粮的一年。本来按原来的人数，粮食是会够的，只是后来又从第二支转来一批整训人员，以及从印尼连队起义回来一部分同志，粮食才显得周转不灵。

一方面缺粮，一方面又得开荒生产，这就得看领导上是否领导得当，负责有方了。

根据当时的困难处境，领导上紧抓政治，有力的促进了生产劳动。一场轰轰烈烈的“三查运动”就在那时开展的。在“三查运动”的推动下，同志们个个斗志昂扬，干劲冲天，一百多人的队伍，气势汹涌的向生产战线进军，把这个古老沉静的荒山遍野闹的热火朝天。

当时的食粮配给每人每餐只得2安士饭及三两块的木薯，一般食量的人也只能添塞胃里的某一个角落而已。砍大树，流大汗，费大劲，消耗大，可以说，同志们上到工地上砍没几阵子的功夫，肚子肠胃就“闹革命”了。但见那一伙特选的砍大树的能手健儿们，扎实腰间的汗巾，又是一斧头上，一斧头下的轮砍着。汗水浸透了衣裤，气息呼呼抹把汗水再砍。这工地上不但没有饿肚的叹息声，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一阵又一阵欢乐的歌声伴着噼噼啪啪的砍树声，传送在队伍里，飞扬在林野间。

听吧，“开荒哎，开荒哎，咱们的部队要军粮……”那是一首开荒生产歌。“……有了军粮好打仗，好打仗，为人民我们不怕流血汗不怕流血汗。为革命我们努力干，努力干……”那是一支生产打仗歌，再听“人民战士，身负重责，解放祖国，不怕牺牲，敢于胜利……”那是“三查运动”之歌。问一声，为什么歌声处处飘，支支动人心啊，原来领导上在这艰苦的日子里，为了活跃同志们的生活，和激发同志们的革命热情，在开展“三查运动”的同时也附带开展一场作歌比赛运动。领导个个带头做，同志们个个踊跃跟，怪不得支支歌来，支支

新，支支唱来鼓热情。歌声能把疲劳驱，歌声能把干劲添，歌声能把激情扬啊，精神变物质，生产进度大增加，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砍下了一百八十多亩的森林地。

丰收

三月天气晴又朗，曙光初照基地田，北加儿女多奇志，荒山要粮得丰收，金灿灿的阳光天空照，金灿灿的谷穗在稻田里摇，微风吹过，金色的稻穗，波浪起伏闪金光。

几个月前，每当早晨及黄昏，路过稻田时，站在高处远眺环视田时，那青苍苍壮实而又挺拔的稻苗，被微风吹拂抚弄时，如波浪起伏，我们心头喜悦，盼着稻苗长，望着稻苗长，望着稻苗大，如今收成了，同志们更是个个喜上眉梢，拿出十足的劲头来准备抢收。

稻浪里的人们，个个横肩一个‘仙冬’，手里拿了支割稻刀，飞快的剪割着稻穗。

“来，来，来，我们来个比赛，看谁割得快，看谁割得干净”，“好，我们应战。”

“哎呀，你们已割了两“仙冬”了，我们还没呢！同志们，别落后，加油干呀”。

真是加油干呀，争上游，稻浪里钻动的同志们，个个都紧张的抢收，没人偷闲，没人松劲。一“兰支”一“兰支”，一“加龙”一“加龙”的稻谷从四面背到踏谷厂，踩踏后，再一包包的运往谷仓。

那是劳动的成果，那是生存的保证。

上山有猪，下河有鱼

有钱人喜欢上菜馆酒楼吃山珍海味，我们游击战士们却在那荒无人烟的地带吃到不少山珍河味，稍有生活能力的同志，在这荒山僻野是饿不了的。在同志们中经常讲着一句话：“上山有猪，下河有鱼，不怕没好吃”。确实如此，无人烟地带，兽类鱼类多着。

我们刚到边区会师前，边区同志就在两个鱼湖里拦抓了几百公斤的鱼，打了几十头山猪，猪油和鱼油合起来有两大汽油桶。

每逢星期天或过年节，指挥部便派整小队的人马出外渔猎，有出有收获，许多时后收获都很可观。有段时间，人力足够，较常出去狩猎，指挥部还特地通知，小条的兽类不要打，要大条的，免得浪费子弹。

渔猎回来的鱼和兽类，吃不完。为精打细算，我们把鱼晒干做成咸鱼。

去了部队两年多，除了吃到山猪、吠鹿等这些比较常见的野兽外，还有如山人（注一）、猴子、山鸡、山猫、山狗、刺猬、鼠鹿、水獭、狗熊、犀鸟等几乎都吃过。

马罗河有两种可口的大鱼。一种是“打巴”鱼，一种是“白鳞”（注二）。“打巴”鱼大的有五

六十公斤，“白鳞”大的有三、四十公斤，这两种鱼肉味都很甜美，尤其是白鳞鱼更是嫩滑甜美。

打猎要有一套本领，钓鱼也要有一套本领，我们同志在马罗河边学会了这一套本领。初时还不大钓，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才越来越善于钓了。朝河里望去，他们会懂得那里是水深水浅，那里有鱼，放钓后，八成九成有收获。

钓鳖也是件趣事，鳖肉好吃，它的蛋就更可口，可是要钓它可没这么容易。初时同志们还不会钓它，鱼饵一被它吃到，鱼线就被咬断。后来同志们摸索到它的规律，也像钓大鱼那样，放长线和它对拉，等它疲倦了再把它拉上来，后期我们倒是吃了好几只鳖，大的有三十多公斤。

有一次，有两位同志从国内到边区去搞联络，由于处理不好，没联络上，他们没粮食了，谁都担心，可是这两位同志一个枪法准，一个会钓鱼又会爬树，他们每天都是吃山猪肉、鱼肉和果子，因刚好是果子季节、榴连和其他果子都吃了好多，两个人一路吃着回到点，不但没有瘦，反而是吃得肥胖了。

又有一次，有三位同志出去做船，由于做船没空，他们没有去钓鱼打猎，只在“点”的周围装“帮约”（注三），这几位同志会选地方、会装、收获丰富，他们每天工余时间去巡视一两次，没有空手回来的，不是装到山鸡、山猫、山狗的就是装到鼠鹿、刺猬、雉鸡等小动物，他们天天都吃得很满意。

总之，边区的原始森林里丰餐佳肴多得很，有生活能力的同志，不但饿不了，而且还会养得肥壮。

集体生活

营地范围很大，刚到边区时，晚上活动，差点迷路。一百七十多个人分别住在几间长形的“朗高”，此外还设有总部、指挥部、卫生处、出版处、总务处以及一间大厨房。虽然这些“朗高”都只是用“亚答”盖屋顶，树皮做围墙，但都收拾得整洁朴素。

营地生活，每天5:45分起身，7:00吃饭，7:30分集合，听出版处同志读新闻（两天一次）后，就由队长分配工作任务，8:00出发工作。这是一般生活时间，如有抢收抢种等，上工时间提早，晚上五点放工。白天，由于同志们各自分头出去工作，营地很寂静无声，早上出发前和傍晚放工回来的时间，营地是最热闹，一片熙来攘往，热热闹闹景象。晚上集体学习一个钟头。星期天学唱歌，学习分成甲、乙、丙三大组分头进行，甲、乙两组是学毛主席著作，主谈和讨论形式结合，丙组是学文化。

边区基地文艺人才齐齐，人集中时，开起文娱晚会，节目可多得不得了。我们刚到边区为了欢迎我们和庆祝建军三周年，开了联欢会，足足演了三个晚上（每晚从八点演到十二点），才把节目演完，节目内容多姿多彩，舞蹈、歌唱、话剧、造型、剪影，各类乐器演奏，各种曲艺节目，应有尽有。

边区基地炊事人材也很够水平。一百多人伙食全都由一个扩大班(大约十五个)负责,不但要煮饭,还要煮木薯(煮木薯花工,要剥皮,还要切),人多了各种病痛的同志也较多,还要吃各种各样与一般不同的饭菜,煮的菜样多,更吃力的是还要从一百多级阶梯下河边挑水。工作任务繁重,但炊事班的同志却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服务周到,过年节时,更是忙煞炊事班,过年节部队采取聚餐形式,煮的菜色也是又多又好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部队做的糕饼花样多之又多,单一种木薯就可以做十几二十样糕饼来,还有南瓜糕、糠糕……等等,蒸的、炸的、煮的样样有,每到过年节吃糕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聚餐时可热闹了,在广场上,临时作了个大方形架环围着,架子是窄方长的用两三条稍大的木架成,放饭菜。同志们个个拿着自己的饭碗,各自找个位置。聚餐开始后,同志们不但可以在原位上吃,还可打游击到处去敬菜。这时官长敬士兵,士兵敬官长,兵兵互敬,官官互敬,欢乐成一团。

卫生处收拾的最为整洁,各种药品排列整整齐齐。里面还有用白布帘围成的诊疗室,卫生人员负责精神很不错。同志们有病痛都到卫生处由卫生处直接处理。有段时间,同志们较多毛病,卫生员每天清早饭前,还到各pos去巡问一趟,查看同志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很使人感动温暖的是,中队长每晚十一、二点时都到各个pos(营房)去巡视查铺,看看同志们睡觉情况,或催促迟睡的同志睡觉。

没有盛装的用具，也不用发愁，森林里有各种各样的藤，多好的藤都有，上山采集各种藤类。靠灵巧的双手，把它编成各种各样的盛装，各种东西的用具，普通常做的有背谷或其他东西用的“兰支”“拉龙”，采谷或装米或其他东西用的“仙冬”，盛装衣服布料的藤兰，还有一种叫“拿刀”的叶子采回来也可用来编织草席、“加龙”、“仙冬”等。

马罗河上撑船

从图片上看中国桂林湘江的人们撑船是多么悠闲自在，但在马罗河上撑船可不那么简单了。马罗河可称得上是我们边区基地的“大动脉”，也是唯一的运输要道，我们的粮食和绝大部分的物质都是用船在马罗河上运载。马罗河为我们边区基地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河尾地方，河床很浅，马罗河上急流险滩多，下雨时，河水又容易暴涨，洪水来时，一秒中内河水流速达一二十丈。可以想像在这样的河上撑船该有多难。然而，再难也难不倒北加人民军的指战员们。1966年蔡建国中队长下决心造只船试撑，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征服马罗河，撑船“老哥”（我们叫撑船同志都这样叫）们后来就能在马罗河上自由的撑驶。

撑船老哥们个个都是人高马大，力气大，但个个都熟悉水性。但尽管如此，他们撑驶时，还是要很认真谨慎，尤其是发洪水时，河水倾泄而下，船却要逆流而上，一疏忽，或关键时偶一松劲就有翻船的危险。乘搭他们的船，坐在船内，都会在内

心里经常的替他们使劲。来到一个急滩头时，只听队长喊一声跳，其他撑船同志都各自跳到适当的地方，再喊一声“一、二、三，拉！”船身很快就被他们拖拉前进，过关时，大家一定要紧密团结合作，大家都长着同一个心眼要过关，否则困难就更大，更费力顶。有些地方人不能下河推拉，他们就用一条大绳绑在船头，用牛力硬硬的拉过急水险滩，在跟急浪头搏斗时，要十分灵活又要使出很大的气力。老哥们经常跳上跳下的，不顺势时跳倒，滑倒碰伤的事，是好常见的。这门工作确实是要有硬功夫才行。

〔注一〕：山人即红毛猿

〔注二〕：即 Semah 鱼

〔注三〕：伊班牙语译音，即在小动物出没之处设路障，在留下之处设圈套，以便把路过的小动物吊起。

勤俭节约

边区基地，由于远离群众区，运输困难，又是白手起家，勤俭节约是很需要的，除粮食上要自供自给外，其他如衣著、日用品等不能自供，就非节约不可，同志们的衣服多是补钉又补钉的，一般都保留一套较好的，油布、油纸袋、被单、纱龙等都是缝缝又补补的用着。

食格坏了没得补充，有的同志就利用敌方飞机丢下来的汽油桶，自己敲打成食格（这种食格不漏又很耐用），有的则用破了的饭锅，重新敲打成食格。

没有电池，手电不能用，初时我们用土油灯提着照。后来，土油也难拿到（很少的土油只供给指挥部或中队级，卫生处及点打火机用），我们就用打马土，树皮代替。森林里有的是打马土，一“拉龙”一“拉龙”拾回来后晒干，挑选不会爆喷的放在一块平而较坚硬的石头上点着看书写字用。虽然，用打马土点火，火光比较会跳动，光线也不够亮，但在边区，勉强还能顶着用，没有土油，没有电灯，也不会虚渡晚上的时间。我们甚至走路都用打马土做灯，我们收集些比较厚的劈好的烧火柴树皮，打马土点着后就放在树皮的一端，用另一端捧着走动，甚至晚上放钓抓鱼也都是用它。除了打马土外，有的树皮也很好，皮厚的不但能做火头，大片的甚至也可用来走路用，去较近的地方，如厕所或去邻近，点燃树皮就如一盏灯笼，树皮的火光胜过打马土，它跳没那么厉害，火光也较亮。逢年过节，拾来多多的打马土，点燃它几堆，也是照得广场亮堂堂的。

喜看土厂出“洋枪”

- 敢攀 -

暴雨哗哗倾泻而下，“砰、砰、砰”刺耳的枪声在深山老林中，冲破暴雨的阻拦，在峻峭的群山中间回荡。“北加土制史登林成功了，成功了”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同志们眉开眼笑，喜出望外，枪声欢呼声那样的宏亮，刺耳和有力，是给广大的革命军民一个巨大的鼓舞，同时宣告了我军在武器制造上攀登一个新的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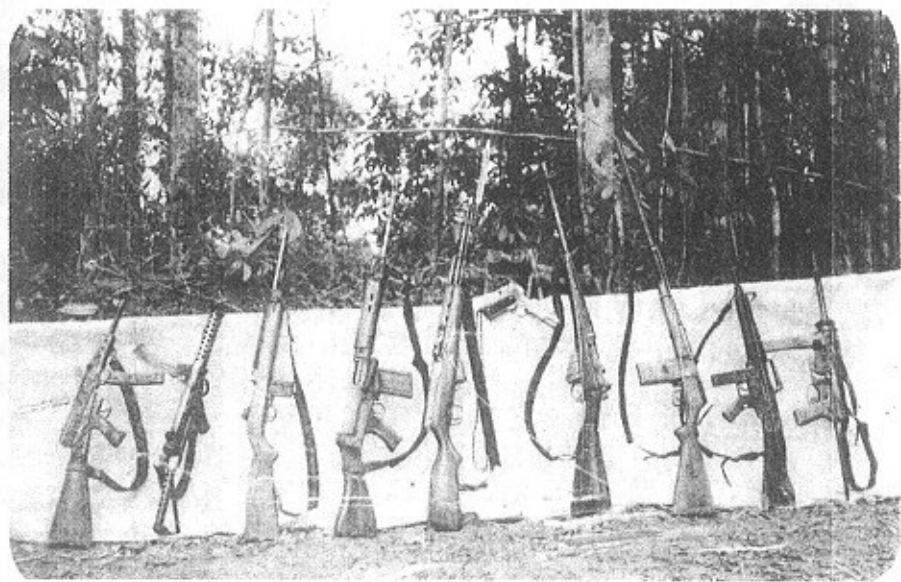
“洋枪”出于土厂

我们的“洋枪”史登林，不是出于大城市、小市镇的工厂，而是出于人烟稀少，荒山僻野的老林中，不是高楼厂房，而是设在地洞里，侦察不到，不懂的人还以为是个小山丘，它周围群山叠叠，连绵起伏，绿树丛生一片葱郁。

兵工厂深二丈，长三丈，阔丈许。其实像一个长方形的大水井，上用纵横木交叉，盖上草席，再用泥土压上一层严严实实，这就是兵工厂的屋顶。顶上开了四个玻璃窗，一个进出口，进了门有个十级的木梯，厂里一个长长的工作台，台正中架上一个手摇钻，左右两边各摆设一个虎钳，在工作台的左边尾端还架上一架自制车床，在台的上方用几根木一插上几条木，就把器具放在上面。工作台后用了三根长木一放，遮上油纸袋，就是座位。为了防土崩，还用了一些木支撑着使其加固。同时为防涝



兵工厂的部份工作场所正在工作中



人民军各种枪械一瞥

积水，还开了一个流水洞，穿通山壁。厂里空气是较为不好，呈现闷热阴暗，有一股热热的泥土味道。厂里设备简陋，有的同志说它像一只潜水艇。也许有人会怀疑，这样的兵工厂那有这样的本事，就是这样的兵工厂能造出现代化的史登林，这确是一个奇迹。

做枪同志们的战斗生活

黎明，东方刚现鱼肚白，做枪的同志们就起床整队，做操听新闻。7:20吃了饭，8:00自学了半个钟头，就穿起用面粉袋缝补的工作服，迎着微微的晨风，顶着艳丽的朝阳来到了兵工厂，开始了一天的战斗。

同志们进行了有组织的计划和分配，你做枪糟，我做撞桥，我做风管来他做弹盒。有锯有磨，锯到手发酸，头冒汗，发出了有节奏的响声，使人听了感到充沛有力量。磨的同志站稳马步，左手钳钢针，右手使劲的转动，磨石飞转似“摩多”的轮那样飞溅出火花，近看使人眼花缭乱，远看的真像那五彩缤纷的晶晶烟花，又像高炉上奔泄下的钢花，光彩夺目，使人感到喜爱。那钻台更有意思，右手一摇，咔啦啦、咔啦啦的不断作响，钻头抓着钻针不断往下钻，它的胃口真不小，一分二分一寸都无所惧，有的同志们还作个顺口溜，“咔啦啦，咔啦啦，使劲往下钻，多厚都不怕，钻穿给你看，只是不好把我扭扭了就完蛋。”钻出的条条铁弹壳，细细的铁粉末，有的打趣地说：“好铁质，煮了拿来吃，包你肥胖又结实。”顿时哄堂而笑。看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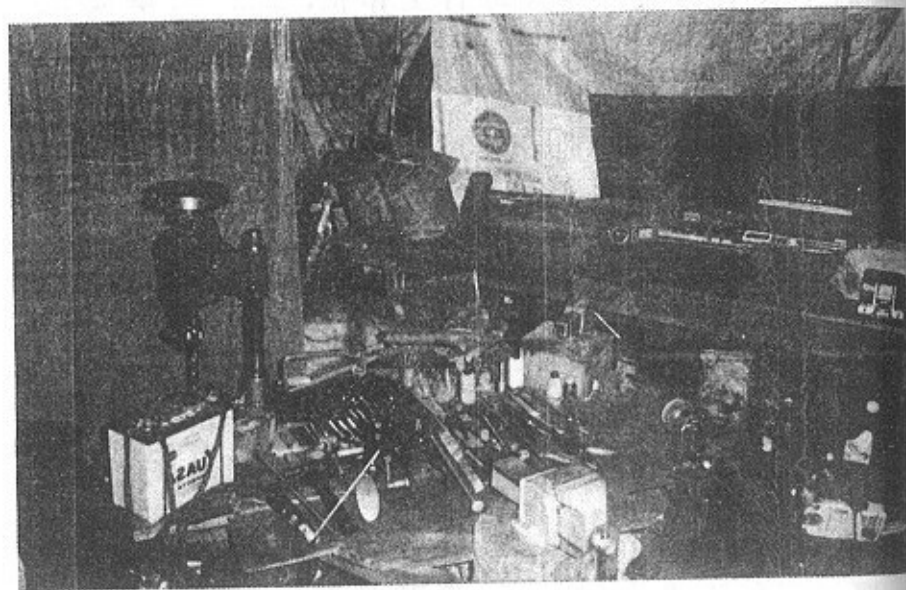
打锤同志，真像个铁匠师傅，抡起的铁锤一砸下之有力，声音刺耳使人发麻，有时砸偏了，落在手背上，刺痛人心，但同志们还是不喊一声，咬咬牙，挥挥手又继续锤下去。当某个技术发生难题时，就你一个意见，我一个方法，他一个主张地研究开来，充分发挥了团结战斗的威力；攻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头做晕了，眼看花了，手做酸了，全不在意，汗流夹背，用手揩揩，疲惫了歇歇又干开了。不管有多么的艰苦，多大的困难都没有我们做枪同志的决心大，因此也总是有那样一股用不完的劲。

同志们虽然身处兵工厂，仍然不忘天下大事，把收音机放在兵工厂里，收听国际新闻，注意着世界的动态。有时还播放悦耳的歌曲和音乐来充实精神、调节生活，不时不时还可听到同志们唱“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忙，……”“革命战士满怀激情放声歌唱，我爱革命，我爱武装，我爱部队……”歌声脱喉而出那样的悠扬。加上各种作业声的“伴奏”，旋律那样的婉转，像一曲攀登武器高峰的战歌、进行曲。外边的同志们怎不为他们的精神所感染而鼓舞。

太阳逐渐西沉，晚霞映红了半边天，这时夜色的阴暗，像黑色的帷幕笼罩了兵工厂。同志们才爬出兵工厂，看他们手上的油腻和脸上的黑点，人们取笑他们是小花猫，他们带着劳动后的愉快心情，满面笑容，在“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做枪，把营归”的欢快歌音中，迎着黄昏，踏着归途，结束了一天的战斗。



兵工厂头手李勇在工作



小兵工厂内部修器具

自制新枪人赞人爱

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们都是那样地战斗着，一把、两把、三把，史登林、卡宾、伊宾出厂了，同志们看了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声声赞好，新枪转到别的单位，同志们奔走相告，看了又看，摸了又摸，都异口同声的赞好，是我们的争气枪。同志们背上它，用它来侦察巡逻和战斗，背上它用来宣传群众，群众还以为我们拿的是洋枪。我们同志说自制的，他又以为有中国的技术人员帮助我们。同志说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技术人员，群众激动万分，瞪着大大的眼睛又是看又是摸又是赞好。时而瞄瞄时而背背，更加积极支持我们，比如一个群众本来捐三百元给革命，后来看了自制枪多捐了二百元。

向武器的新高峰继续攀登

自制史登林、卡宾、伊宾等枪支，枪声已在拉江畔悠扬的回荡。有了上级的坚强领导，有了大家的鼓励和支持，做枪的同志们将奋发出新的更大干劲，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做不躁，更紧密的团结战斗，不断的总结经验，向武器的新高峰攀登，力求作得更多更好，让枪声在祖国上空悠扬的回荡！

潜伏在地下

黄厚基口述
弘扬整理

隐蔽自己，保存力量，才能发展力量。

当时泗里街是一个红区，革命者经常要面对追捕和围剿。当时还未有武装，又要在群众中活动和工作，那么要怎样隐蔽自己，保存力量呢？我们想出了一种办法——潜伏在地下。

所谓潜伏在地下，就是挖掘地洞，住在地下，有些工作就在地下进行著。

那末，怎样建地洞呢？首先要选择个地点，要比较隐蔽的，可靠近群众不远的，周围群众要好的，靠在山腰，最好一向比较陡斜（流水洞比较容易做）。用锄具挖一个水井，井上用板铺过，铺上漆布，再盖上泥土。在井底朝向陡斜处挖一个流水洞，在井上旁边挖几个气洞。这样做，很会漏水，而且一次洞内墙土崩塌，还好当时没人在，没压到人。

后来，我们寻找改进的办法。改用梁木倾斜横放在井口，铺上漆布，再铺上木板，最后才堆放1至2尺厚的泥土。在洞口做一个洞，人能钻上进入就可以了。洞内墙土四面栽上木，再铺钉上木板。这样就不会漏水和崩塌。做个木架，就可以在地下煮吃、工作和睡觉。

地洞建好了，地面的掩饰工作很重要。尤其

进出口与挖上来的泥土要用就地草皮枝叶掩盖，以至种上草木或菜类加以掩饰，要做到，有人从地面经过不会引起怀疑，不会发现地下之乾坤。然后跟群众做好联络，身处在群众保护之中。

地洞里闷热潮湿，阳光不足，皮肤感到黏湿湿的，空气不足也不流通，感觉到不舒服。特别是雨季来临，地洞经常积水，空气带有霉味。晚上点灯带有土油烟味，蚊子进入叮人，若点蚊香味道更不好受。同时，讲话，开收音机等声音要控制好，炊事也要注意味道和声响，有敌情时白天不炊事。没有必要，尽量减少进出。这样的环境住久了肯定对身体会损害。

除了利用地洞来开会之外，主要是用来搞出版印刷工作。跟我一起战斗的是XX和叶富盘（注一）二位战友，陈明存战友（注二）有时也会来，我们主要是负责《农民报》出版工作。陈明存主要写社论，其他的撰写、编辑、刻写、核对、印刷等全由我们三个负责。

1966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共住过四个地洞，二个在红柴山，一个在老巫叻，另一个在邦铎。在住地洞期间，发生过一件事。一次，我们听到群众家下面有可疑情况，於是打开洞口专心倾听，听到有讲伊班话声。我们就离开地洞，没留意一条听收音机的电线没收拾好，露在地面。还好士兵从地面经过没有发现。

一次在红柴山的地洞，当时有三位同志在里面。他们听到田芭方向那条平时走的路有谈话声。小心露出头一看，发现有二个伊班人拿着钓竿，一

个还佩着巴冷刀，另一个拿着猎枪。他们正要盖洞口，却被对方发现。地洞里没有武器，只有XX拿一条水管，富盘拿着菜刀。他们商量准备冲出去抓，XX把水管露出洞口，伊班人以为是枪赶紧跑去。他们出了洞口，富盘拿着菜刀冲出去，XX跟上去，把富盘拉回。他们紧张收拾东西后转移。伊班人后来去报兵。

除了建将近十尺高、长、阔的住人地洞之外，我们还建有小型的地洞，主要用来放贵重之东西，有时也供一个人紧急时潜伏之用。

地洞是当年斗争的产物，也是我们很好的屏障，在人生的旅程中，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历史痕迹。

[注一]：叶富盘(活用)是泗里街泗锋人，曾担任下游战斗队副队长。1972年2月5日，他带领的麻雀组在Scheme B炸了地雷后，转移到牙兰坡，在旧点驻下。由于行军暴露，他们被敌兵搜索到，在驳火中他和诗巫人檀遵林(福生)同时牺牲。

[注二]：陈明存是伯特利人。他主要负责泗里街的农运工作的县委级干部。由于有人密报，1967年农历正月初五，当天凌晨四点多，兵分二路从群众的路直闯到群众的胡椒园，并分别包围了同志们住的二个“兰高”。陈同志住在里面一个小茅棚，正好他去水井拿水，政府兵扑个空，当他发现有敌情时，赶紧去前面一个小茅棚通知另2位同志，但那个“兰高”早已被包围，政府兵喊叫着，他转身就跑，在乱枪下，牺牲了。

当年我吃在边区

丹心

谈到“吃”，在整二十多年的下乡生涯，应该是驻扎在边区的两年多最苦了。

1968年九月头，我们第一批上印尼边区的同志，刚到边区马罗河基地没几天，印尼的空军就来我们的营地轰炸扫射欢迎了。马印夹击，使得我们的大部队必须撤离。主要精装人员和装备都被调派到位于第二省边界的一、二支队，或进第三省国内，剩下些比较没有战斗力的留守在边区基地。

我们这些第三省国内来的弱队员（我算是一个），大约有十几个被分配去“二·四”点背粮。当时拿不到稻芭的杂粮时，就只靠2安士的糙米和盐头来维持生活。背完粮，一部分同志转到另一个位于Embaloh河尾的住点，附近有一块由我们三省国内来的同志参与砍伐的稻芭。

为防备印尼军随时天上地上来进袭，我们的稻芭不敢砍大，天气又不好，稻芭烧得很糟糕。我们三省国内去的同志，劳动力很差，面对那一棵棵倒下的大树、树枝和那些攀缠的野藤，除了头痛还是头痛。我们一伙儿只好耐着性子，把这些树枝野藤一刀刀，一斧斧的收拾成堆来烧，但像这种刀耕火种，没有干柴烈火是不容易烧好的。于是乎，我们只好有奈无奈的把它锄成“厢”来种番薯，以及到各处的杂木空隙里插木薯棍。

治这杂乱无章的荒芭的第一个疗程，好不容易渡过了，我们几十只眼睛就盯着那番薯藤长出来

了吗，已有多长了？“唉”，“唉”！老天不长眼，连番薯叶都长得不好（根据我现在种菜累积的经验——那应该是刚开发的地，烧不好，晒不好，地太寒，故野的像番薯叶都不肯长。）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有位朋友生病，大概是人热到吧。我们采了可怜的一点番薯叶给他泡汤喝，都引来不愉快的非议。这时的我们与天斗、与地斗，那来的“其乐无穷”，一群书生子（也许只有我是那样吧）只能望天长叹！那时的我们每天都只有两安士的糙米饭和着些盐头（那是从印尼运来的方块盐），两安士的糙米饭够在那里？早上吃多了，午餐就干瞪眼，想要午餐享受吞咽之福，早餐就得忍着吃少些，这样的时间应该有维持一年多吧。偶而运输队的老同志们有抓到些鱼或打猎的同志有打到猎物，才有点腥味，要不然我们就天天、餐餐白蒲叶，黄瓜叶的煮来充饥。

有段时间，我们拿不到米粮，就空着肚子去稻芭工作，采黄瓜充饥，可那是太斋了，吸收不了，只有泻的份儿。

后来，三餐都有木薯吃，那是好日子。那时我们吃木薯，怎么吃都不怕，热吃固然好吃，冷冷的木薯照样吞食不拒。有时有机会呆在营地，煮好饭后，埋着些炭火，用大油桶盖放在火炭上，把木薯放在盖上“Ben gan”（烧烤）倒也感受到烧烤的香味。

我那时是发育期，刚好是大吃的时后。“吃”对我来说，真是莫大的考验，整天脑里转来转去，好大空间是被吃的问题困扰。

有年节时，部队一般都有庆祝，而每当庆祝

都尽可能使战士们吃得丰富。庆祝节日之前必先派人去打猎抓鱼。如果时节恰好碰上收成，就配上地里的木薯、南瓜、黄瓜、冬瓜、毛瓜等也是洋洋大观。

节日里就有山珍、河味还有糕点。糕主要是用木薯、南瓜做成，这时后我们的做糕能手可得大忙特忙。这些能手们有小兰、珍娜、秀琴、亚莲等。她们的巧手会做出各种各样美味可口的糕来，有蒸的、有炸的。有一种糕是用番薯做馅、木薯做皮，反正都是薯薯加在一起变戏法的。

在庆祝的时后，像我们这样的战士，早就准备要饱饱的吃它一顿。一到当天，就完全准备就绪的吃，不急不躁，不鲸吞，不虎咽，细细咀嚼，慢慢品尝。那才不会吃坏人，才能吃出味道，而肚子才能装得结结实实，才会确实确实有饱的感觉。不过往往是这样的，其实已经是饱了，但还感觉不到，还要吃，把个胃撑得太大了，于是乎，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地活受罪。糕点多数是平分的，因此我们女同志往往还会剩下一些，但那时可舍不得给别人吃，留在枕边，自己慢慢享用。

由于粮食的不够，因此厨房就经常成为是非场地，诸如偷吃、分饭不平均等，我自己煮饭时就曾经偷吃过。那时早上4点多就要起来煮饭，用军用桶煮，天亮以前就煮好了。这时肚子就饿了，先吃些到肚子里填填。那时煮饭也不轻松，记得曾住一个“点”，那“点”没有小河，要到大河里挑水，那楼梯我看有一百多级，煮饭的每天都要负责挑水，那时我还是个十几二十岁的姑娘家，常挑得气喘吁吁。分饭时要分得很平均，要不会引来不满和议论

。现在想起来，当时大家都是很年轻的一伙，由于“肚子药”不够而引起许多纠纷，真是见怪不怪，情有可原呀。

有段时间，我们穷的什么都没得好吃，除了那两安士的米和一点生盐。因此肚子实在很饿很饿，经常都觉得饥肠辘辘。我们只好从地里把大量的白蒲叶采回来（地里只有白蒲叶），用军用桶煮来充饥，那叫做骗饱肚子。长时间的肚饿和肚斋，造成一种欲念，总想着要拿什么吃的来塞肚子。那个时后练就了我的好胃口，我什么都会吃（除肥猪肉外），什么蟒蛇肉、大头鸟的肉、猴子肉，什么山猫、山狗，什么乌龟、鳖肉的都吃。其实，那时的味芯和嗅觉都很迟钝。只有肚子的饱胀是最重要，那时不知什么腥味、臭味（有的鱼卤得很臭，照样吃）。我这一辈子就只在那个时后，最能感受到肚饱的痛快。

没东西吃，像我这样不会抓鱼不会打猎的人，有机会就去河边拾“山花生”（其味像花生，树的果，有毒，要剥掉壳，在流水里浸一夜才可煮来吃），上游下雨涨水，往往会冲下来搁在河弯处。在砍芭或去树林里有时有采到“山番薯”（藤生，样子像番薯，更是有毒，要多次煮过，再用流水浸泡过后才可以煮来吃）。

我曾在谷仓磨过米。在谷仓磨米有个好处，就是能有幼糠饼充饥，每天磨完米，我们就把米粒和米碎筛出来。把剩下的糠再筛一次，筛出幼糠来，那幼糠里还夹杂着很少量的米粉。我们就把这些幼糠混和着水，弄成圆饼状，放在火炭上烘烤，虽然口感粗糙，有苦味，但却是很好的充饥食物。

有果子季节时，我喜欢到河边去溜达，希望在河湾处，河神会留下些什么食物。最幸运的是拾到河上游飘来的山榴连，一打开就能吃，味道又香又美。再其次是“尖必达”，“尖必达”多数不熟，但没问题，拿回来煮了就是好食品。生榴连拾到也是拿回煮了吃，榴连和“尖必达”的核是好东西，也是又当菜又当饭的煮来给大家吃。

砍芭砍下大树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吹雨淋，有的树树身上就会长出菇来。能吃的，也最常见的有“白菇”和“Kou La 菇”，每当大雨过后，我喜欢拿着篓子去采。“Kou La 菇”很小，要很耐心的采。采回去渗在木薯里煮，多点量，多点味道，也多点营养给同志们。

由于食粮的不够，才有国光同志因吃毒菇而差点被毒死，才有毅力等因吃癞蛤蟆（它的卵与皮有毒）而被毒死的事。虽然有这些前科经验，但老实说，我还是很常去研究各种的菇类和树叶，希望能拿来充饥。山里我们最常吃的树叶就是“Ka Lan Bai”那是一种山橡胶树，它的叶可以吃，有遇到我们都会设法爬上去采，甚至整棵树砍下来，再采来煮了吃。老同志看到我问这问那能否吃的，就经常告戒我说：“不可吃，不可试，很危险的”。

就在1971年，我离开印尼边区最后一个基地进华区的路上，我是还在挨饿。回来路上还有件吃的事要提呢！都说了我们留在边区的多是老弱病残，那么远的路途，大约要一个月吧，我们又不会背多少米粮，肯定要挨饿的，到第一站时，Piyang 河的一条支流，白鸽支队长发动大家毒鱼。用“白药”来毒，鱼是毒死不少，但我们整个队伍人员也因吃这些鱼，而被毒得好惨。白药毒的鱼，本来要一段时

间后才可以吃，但我们很快就煮来吃，全体朋友，除秀琴外，都闹泻肚，泻到第二天没力气走路。

这次行军也是半饱半饿的，一回到华区，华族群众挑来饭菜，菜并不丰，饭可是大锅。我当时的一下子就吃了一饭盒的饭（当时我们用的是中型的铝制饭盒），虽然肚子是很饱了，但是总觉得还饿得很，要吃到站也辛苦，坐也辛苦时，才会止住食欲。

回到华区后的相当一段日子里，我经常还在享受着肚饱的痛快。自那以后，在华区，在民族区，在边区（第二次上边区）虽然都有面对饿肚的时后，但和这第一次边区的两年多饿肚比，都是小可的事了。

边区，边区，那是我渡过二十年华的时后，也是我锻炼肚皮胃肠的艰苦岁月，我怎么都不会忘怀啊！

紧张、刺激、有惊无险

~ 回忆几次惊险的经历 ~

- 鹏翔 -

一、连环遭遇战

一九七二年杪，OMT 单位举办来自三个单位百多人参加的“毛主席著作天天读”代表大会。会刚结束，各单位领导干部还未分散，部队里出现一位新兵回家探亲，而被其家属强迫向当局投降的事件。领导上估计在两、三天内当局必然会派大批军队来“围剿”，各单位的代表必须赶在这之前分散。一方面命令我连夜赶到民运组带一批新同志，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以便兄弟单位带走。

我与一位来自边区的爱国同志，及七位参军四个月至一年的同志，带着五位刚参军数天的新兵，（除了边区老同志配一支半自动来福枪及两位新兵没配枪外），其他十一位全部配“北加来福”自制猎枪），日夜兼程，把三天路程缩为两天一夜。第二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到达营地附近，已发现多处当局军队搜索过的痕迹。凭着地形的熟悉十二点左右回到营地，〔注一〕营地里空无一人，从营地的情况及路上痕迹来判断，大队是在得到情报后主动转移，大营地还未被发现。这时每个同志，尤其新兵已精疲力尽，走不动了，只好大着胆子在旧营地过一夜再打算。

第二天早上不到七点，放哨同志通知说，来

路方向有响声，估计当局军队搜索来了。队伍马上转移，走了约二十分钟，越过一片刚砍光树木的稻田芭，到树林边停下来休息。我们发现对方人马已跟踪来到稻田的另一端，有两个还爬上倒树干上寻找我们痕迹。情况十分紧急，我忙下令“狙击组狙击”队伍立即向前撤。可是，才走几步，狙击组的枪声已打响，接着对方的机枪声、手炮声像暴雨般打得树枝、树叶劈里啪啦响。这一来，尖兵同志怔住了，几位新兵更加慌乱。我忙走上前面，一边跑一边喊“不要紧张，跟我来”，队伍很快就撤到一块来。

驳了火，要往那里去？背包里除了两罐干粮外，（注二）什么吃得也没有。幸好有三个同志略懂得离此三天路程处有个藏粮点，于是决定向北撤。

这时一个新兵脚抽筋走不动，就由两个同志轮流背着他，前进的速度十分缓慢，一路上越过不少敌兵刚搜过的痕迹。中午时分，直升机不停在多处降兵、盘旋，显然，是在重新布署兵力。下午三点多，正走在一片长着两三尺高草芭里，突然两架直升机低飞而过，可以清楚看见机上的飞行员，我们只好伏在烂芭里，等直升机飞远了再继续前进。越过烂芭上了山坡，刚停下来休息，又听见来路烂芭里“噗通、噗通”的跑水声，由远而近，显然是对方的人跟踪而来。“狙击组掩护！”队伍迅速往另一向山坡撤去，下到山，狙击组的枪声又响了，尖兵同志就要往对面山顶走，那里除了“龙基”草外，尽是手腕大小的小树。想起“四二九”（注二）血的教训，我忙喊：“不行，跟我来！”沿着旱沟尾，兜上另一个山头，回头一看，“糟糕”只跟来四个同

志，怎么办？这时对方的军队已占据刚才休息的山头，呱呱叫。喊是不行，只好停下来等，又担心对方军队会再跟踪而来，心里不免紧张，思恩同志（余志发烈士）当时才参军四个月，握枪的手直发抖，但他还是一边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鼓励自己和同志们。大约等了约半小时，估计后面的同志不会跟上来，我决定从来路倒回去找，找到后面的同志时，天已蒙蒙暗，原来走在队列第六的同志，刚才没随前面的同志跟我走，而是自己往山顶开路，后面的同志跟着他走了一段路却跟不上，只好停下来。

吃过于粮，靠着手电筒的光，又在龙基芭里钻了几个钟头，大家都精疲力尽，半夜找个山坡扎营，说“扎营”，切恰点说是就地休息。把胶布往地上一铺，倒头便睡。

第二天不到八点钟，就听到敌方从山顶走过的声音，不久直升机不停的起落盘旋，显然又在调兵遣将。情况越来越紧张，而略懂得“粮点”的同志，经过昨天和晚上十多小时的“晕头转向”，也不知自己走到什么地方，该到那里去找粮。于是决定改变撤退方向，白天休息，晚上向南撤出华区。

傍晚，队伍沿着白天政府军搜索的路向南，不久就找到群众路，凌晨到达华族群众家，吃了三天来第一餐饱饭。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这里应该是当局的重点“围剿区”，陆上、江上必有重兵把守巡逻，突围不易。估计如果能越过三个坡到达明烟坡，应是当局“围剿”的边缘区，如能从那里突过拉让江，就能到达安全区。

队伍早上休息到下午三、四点，估计当局的

军队不会在芭里活动，我们从树胶芭向西走。傍晚接近某坡时，突然“轰隆轰隆”迫击炮声大作。刚听到时，有两个新同志还误以为又是驳火，习惯性的卧倒，有的在找隐蔽物。一阵子后，大家都习惯了，反倒觉得有炮声掩护我们撤退，必定更安全。有的同志每听一声看一下手表，计算多少时间再打一炮。那知道炮声越来越密，竟然几秒钟就打一炮足足打了30分钟，炮声停了，我们也到达另一个坡。吃过晚饭，决定半夜再从沿江群众路向西走。

考虑到队伍的安全，我走在最前面，第一尖兵紧随背后，第二与第三尖兵与我们相隔一小距离，又与后面的队伍保持一定的距离。夜半来临，乘着朦胧月光，队伍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安全越过一个坡，进入明烟坡。只要再越过四家群众家就到达预定渡江的目的地。突然，我感觉左边路旁胶林里有白色物体一闪，还来不及收住脚，只听一声喝“Siapa”我与紧跟而来的李同志向前一冲，卧倒在右前方路沟里，刹那间从喊声处传来几声枪响，我抬头一看，正对面的树头边（相隔一条丈多宽的路）一个人高举双手呆若木鸡似坐在那里，（估计是站岗的，枪声来自营地）我迅速扣一下板机，却不响！心想，这次准要挨打了，可是那家伙还呆坐在那儿，我也顾不得他，和李同志一齐撤到胡椒园背后。等了一阵却不见后面同志跟来，我俩继续向西撤，大约走了十多分钟路程，想到一群众家找只船过江。还未走到路边，我踩断一根小树枝，发出一声“啪”，突然，就在群众屋边喷出十多条火龙，乒乒乓乓扫了一阵又一阵，待枪声停了，我们小心从另两间屋子的中间出到拉让江边，拉着一条“马丹”游过江去。第二天早上顺利联络到领导同志。

走在第三、第四的两位同志，第一次枪声响时已很接近，就顺势一滚向东北方向撤去，黑暗中也未遇上后面的队伍，借只群众船，渡过拉让江，第二天也顺利与领导取得联络。

再说走在后面的同志，听到前面枪声，就沿来路倒回出发点，在群众的掩护下，潜伏一个星期。直到领导派出由百炼同志带领的麻雀组在下游打响骚扰战，把“围剿区”的大部份兵调走后，才回到领导身边。

这次三天四夜的反“围剿”，我们面对数百名对手的围、追、阻、截，经历了三天缺粮，四次驳火的紧张，艰苦奋斗，除了我和李的背包被打穿一个洞外，全部十四位同志都安然无恙（这十四位全部是男同志）。

注一：此营地位在华族群众家（拉让江边）后面十几分钟脚程的地方。

注二：“干粮”是用白米、黄豆、黑豆加白糖磨成粉，制成耐久、轻便易带的粮食，每位游击队员都配带一两包，准备紧急时食用。

注三：“四二九”事件是指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一小队同志与当局军队驳火后，队伍错误的向上面光秃秃山坡撤退，结果在对方强火力射程内，造成三位同志牺牲的事件。

二，实验土炮的性能

一九七一年八月间，随王领导同志到诗巫郊区工作，经常与民运组同志一起制造土炮土雷以供战斗组的需要。

有一天，由于怀疑某一批直径两寸铁管制成的土炮可能失去性能，于是和另一位姓洪的同志拿几枚土炮到群众胡椒园（离开住点才五分钟路程）。我们先把弹砂（用4分铁条锯成）挖出来，接下去是一层洋灰，要敲掉洋灰才能挖出火药来检查。我们用木棍和铁条敲了好一阵，都没办法敲掉洋灰，太用力敲又怕突然敲破洋灰，铁条与火药磨擦会引起爆炸。另一方面，也怕引起附近群众的怀疑，把土炮放进水里敲，声音较小，却使不上劲，怎么办？开动两粒大脑瓜，想呀想，终于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由我双手护着土炮浸到水井里，洪同志把土炮的短电线接到地面上，用电池一按不就可证明一切吗？

说干就干，一、二、三！谁知才那么轻轻一按，“轰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也不知是震动力，还是声浪把我推倒在一丈多远的地上。虽然耳朵嗡嗡响，可头脑却十分清醒，想起刚才那“绝妙方法”，真是幼稚到极点！不禁哑然失笑，我在笑，却吓坏了“点”里的同志。

听到爆炸声，看到遮天盖地的浓烟，领导同志带着卫生员和“点”内所有的同志飞快跑出来。刚到胡椒园边就听到我的“哭声”，心想“糟了，准是炸到人了。”走到我面前一看，才知道原来只是两个“聪明人”干了一樁“聪明事”，还有机会总结经验呢！

三，你是谁？

一九七二年也是在诗巫郊区的时候，当局利用少数伊班人，到芭里藉着“打猎”，实际上是寻找我们的住“点”。

有一天下午，两三个伊班人叽叽喳喳地十分靠近同志们住“点”旁边走过。同志们可以清楚看到他们的头部，究竟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住“点”？还是发现了假装没发现，溜走去报兵？为了预防万一，同志们一面收拾装备准备转移，一面加强放哨。我被分配到胡椒园边去放哨（原本放哨处在胡椒园与住点的中间）。

傍晚七点多钟，我突然听见来路方向急匆匆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到了胡椒园，只有几棵胡椒的距离了，我的心情也越来越紧张，是坏蛋？还是... ..? 大喊一声“Siapa”（是谁），对方也反问一声“Siapa”！这一喊使我更肯定了“来者不善”，说时迟，那时快，我一扣板机，“砰”一枪打过去，... ..奇怪！为什么对方没动静？心里才意识到不大对劲，回想刚才的口音，不很像伊班人的腔调。但又不敢肯定是误会，只好退回原来放哨处，准备万一坏蛋来，用土炮炸他个粉身碎骨。约等了二十分钟，突然听到草芭方向（不是来路方向）响起了联络暗号，啊，是自己人！

原来李华健同志在群众处听说“点”可能暴露，急匆匆赶回来，他没想到我会到胡椒园放哨，被我一喊，他最初也以为是坏蛋，就顺势一滚，刚好避过了那一枪，但也不敢从正路回点，过后又觉得不大对，于是先打联络讯号后，才从草芭开路回来，至此大家才都松了一口气。

四，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注〕

一九八六年的一天，虽然早已了解到，第四省的“德”木山驻扎两百多政府军在前山总站，但估计到依靠保干（支持我们的好群众）还可以秘密搞一批粮食。于是队伍开到后山一条支路，隐蔽在一个山头，由我与武波（李瑞金）穿上便装，带着一个防水帆布自制的小袋，装着一支手枪，到路上放下记号（树枝）。过了不久，那群众果然来到。为了方便，他和我们一起把车驶进一条很少有车跑的支路谈话。

我们把车停在路边，选择离路边约二丈远的一条“马丹”（木桐）坐下。群众告诉我们，政府军仍然住在前山总站，但不时会跟木山车进后山巡逻、打猎，叫我们要小心……。

不久后，太阳照到我们谈话的地方，我们就和群众转移到更靠近路上一处阴凉地方继续谈话……突然，我们抬头发现三个政府军手持M16步枪正朝我们走来，其中一个距离我们仅有五、六丈远了。怎么办？跑是不行了，对方的枪是提在手上，眼睛一直望着我们，而我们的短枪却放在帆布袋里，还放在刚才谈话的马丹边，真是说时迟那是快，对方距离我们仅有两丈远了，只要我们三人中有一个失常慌张，准要出事。幸亏那群众也十分镇定，我们三个几乎是同时微笑着向对方打招呼。我随口问他，“要进后山打猎吗？”不知是群众，还是武波同志也加了一句，“我们昨晚也有进去打猎。”也许对方看不出什么，只是朝我们稍微点一下头，越过我们了，但那双眼睛还是不停的盯着我们。大约距离两丈多远了，突然他停止脚步，眼睛盯着我

们自制帆布袋，我们假装没注意他的动作，继续笑咪咪的与后面两个兵打招呼，前面那个停了一阵，可能看不出我们有什么不妥，也继续往前走了。等三个政府军全部拐过转弯处，我们即刻与群众分手，拿了前次的战备粮，踏上新的行程。

〔注〕：我们同志不论是上长屋或在木山，与群众一比，多数人的皮肤显得特别白皙，往往容易招疑，这次事件要不是三人特别镇定，肯定出事，何况当时他们正在观赏一本部队的武装照片呢。

赤脚军队

- 山川 -

在五十年代砂罗越乡区小学生都是赤脚上学的，乡村的父老兄弟姐妹也大多是光着脚劳动干活的。也可能基于这个缘故六七十年代的北加人民军也是赤脚军队。乡区父老都亲切称呼这支军队为“没穿鞋的”。

“没穿鞋的”就成为人民军的传统，不仅减轻了不少经济负担，也为部队在隐蔽中行进起了积极作用。因为广大的伊班同胞也是光脚劳动，进山打猎的，使敌方分辨不了是人民军还是伊班群众。到了七十年代中，各地木山大肆开发，伊班民族大多穿鞋时，人民军才穿上自己的军鞋。那时穿的鞋大部分是胶鞋，胶鞋比布鞋好。我们经常行军要走烂芭和下河，不怕湿。同时鞋底有颗粒状的，遇上雨天的山路和跑河踩石头不易滑倒。

回忆赤脚军的历史，的确使人钦佩。尤其是出身在较富裕家庭、城市的子弟，他们从未光过脚走路的。他们要在祖国的大地里赤脚奔驰会有多大的考验与须有多大的毅力。

原始山林的地面比较光，较少杂草比较容易行走。可是那些经砍伐过的树芭，矮青芭，杂草丛生钩藤遍地，断枝烂木处处可见或经过茅草地，如基芭、邦督、柠檬丛、拉骚地、藤丛，遍地是刺，形同针。有经验的老战士像长了眼的铁脚板，自如的前进，没经验的新战士，战战兢兢地，不知脚板往那里踩。就是打起十二分精神，脚板还是被刺着不知多少回。

原来光着脚板走路，还有个大学问。不仅仅要练出铁脚板，还特别要眼明脚得劲，尤其是负重行军。眼睛敏锐才能立即反映到大脑，辨别那里有刺那里没刺，即使遍地是刺也还有那里多，那里少，还有刺的走向是顺还是逆向。比如邦督叶的针刺靠近茎部是直上，粗大、茎叶中至尾是偏向尾部方向，而且扁细，当您顺势踩去，不易刺中，逆方向恰好针端对准脚的着力点，自然容易刺到。脚力要足够，才能听从使唤。否则心有余而力不足，针刺偏喜欢找您麻烦。

记得七四年一次夜行军，带领小组由民族区到华区联络时，误踩中一支如同半截三寸钉粗的藤刺，断在脚板内，经小手术仍未能取出。经数月后才挤出，忆想那数个月的肉中刺有多疼痛。

又记得一次，夜间过乌也路十多哩一间伊班长屋。由于敌情不明，不敢走大路，到长屋时我们赤脚从这头摸到另一头。长屋楼下尽是猪狗屎、鸡鸭屎，还有玻璃碎……还好脚底安然无恙，只是踩到脏东西。那时我们的脚底练得能踩茅草根刺。

森林里还有一种吊线钩藤，特别厉害。它不但藤身有刺，还从高处藤尾垂吊下来如同排钩般。当您走过摆动它，就一条或几条同时钩住您的身上、背包或耳朵。如果此时您惊慌的随意摆动，就会引动周围更多的排钩向您袭击。所以遇到这种情形特别要头脑冷静，辨别吊线钩藤的位置，及其怎么钩法，逐一解脱。

赤脚行军，还有个难题就是脚底肌肉，脚趾部容易干裂。这可能是长期缺乏维生素的缘故，也

因为脚的着力点每天与粗劣外界磨擦，碰撞等原因。一般的朋友行军两天后就会出现以上症状，龟裂严重的会出血，遇到水或杂物插入特别刺激，可令您额上冒冷汗、刺痛到心里。当我们从山路下到河水中，要做足精神准备才敢下水。

赤脚涉河也是个 大考验。河床有沙石、碎石、卵石之别。沙石最容易走。碎石中有三角形的利石，容易刺伤脚部，卵石有大小之分，层层叠叠光滑，行走容易碰撞、滑倒，常常会受碰伤扭伤之苦。

赤脚行军回忆起来，难免有些人会觉得是一种苦差，也有少数人因为适应不了闹情绪，成为离开部队的原因。新战士也有因此埋怨老战士不体贴他们的苦衷。老战士也可以因为有一双铁脚板成为骄傲的资本，看不起新战士。如今回忆当年赤脚走天下，体现了战士们的勇气，也想到多少世代的 Apai、Indai 都是光着脚生活的，我们的赤脚战士们当年为了理想的实现，脚下被插穿了多少洞仍是咬紧牙支撑下去。

火药烧死烧伤的几宗事件

奋飞整理

1968年国内革命力量和边区武装力量胜利会师，紧接着北加人民军开进国内，成立了武工队。从那时开始，拉让江武装斗争逐步蓬勃发展起来。

为了响应杀敌夺武，开展麻雀战和地雷战，同志们纷纷做火药。由于初期没有经验，在制造炸药过程，在第二军分区的民丹单位，叶绍雪和吴起顺同志被火药烧死，在第一军分区的泗里街单位，许保松（平凡）同志在制造地雷与炮筒过程被炸死。二个地区分别还有多位同志受伤。

（一）历历在忆的烧伤

吴德美（TK）口述

1971年在泗里街的松麻额坡我们三个〔包括阮赛兰（海燕）、刘忠光（坚决）-当时牺牲〕跟敌兵驳火后，我们转移到卢勃路四哩半靠近泗里街河的一个沼泽芭住下。

在这个点，黄厚基（红色）跟我一起做火药。将近中午时分，我们把用短珍装的黑火药约3公斤倒出来分散晒。就是因为听说民丹同志制火药发生意外，我们不敢堆在一起晒，想分开晒会比较安全。於是我边搅均摊平晒，之后一边坐着看报纸。蓦地前面一堆火药燃烧起来，很快地烧到靠近我的右后侧那一堆，我惊站起“啊”一声还来不及拔步跑，感到身体一阵灼烧，接着被藤子绊倒在地。当时我只穿一条短裤，短裤被烧成一个个洞，右手、脚和背较严重烧伤，

眉毛也烧掉，头发也烧成卷短像非洲黑人。

我感觉皮肤僵硬似的，初时神经麻木不觉得痛，全身闷热，口渴想喝水。还好阮赛兰刚从洪楚庭那儿回来，带回吴德芳医生给的治火药烧伤的治疗方法，她先给我喝一大瓶的食油。为了使食油在体内产生更好的效用，我跳着舞着，没几下子我瘫痪无力地倒地，黑绿色的油从肛门流出来。

当时，没有正牌的卫生员，主要的护理是海燕同志，钱赛玉（寒中梅）也在旁协助。点内还有林宝英（长征）、王兰平（晨阳）、陈保娇（志方），和苏兰云（红焰，73年1月5日牺牲于基塞坡）等也为我的安危操心，也七手八脚为我涂蛋白、品露，扇（火旁）扇子。护理员还叫群众买活生汤给我喝，还打盘尼西林针。每天要换药敷药，又痛又费时，在敷药之前，要先用滴露弄湿了患处的纱布，然后慢慢地剥开纱布，才敷药。

在同志们的心热关照、细心护理下，我的危险期总算过了。但听说有巡逻兵出现在附近，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全部转移向对面江。同志们扛着我到河边，找艘船渡过对面，再扛到离河边不远的群众家。然后用电单车载去沐鲁都的一个点。在那里，主要由张瑞泰他们护理照顾，直到康复为止。

转眼间，三十年过去了，火药的烧伤仍历历在忆，在我身上留下的伤痕，也算是革命在我身上烙印的难以忘怀的历史痕迹。



吴德美留影

(二) 哥乐党坡的火药烧伤事件

1971年光景，我们一组住在民丹县的哥乐党坡。当时我跟朝光一起制火药，下午四点多做好火药，早先听说热不可堆集包起来，於是把纸摊开在地上，分散倒下火药，让它凉了才收起。地上有树根，要把堆集一处的火药散开。正当拨搅过程，火药意外着火了。

原本我是正面向着火药，心想不妙就急忙快速地转后。这样，我的背、脚、手被烧到，脸也烧到一些，头发烧成卷发，最严重的是双手，因为我的手原来就沾有火药。只是当时我已离七、八尺远，而且穿长裤长袖。我穿的长裤是“德高朗”布，烧了粘住脱不掉，只能用剪刀剪开。

被火药烧到感到奇热奇渴，很想喝水，但阿青（范碧玉，曼光人，1973年3月1日牺牲于诗巫路口一带）没给水我，却给喝生油，喝生油像喝水一样，有喝了500ML左右。不久，我就不断的撒尿，真正的粪便很少，大部份都是黑绿色的臭液。过后打盘尼西林针以消炎消毒。我又服了一贴百多元的草药（忘记了药名）。点内的徐莲香、学林等战友轮流给我的患处敷蛋精，这样使人感到清新凉爽，蛋精也可以形成一层薄膜，也可以防止细菌的入侵。

事发时，朝光同志（原名黄风光，民丹东来人，1972年5月18日牺牲于曼光坡）在另一端，她前面也烧

伤，伤势比我轻，听说她尿不通，后来服了白花仔汁就畅通了。她康复得比我快。

不久后，刚好向阳卫生员来到。她见我的手浮肿，里面几乎都是水还带有点浓，她把肿胀的掌皮剪开，流出浓水，剩下全是骨头附有一点肌肉。他们每天主要给我敷蛋白，一个月后肌肉开始长出一些，盘尼西林也打了近十针，我开始能够步行了。

“吃一堑，长一智”，没经验，难免要付出代价。不谨慎从事，胡里胡涂，粗枝大叶，也难免不出乱子、摔跤子。只要虚心向学，善于调查研究，认真探讨总结，就可以使自己少走弯路，变得更聪明。

钱功洲口述

（三）巴知坡的火药意外事故

那是1971年6月20日的事件，当时我们一组同志们住在民丹的巴知坡的树胶芭里。在杀敌夺武的热潮推动下，我们单位也大制火药，准备打地雷战。

上午11点多，叶绍雪（共进，是党员，49年出生）、忠阳和夏忠煌三位同志在晒火药。因为火药有掺水，会结块，世强（忠阳）用网来筛，叶同志用手指来压结块弄散。诂料3-4公斤的火药受压磨擦生热，突然“噗”一声，一团火烟冲上树梢。当时，我在看书，听到声响，看到火烟，心想不妙，正站起来看个究竟，只见烧成黑人的他们三个嚷嚷叫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从几株橡胶树远处跑进来。

得知火药烧伤，向阳卫生员赶紧给他们喝食油，忠煌与忠阳喝了一、二杯，绍雪觉得很难下咽，一杯未喝完。当时点内的谢德亮、林才琼（阿海、曼光人）和我等几个男同志立刻去砍树、拿板做三张临时的床位让他们躺下。

1970年吴起顺的火药烧死事件，本来规定不可中午晒火药，不可不穿衣服。但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和预防，这次仍然重犯错误。那天三个只穿条短裤，特别是叶同志，火药燃烧直冲着他的上身，造成内脏严重烧伤、中毒，他的眉毛烧光，牙齿变黑，手掌、下巴烧伤至少80%。第二天他就处于半昏迷状态，讲梦呓。

忠阳当时也是蹲着作业，只是远一些，他前面也全烧到，烧伤达60%以上，他油食得多一些，拉得也快一些，粪便也由黄色变至青黑色，伤势没有那么严重。由于过热不能排泄尿液，肚涨鼓鼓的，后来，去芭里拔白花仔（草药）榨汁给他生服，小便由撒几滴慢慢地才通畅，撒了一大罐的尿（约一公斤庄的牛奶粉罐）。

夏忠煌由于处在外围，伤势较轻，康复得快。

当时曼光坡有个中医，他介绍用大黄粉调蛋白敷患处。每天向阳和助手吴松花都要费时费力细心护理照顾他们。黄志玉（斗私）、黄金妹（阿明）等女同志也从旁协助，有时也打盘尼西林和敷品露等。

另外，还内服护心汤，以防毒入心，还叫群众去中医药店买承气汤，服了会排泄，拉出来的屎黑绿色，非常难嗅。

伤者不能步行，大小便都要同志扶着去，还要给

予清洗。白天向阳和吴松花两位轮流照顾，晚上主要
是我和阿利两位轮流看顾。由于全身闷热，经常要讨
水喝，还不时时要小便大便，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忙得大家不可开交又疲劳。

叶绍雪的伤势越来越严重，没几天全身抽搐，他
喃喃自语说“胶带绑得很紧……”，我们给他打水针，
血管割断都流不出血。看来他以顽强的毅力承受了巨
大的痛楚。他伤势过重，我们全力以赴，也无能为力
。我按住他的胸部，他的心跳越来越微弱，跳到八下
就停止了。牺牲前，他喊了“北加共产党万岁！”



叶绍雪烈士遗照

(四) 马拉端坡的火药意外事故

吴松花口述

大概在1970年7月间，在马拉端坡低芭的一个住点里，当时其他同志都出外，只剩下吴起顺（部队名镰刀）和碧芳俩同志。当天上午十一时左右，他俩把黑色火药倒在用报纸铺的地上晒。准备收起来时，碧芳蹲着捧着牛奶粉罐，吴起顺只穿着一条短裤，捧着报纸收拢好的火药倒进牛奶粉罐里。在倒的过程，突然“扑”（口旁）的一声响，硝烟火光直向旁的日罗冬树上冲。碧芳的手、脸烧伤一些。吴起顺则除了腹部以下，正面上身严重烧伤。

由于有风声漏出去，引来了政府兵到了附近。

在商量过程，同志们还听到吴同志迷迷糊糊的说：“要转移，不可被兵抓走！”第二天，同志们与群众紧张地把吴同志扛了转移到马拉端河的那一边。

经过卫生员从别坡赶来抢救罔效，第三天就牺牲了。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埋在附近的树胶芭山上。



吴起顺烈士遗照

按：只要把制成黑色火药的几种不同成份分开来晒，等凉后才渗和在一起，就不会发生着火爆炸了。

二，边区二场缴获战

老温、奋飞整理

(一) 第三支打的一场缴获战

1968年印尼军队向我北加人民军第三支基地进行第三次军事“围剿”，还进行空军轰炸。为了予以有效的反击，打乱其进攻部署，我们决心打一场缴获战。

我们有掌握到，有一连的印尼兵驻扎在Nibong长屋，经常都会到Lanjak镇运粮和交通联络。我们跟蔡华他们取得密切的联系，指派他进一步掌握情报，事先做好准备。

我们确定的伏击点，是在蔡华的工作处，在Lanjak镇与Nibong长屋之间，距离兵营步行约十分钟的一片树林，是敌人必经的路上。

10月15日我们把部队开下去，蔡华接应了，大家立刻进行积极的研究，当晚半夜把队伍开到伏击点附近。第二天（16日）六时左右就进入伏击点，设下了埋伏。我们耐心地等着，终于不负众望，九点时敌兵来了！三个尖兵出现，有的还哼着歌，有的还把枪扛在肩上，游哉闲哉走着。我们握紧枪杆，瞄着敌兵，准备射击。但三个过了后面没跟上？至到将近5分钟后才看到6个敌兵来到，直到全部进入了埋伏圈，才一声令下，像长了眼睛的子弹全部一齐飞向敌兵，当场打死了5个，当时第一阵火力后，没有被打倒的残剩敌人，进行了顽固的反抗，我们转移火力和夹击，很快歼灭了敌兵。我们缴获格冷（GL）二把，汤逊

(TS)二把，手枪USPT二把以及子弹、背包。战斗在十五分钟内结束。

这场胜利的缴获战使群众得到鼓舞，使敌兵心惊肉跳，灭敌之威风，长自己志气。

这场战斗是由温贤定中队长指挥的，蔡仁昌(露云)是副指挥。共有18位参加了战斗，老兵有南章、光明(杨细永)、华联(蔡安明)、生强(李仕明)、赖添善、富春、敢明(刘瑞源-机枪手)、江华(贝贵和，又称老班长)等16位，新兵只有曾忠和三民(吴松美)二位。

三民回忆这场战斗时，说他感到很兴奋又紧张，他当时跟添善共用一粒大石作为掩蔽物，他拿的是单发的水龙管自制猎枪，才打了二枪就卡住了，他把添善的枪拿来打。

这是新老兵结合的第一次战斗，也是第三支在边区唯一的缴获战。

(二) 第二支队打的一场缴获战

我们掌握到有一股印尼兵驻扎在第二省边界甘督的安巴南河尾，经常有用船上下。我们先派麻雀组到河尾骚扰，打伤个别兵士，估计他们的军医会护送伤兵下来。

於是，为要掌握这个战机，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十多个战斗员在露云(蔡仁昌，伦乐人)和晓

锋战友的率领下，带了Bren中型机关枪，埋伏在下游的河岸边。

果然不出所料，一艘载着十二个印尼兵的船只由上而下。进入了埋伏线，第一阵火力就打倒驾驶员等几个印尼兵，在继续猛烈的扫射下，印兵毫无反抗的余地，共打死十个，打伤一个，潜水逃脱一个，缴获新式自动AK来福枪二把，新式半自动S.K.S.来福枪六把，手枪一把以及一批物质。

我军实行宽待俘虏政策，给那位伤兵包扎敷药，放他回去。同时，还写一封信给他的上头，说明我军的自卫原则，说明印尼政府与军队不是我军斗争、打倒的对象。当年苏加诺政权都大力支持我们，现在只要你们不主动进犯我们，我军也不会主动进攻的。

好人好事

海口市传来的赞歌

— 记反“围剿”斗争的一些先进事迹—

按语：1970年2月24日当局在第一省海口市发动了“巨网行动”。这里刊载了当年的反“围剿”斗争的小故事。

（一）不顾疲劳、不怕危险的三位同志

杨国强、周明和刘勇明三位同志，他们是在三月间第一批突围的那小队的队员。当他们突围时，没有向导，地理情况不熟悉，粮食不足，他们经过不熟悉的沼泽森林突围，他们和其他同志一样，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勇敢地行进，终于突围成功。

接着，他们接到他们的小队长的命令，要他们执行倒回出发地点去联系的任务，他们不顾疲劳，不把困难和危险放在心上，毅然地接受任务，并坚决去完成。在沼泽森林里跋涉前进，在遥远的征途上，其中的两位和其他同志往返达六次之多，很好地完成联系与充当向导的任务。

（二）克服困难，胜利突围

为了使学习班的同志能安全转移，部队派出一部分战斗员和学习班同志在一起。因为学习班人多，故分成几个部分，这里讲的是其中一个部分。

刘佑菊同志和小留同志是其中的二位战斗员。

他们在森林中的营地被敌方士兵发现后，便把这个营地当作一项军事目标，当政府兵以低姿态运动将近他们的营地时，当时恰好轮到学习班同志站岗，站岗者并未发觉这个情况，当时小留同志发觉树枝摇动，根据经验判断是政府兵爬行引起的，大家便作好准备。敌方首先开火了，但我方没有人被击中，我方战斗组和学习班同志即迅速转移，刘佑菊和小留同志掩护同志们转移便留在后头，因为他们不熟悉当地地形，因而他们便与其属的队伍失去了联系。

这两位同志都不是当地人，人地两生在掩护学习班同志转移时，来不及拿他们的背包，驳火后，情况已不允许他们去拿背包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手中的武器，已是一无所有了，没有粮食，没有衣物，更困难的是没有认识的群众，对于这两位同志来说，无疑的困难是严重的。他们多年的边区生活，使他们产生这样的信念，一定能够恢复与队伍的联系，一定能够找到领导。从此，他们便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他们周旋在政府兵占领着的农村，设法去找寻那些陌生的群众，然而许多群众都被捕了，这又是新的困难。在边区艰苦的环境里，使他们学会了怎样求生存，怎样坚持战斗。

有一天，他们接近了政府兵占领了的群众的屋子，他们发现敌方恰巧不在，便一个负责警戒，一个拿着布袋，把敌方的面包、果子酱及罐头食品等装够一袋，有足够重量了他们才离去。这些粮食，他们省省地吃，维持了好久。当他们在群众的

帮助下，与另一单位的同志取得了联系时，还留有礼物与其他同志共享呢！

（三）勇敢机智的战斗员——黄锦隆

在另外一批地方同志及学习班同志那里，我部队也同样派出了战斗员以协助他们，其中之一是黄锦隆同志。

有一天，当他们在椰林中休息的时候，有二个地方同志出外了解情况，被敌方跟踪，他们的营地暴露了，接着，敌方便前来搜索。当时学习班的同志站岗，发现了两个政府兵，而误认为是群众，结果被敌方先开枪，其中一位同志手受伤。敌方疯狂扫射，黄锦隆同志便镇定机智地，利用椰树头作掩护进行反击。第一枪把前头那个干倒，敌方停止前进。在后边的同志乘着敌方停止前进时，安全后撤。敌方虽不敢再前进，但在距离黄锦隆同志不远的前面，用吹口哨为信号，保持他们之间的联系。当黄锦隆同志听到一个士兵吹口哨二下，另一个在另一端应三下口哨时。当时要射击，因椰园的草很密，蹲着看不见目标，便急中生智，也用他们的信号吹二下口哨，这个兵误认为是他的同伴，便露出头来张望，黄锦隆同志对准他的脸孔放了一枪，敌方应声倒地。再吹口哨时，可惜再也没有人敢回应信号了。敌方知难不敢再前进，双方坚持了一个多钟头之后，敌方可能等待其援兵，我方的黄锦隆同志带领和他在一起的其他队员，也安全进入森林。

（四）不怕困难，坚持斗争的三位同志

有一个小队在从海口区突围后，在二十六哩，因一时无法与有关单位取得联系，后来暴露被敌方突然袭击结果，黄春梅与邱志锋两位女同志与其他同志失散，其中邱志锋同志的腿部受了数处枪伤，无法行走。他们在人地两不熟，在无粮又受伤的情况下，十多天无米粮进口，只找些可食的东西充饥，几经周折，终于与队伍取得了联系。

在同一次驳火中，一个年纪很轻的廖永革同志才十七岁，当他与其他同志失去联系时，只剩下他一个人，也是人地两不熟，他一边侦察，一边了解。对陌生的年青人，他怀有戒心，他设法接近年老的农民，终于他得到了帮助。虽然他没有透露他的身份，但生活经验丰富的老人给了他衣服和钱，他终于一站过一站，重新归队了。

（五）二十六个人一顿两牛奶罐的米

有一个小队的同志，面对敌方的搜索，在突围之前，在健康情况不好的情况下，粮食短缺，一天吃两顿，二十六个人一顿只吃两牛奶罐的米煮成的米汤，有时只吃几块生椰，即使大炮在轰击，既使直升机低飞“招降”，既使投下了大量的“安全通行证”，但对于他们来说，敌方的努力却是徒劳的。

（六）可敬的一位农民

在海口区有一位贫苦的农民，当他知道自己的武装队伍时，他是多么激动呀！他想尽一切办法支援我们的队伍，钱他是无法多出的，但他尽他的能力多为同志做事，在二十四小时戒严的情况下，

他设法去农村的店区买粮食，了解情况，甚至他跑到民族甘榜去了解情况，以方便我们处理问题。

他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一个农会会员。有一次，他家仅剩下一点米，有几个地方学习班的同志经过他的家，还没有吃，他把他不多的米煮饭给他们吃，并煮给他们带在路上吃，剩下的米已不够煮饭了。他把仅有的一点米煮粥和家人用晚餐，明天再想办法。

地方工作同志委托他代买粮食支援部队，不管怎样危险，他毫不推辞，在他准备好粮食给部队的时候，刚好敌方到他家周围搜索，他终于被捕了。

以上所介绍的虽是几个小故事，但却可以从这些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的表现中，窥视反“围剿”斗争的缩影。

- 一九七二年 -

向罗丁的积极艰苦的工作作风学习

- 红心 -

低潮以来，一部分同志因为革命的遭受挫折、武装斗争遇到的较大的困难而感到消极，因而工作干劲削弱。罗丁同志也意识到前进中的困难，革命的挫折使他感到痛心，但他不灰心，不消极，艰苦奋斗，积极进取。

罗丁同志积极、艰苦的工作作风较突出的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积极做好所属范围内的群众工作。由于长期来在群众中广泛深入的活动，使他熟悉群众，了解群众的苦难，和群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培养了对群众较深厚的感情。他曾说：“有的群众就如我的亲人……。”由于有这种感情，再加在工作中他善于学习社会，使他有了多方面的突出的表现。

（1）对群众的态度热情诚恳，接近而不受约束的和群众相处，除了向群众宣传许多道理外，他能虚心的提出问题来和群众讨论协商，比较能够避免生硬的单方面的向群众作宣传。再来，宣传艺术上他由于熟悉群众生活，也较能举出群众生活中的例子来教育群众。由于他较深入群众，较能摸到群众的心，因此较能有效宣传教育和解决说服群众中提出的难题。在群众中不论男女老少，他都能相处融洽。

（2）善于调动、使用和要求群众。我们从事的事业要群众办的确实太多了，许多事如果没有群

众帮，难于办到，甚至寸步难移。作为一个群众工作者的罗丁同志较能理解这点，在工作中，他重视对各种类型群众的各方面进行调查了解，而且能够进一步灵活调动各种各样的群众做各种不同的工作，使各种各样的群众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能为部队办事。

(3) 重视提高群众中的骨干分子，只要有可能会，他会特别抽出时间来专门和他们学习交谈，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坚定他们的立场，部分群众在种种压力下表现还是好的。

(二) 顾全大局，眼光长运。罗丁同志除了群众工作外，还经常附带其他工作任务。不论搞群众工作也好，执行其他任务也好，在策划和工作中他能顾全大局，而且比较照顾长远利益。比如在执行部队的XXXX任务，而且还要进行群众工作时，到底这两者工作的矛盾应该怎么处理呢？由于他的顾全大局，在和同志们的妥善协商下，适当安排，终于把这两者任务顺利的完成。他的全局和长远观念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不论领导上有没有交代，只要他懂得部队当时在某些问题上有困难，有需要，他都主动去找我们。有一次，当部队处在较困难的时后，也为了支援XX单位的反“围剿”斗争，在和同志们讨论之后，他竟不管长途行军的劳累，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到X地去找门路。又比如部队需要XX，他除了花费许多精力，到群众中做许多调查外，还冒着一定风险到X地侦察，他也重视在工作范围内外，在能力可及内，扩大我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2) 主动要求承担重担。例如有的工作，事先原本不一定是由他来承担的，但在他较为主动积极的建议和摆出其有利条件的情况下而承担的，他的优点在于有时领导还没提出要求前能主动积极的提出。

(3) 执行各项工作中，他是较有办法的，少出事故。他很重视善于掌握各个地区的民情、地形，几乎每到一地，接触到群众，他都能详细的、巧妙的了解掌握各个地区的民情、地形，而且每到一处落脚，他能不怕麻烦的了解和跑地形。

(4) 工作较有策略性。每一次出去工作，如果时间不是太紧迫，他必定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来思考策略问题。因此工作之前，他对所要进行的工作已有办法，工作起来，就能不紊乱而有秩序，较顺利的实行。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他身上都随时带着一本工作策略小簿子，封面上还写了“要认真搞好工作”等字眼来鞭策自己。

(5) 他积极的向上面提各种建议。由于他熟悉群众，熟悉情况，因此，在工作上，他是比较能向上面积极的提出各种建议。

(6) 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可佳，罗丁同志在工作中的艰苦奋斗精神长期来都使同志们佩服，低潮以来，他还是照样艰苦的奔跑。

有一次，当我们工作整半个月又要长途负重回去后，休息两三天功夫他又和一些同志去搞工作两天，随之又运粮，而且透夜运两次，回来后也只要一两天，遇有情况，他又随着大队长长途行军，找

点搞粮，安置好又奔赴X点继续X点的其他工作了。

这种不辞劳苦、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对他来说已不是鲜少了的，在他的工作地区活动，经常要连夜的跑，有时晚上就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坐着让风吹雨打熬过夜晚，但这些艰苦的生活对他来说是顶得了，而且顶得无怨。

(7) 做为一个干部的他承担了大大小小的工作任务，对各种任务他都较能从工作意义上去领会。如XX项任务，本来在一些人眼中看来是不大中意的事，也是小事，但罗丁却能认真负责的担负起来。还有和队伍一起行军，许多时后是由他带路开路，而且也要负重。总之，只要是必要的任务，许多工作他都乐意承担。

(8) 除了在外部工作上的能如此积极艰苦的坚持工作外，在点内他对各种事务工作也不落人后。不因在外奔波久了，在点内就休息。工作忙时，他即使很疲倦，还是坚持做，天暗了还在做。

罗丁同志在工作中的优点是显凸的，他的好表现可说是数年如一日。难就难在这一点啊！

- 一九八三年 -

注：当年的罗丁同志就是余清禄朋友。

部队的“神行太保”

- 江宏-

(一)

《林海雪原》里有个出色的交通员——长腿得达。《水浒传》有个神行太保——戴宗。我们前部队里面也有个出色的交通员兼神行太保——5号（毅坚）。

长期的游击斗争和在森林里活动，锻炼与提高了同志们的跑山能力与生活能力。毅坚是表现突出的一个。

他的特点，就是走得快。

1979年3月的一次去国内联络的途中，联络交通组，打到了山人和山猪。他们既想到营地的同志能吃到肉，本身又要轻装前进，於是决定派陈同志（毅坚）即刻赶回营地通知他们出来扛。陈同志二话没说，就撩起两腿飞快地翻山越岭，跨涧过河，全程平时要走一天的路，他一口气只走了一个多钟头！回到营地，同志们看到他双脚都是山蛭吸吮后流出的鲜血，还有几条食得半饱仍盘附在脚上的山蛭。

1980年1月江盛财（发扬）因枪支走火打到膝盖，陈同志又再紧急地被派回去叫张淑瑛（秀琴医生）来抢救。他为了抢救同志的殷切心情，不顾自己的疲倦，发扬不休息的连续战斗的作风，以惊人的速度创造了2 $\frac{1}{2}$ 小时的记录，比平时空身也要跑8小时，快了5 $\frac{1}{2}$ 小时！一到营地，他又立即马不停蹄地带张医生赴往负伤同志处。过后他又不停歇地执行新的任务——负重去联络了。

毅坚不仅走得快，而且位置找得准。

1977年9·19会议之后，重建边区基地的突击队成立了。陈同志跟同志们第一批进边区。由于半途征远（张锦兴）病倒，立武与毅坚留下照顾他。刘小雄支队长带着其他同志先进去，临走之前有交代，需要的话可以进去里面粮点联络。刘队长只在地图上点了点，介绍一些地形特征，其实陈同志未到过此地。詎料，他们三个在半途休息时，遇到Mujok民防队的搜索、袭击，驳火时，陈同志悄悄地从侧面爬上高点从背后打击来犯之敌，陈同志使敌人二面受敌（征远在原地射击）民防队躲在树后不敢动弹。他打了一发又一发，不知不觉打了十发（他只有16发子弹）。他撤退时，没跟另二位联络上。他考虑后决心前进，追赶已走了三天的刘支队长他们。他没吃没睡的在后面拼命直追。跑了一天，天暗了他把捡来的几粒螺与采来的小小“尖必叻”烤了充饥。没有雨布，砍了斗笠叶铺盖了睡。第二天上午，他准确地寻找到粮点，恰巧在附近找到志明，他病躺在吊床上。且看，别人走四天，他仅用一天就赶上，而且准确无误地找到指定的地点！这真是一等的跑山能手！

还有一次，藏XX的一个同志离队了，领导上说必须把XX挖走，任务又交给了他。他们只在地图上跟他讲XX藏的具体地点、和周围的特征。他带了Api一起去。可是第一次没找到，第二次再去。当时周围还有敌情，他一边严阵以待，一边仔细侦察，反复琢磨，终于找到地点，而且挖到XX。

还值得一提，旱季Katibas河水浅，有的地方可以涉水而过。但全副武装，踩着肚脐以上的河水，脚底踏得不稳，就会被湍急的流水冲跑。普通人不易



过，只有边区一些老战士才能有这个本事。陈同志后来居上，却可以跟老战士比个高低。

(二)

经过几十天的长途行军，联络同志已经下巴尖肋骨露，十分疲倦了，特别是毅坚同志还是抱病回来。在这时刻他们是多么需要好好休息一番啊。可是联络时间不能拖，赶上联络时间意义大，经过几天的休息，体力还没恢复的同志又要出发。

在这紧迫的时间里，要几个同志一起在联络的时间赶到目的地是不可能的。为了按时联络，毅坚同志提议和林政本（敢斗同志）一起先赶。于是一场“千里马”的急行军开始了。

这样的行军，每天从七点多跑到傍晚四、五点，每次间歇休息又不超过五分钟，当人们收工回家休息吃饭时，他们还在忙着煮饭。如此紧张的行军有谁不感疲倦、不觉苦呢？可是为了赶上时间完成任务，他们都乐于承担这种牺牲。起初他们穿着鞋赶，但鞋太小，经不起不断的磨擦脚脱皮了，后来只好光着脚跑。经过他们的奋斗，不仅没误了时间，而且还提前到达，比常规快了三分之二，创造了新记录！

我问陈同志为何你会有这个优点？他说，他有练气功，比较不会那么疲倦。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要有不顾己的精神与坚毅不拔的意志力，而且要有善于虚心学习与敢于实践的精神。

人老志不老的红军

- 黄牛 -

红军是上了年纪的一位同志，1973年“和平谈判”转折之后，留下来年纪最大的一位，有些部队成员都亲切地唤他为“公公”。

红军原名是杨省智，是诗巫船溪米禄人，1970年他参军时是39岁，坚持到1990年的和谈已是59岁了。

红军人虽老但志不老，可谓老当益壮，20年来一贯保持革命的青春活力。他有些优点是突出的，是一位值得尊敬与令人钦佩的老同志。

以集体利益为重，小家庭服从大家庭

红军参军时已有四个儿子，他并不是不爱妻儿，不爱他的小家庭，但他更爱集体的大家庭。他深明大义，也懂得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怎样正确处理。就是因为他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可贵精神，他才能毅然的跨出自家的门槛，坚决地走到集体的大家庭中来。

离家20年没有条件跟爱人见面也无怨言，他也没有主动要求见家人。他没有要求并不等于不想念家人，没有见爱人并不等于他没有生理上的需要。恰恰相反，他有这些方面的负担与斗争，但他能展开思想上的积极斗争。头脑里思想上的交锋结果、往往是理智、豁达、积极、进取的占上风，所以他始终能保持积极乐观的战斗。

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红军文化水平不高，却能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持之以恒，刻苦的学习。平时尽管睡魔不断干扰他，他却能坚决展开斗争，坚持学习，晚上有时行军已经累了，其他同志通常收拾好东西或学习一阵子后就休息了。但他往往坚持到较迟，一般上都是最迟才休息的。

不管是出外工作或是在住点内，不论是在华区还是在民族区、边区，无论是干什么工作，他总是吃苦在前，乐在其中。虽然他年纪大，但背重不一定输给年青同志，他经常背上七、八十斤重，不管工作多累，他从来不说一句苦。

吃、穿和用方面他从不计较，能吃能穿能用的就可以，不伸手要什么，更不会要求什么照顾。

他警惕性高，也体现其艰苦的方面。为了安全，他不怕苦宁可走弯路、走远路，坚持站岗。晚上岗往往是他先起来，即使是下雨也是冒着雨吊着吊带，持着枪站好。

在边区小组活动时，要解决吃菜问题，就得学会钓鱼。红军善于学习，很快掌握了钓鱼的技术。有时一个晚上可钓上7、8条大鱼，约有几十斤重，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他却置之度外，夜间没有电筒，就用“打马土”照明，有时只身独钓到半夜才收钓。他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大家都有口皆碑的。

关心同志与领导

红军为人友善，以诚待人，跟大家关系搞得很好。不论在那里他都积极的工作，“大事”做不来，“小事”就多做一些，让其他同志多学习、多休

息。在背粮负重方面，他会抢着重重的东西背，主动关心体弱的同志。有一次同志们赶任务回来，的确很疲倦了，他却积极主动地把两个青年同志背的东西一个人背了回来。

他也关心领导同志，除了安全之外，也关心身体健康。有一次领导同志被毒虫咬伤，而身边没有卫生员，红军主动关心，给予配药。深夜他难以入眠，了解没有问题才放心去睡。虽然这行动在有的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我看来却体现了他的同志爱。

红军不为名，不为利，艰苦奋斗，勤勤恳恳、老老实实的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的忠诚态度，积极行为，高尚品德，是令人赞赏的。



老红军(杨省智)留影於东北突击队

转载

我看《荒山月冷》

- 冷眼 -

1. 评小说《荒山月冷》

有必要简述一下《荒山月冷》的时代背景。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大大鼓舞了砂劳越青年，他们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展开反帝反殖的斗争。这是政治的第一次飞跃，是历史的第一大转折。但是，当时参与的青年是以华侨身份协助这场斗争，当遇到挫折时，就回到中国去。

1951年“10·29罢课斗争”失败后，他们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回国”的浪潮中跳出来，决定居留当地以主人翁的身份争取砂劳越的独立。这是政治上的再次飞跃，历史的第2大转折。於是通过地下和公开的工作，学运、工运、农运、民运蓬勃发展，政党、工会、进步团体相继成立，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殖斗争。

1962年底，英殖民政府进行全面大逮捕，建立集中营，关闭了宪制斗争的道路。这股力量转入地下，并展开武装斗争。这是政治上的又一次飞跃，历史的第3大转折。下农村、上边区、建军建党建基地、展开游击战争都是这一时期的事。

1973年“斯里阿曼和谈”，大部分的武装力量放下武器，走出森林，使这场斗争走向低潮。斗争折翼了，这是历史的第4大转折。之后，牢内的反帝反殖力量也相继瓦解，东部的武装力量又坚持了16

年后，也终于走出森林，持续40年的反帝反殖斗争於是结束。

血泪谱成的斗争之歌

40年来，每个历史转折都一脉相承、环环相扣。这斗争之歌是无数人用青春和生命、用泪和血谱成的。

斗争者舍身取义，为历史的进程立下不朽的功勋，树立了新的思想意识形态和新的精神面貌。

短篇小说《荒山月冷》据作者黑岩说，是用文学的形式反映砂劳越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时代面貌。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有阿月、楚楚、家盛、黄纪华、银湖、阿旺和林丽。银湖是书中的主角，是作者为反映时代面貌的典型人物，其他次要人物都是为衬托主角而存在的。

黑岩是怎样刻画主人翁的性格呢？“银湖性格豪爽、不拘小节……有幻想、有抱负，对人生怀著热烈的期望。”自从读了黄纪华给他的《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新儿女英雄传》、《辩证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后，生活忙了，“性格逐渐改变。他的老婆阿月讲了他一句，他就是大动肝火，发了一阵从没有过的脾气……”一个朴质的农民，因读了这些书籍性情变成乖戾，作者的言外之意十分明显。

银湖像是个地下工作者，他的工作是什么，作者没交代，也无法交代。从后文阿旺怕因唱歌跳舞、学文化而被捕，恐怕就是作者所知的斗争内容了。银湖是怎样处理书籍文件的呢？就是冒失地放在家里的桌子上！有一天晚上，有带枪人马搜查黄

纪华在学校的宿舍，取走大批书籍，镇上的人仿佛大祸临头。第2天早上，银湖照旧去椰园，直到下午回来才把桌上的书和文件放进灶里一把火烧了。这那里是地下工作者应有的警惕性？你说他白痴好了。这那里是求知若渴，想尽方法保存书籍？倒是像有没有都无所谓。

妻子阿月怀孕了，银湖却在紧要当儿不告而别离家出走。作者随即细腻地回忆了小两口初筑爱巢时的恩爱生活和小夫妻间的旖旎风光；另一方面，又点出了银湖离家时把阿月托给家盛照顾。这两处伏笔和银湖出走后的“家破”，及阿月母女无法独立生活而依靠家盛，“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对照，加强了银湖“为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而出走的罪孽。

出走3年毫无音讯的银湖，一天晚上突然闪进了家。第一句话就问：“我已饿了3天，厨房里有冷饭吗？”在他贪婪地吃着冷饭的时候，阿月冷眼旁观、心中充满怨怼：“往日的英俊面孔轮廓已消失，换之满脸胡子，头发奇长，那结实格大〔注〕的躯体那里去……，好好一个椰林、一个美满家庭不顾，偏偏去选择自己不该走的道路，去实现什么理想……”吃饱饭，待孩子睡了，银湖向妻子做了性的攻击，“像是悲愤发怒毫无温柔对她任性蹂躏著”，以解决久旱的性饥渴。匆匆回来，为的只是解决生理的需要，第2天凌晨又匆匆走了。在作者的眼中，这个有理想的人思想是这样的贫乏落后，既又不负责任在先，竟又这样无耻在后。

银湖到底去了那里？作者前此都隐住不说。最后通过司机阿旺的口，原来是“去山里鬼混！”鬼混？这支抛头颅洒热血的部队，这场迫使英帝提早交出政权的斗争，大言不惭要反映时代面貌的黑

岩竟以“鬼混”二字概括，真是歪曲到了极点，却又浅薄无知到了极点。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瑞腾在《黑岩小说集〈荒山月冷〉的一些考察》一文对此评到：“砂共部队并非乌合之众，过去学者曾有过不少论述，可以参考。”作为砂劳越一分子的黑岩竟然罔顾史实，自以为是到这种地步！

黑岩不知这场斗争是有组织，或许知道但不知有组织之爱。因此写银湖转入地下后，他的妻女便陷入孤苦伶仃、自生自灭的困境。黑岩也不知有同志之爱和他们无私的胸怀，却以自己的标准处理林丽小妹：“她体弱受不了，实在走不动，他们就把她丢在半途给她几包干粮，叫她自己打算……”面目如此狰狞，心肠如此毒辣，行动如此自私，这是黑岩派给这场斗争队伍的。实际上，这是在无意中暴露了黑岩自己灵魂深处的秘密。

斯里阿曼“和谈”成功，黑岩给予热情歌颂的同时，指出有人在第2省边界看到一伊班椒农，面孔、声调跟银湖一模一样。当人们问起他时，他疾口否认自己是银湖。后来这名“伊班人”不知是搬移还是病逝，终于在镇上消失了。主角银湖没脸见人直至消失，是黑岩否定并宣判这个斗争的死刑。

这就是黑岩的短篇小说《荒山月冷》，他的“伤痕文学”！没有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没有反映反帝反殖斗争这一性质，反之是嘲笑、丑化、歪曲及矮化这个斗争。

文学反映客观现实

文学反映客观现实，不管你是不是文学家，通过文字在反映客现实时要有社会良知。搞文学的

人应该分得出典型和非典型、现象和本质、枝节和根本；你可以虚构但不可以杜撰。现在有许多曾直接先后参与斗争的人还健在，作者访问过他们没有？筛选过所搜集的材料没有？剪裁过筛选的材料没有？作者是以个人的好恶还是以人民的利益，作为区别真假、善恶、美丑的标准？毫无疑问，作者是在完全脱离实际情况卜杜撰这篇小说。在《荒山月冷》中，作者描写了多种性爱：小夫妻的性嬉戏，旷夫怨妇的苟合，只为解决性饥渴的造爱。在写这些方面作者是老手，为什么写社会斗争就相距十万八千里呢？想来，这也是十分无奈之事，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之上的缘故。

愿以鲁迅的话“墨写的谎言决不能掩盖血写的事实”赠予作者，并希望要做文学家的，要有起码的社会良知。

〔注〕原文如此。

2. 《荒山月冷》的意识形态

黑岩在《荒山月冷》的序文中开宗明义地说，他在20世纪60年代就想以文学改变社会“形态意识”，闯入文学殿堂。

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是人对于世界和社会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文学艺术、宗教及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要改变意识形态，先要改变经济制度。在20世纪60年代的砂劳越，英殖民统治是已存在的经济制度，而反帝、反殖斗争则是要改变殖民经济制度，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制度。这2种经济制度，一是已存

在的，一是预期的；建立于其上的是2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一是维护已有的经济制度，一是促成预期的经济制度，正在逐渐形成中。

文学作品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具体表现某种意识形态，它不是改变而是承载意识形态。不论的什么人，他的文学作品一定宣扬自己的，反对对立的意识形态。黑岩在其取名《荒山月冷》的短篇小说中，通过塑造银湖这个人物形象，歪曲、丑化砂劳越的反帝反殖斗争，目的自然是要“改变”这个斗争的进步性和正义性。我看黑岩对什么是意识形态也不甚了解，他似乎以为掌握了文学就是掌握了意识形态的全部。他在小说中所表达的，只是对腐朽的、非正义的意识形态推波助澜，走到改变的反面去。

黑岩在《荒山月冷》中表现了怎样的意识形态，或通俗地说表达了什么看法和见解。

砂劳越的反帝反殖、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是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1962年底英帝关闭宪制斗争之路，使斗争转入地下转入武装。黑岩称从1963至1973年所衍生的社会问题为“十年动乱”，在他《荒山月冷》的字里行间，把“动乱”归咎为实现理想的人们走了不该走的路。

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把反帝反殖人士看成是自私、没人性之辈，极尽讽刺之能事；

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把参与斗争的活动说成是：“在山里鬼混”；

在这样的前提下，他称游击战士为流窜的、见不得人的、人人喊打的“山老鼠”；

在这样的前提下，他称为斗争而牺牲的人士为那个时代的“陪葬品”。

任何人都权利和自由宣扬他的看法和见解。有一种人就是有这样的“臭脾气”，立场一站就一如既往，毫不摇摆。这样的人尚可称为一个人物。独有看风驶舵的人，顺利时就说我是你的同志，挫折了就来骂你。有一副对子道：“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正是这种人的写照。

当然，黑岩要宣扬那一种意识形态是他的自由，他的歪曲、污蔑丝毫也改变不了事实。正如“蚂蚁缘槐”仍不失为蚂蚁，“蚍蜉撼树”树还是巍然兀立。

但是，有一点必须要加以揭露，以免骗了一些不知真相的人。我说他的文学家是自己打扮的，他的什么“意识形态”啦、“文学殿堂”啦、“反映时代面貌”啦，（见原书“序”）不过是摆高姿态吓唬人而已。

3. 从《荒山月冷》看黑岩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年轻人以满腔热忱，一方面努力充实自己，一方面忘我地进行群众工作，目的是要使砂劳越摆脱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自主。

那时黑岩也只是个20岁左右的青年，“妄想以文学改变社会形态意识，闯入文学殿堂。”想法虽不实际，但不失天真。从他后来的表现看，“以文学改变社会形态意识”是手段，“闯入文学殿

堂”是目的。这且不去管他，他这时的主张颇与“文学救国”的味道相同。

到了反殖力量威胁到英殖民统治的时候，殖民政府封闭宪制斗争的道路，进行了大逮捕，那是在1962年底。许多人被捕送进集中营，更多人转入地下，搞武装斗争。从1963年起至1973年斯里阿曼“和谈”止，黑岩以他的“文学细胞”判断为“十年动乱”——不是英帝镇压的结果，而是那些搞群众工作的人搞出来的。

黑岩多次通过他的著作反映他的大好前途是被这场反殖反帝斗争断送了：如—

“……取得优良成绩又是出国准证问题，使他失去大好前途。……”

“……若不是当年的局势，至少今天在这条客轮的人，他仍然以一个专业人材与大家平起平坐。……”（见原书P.168, 169）

本来，一个人要走怎样的路是他自己的事，有完全的自由，毋须别人置喙。他自己也曾是其中一份子，为什么要抹黑这场斗争，如“……来一批民意调查团，有人趁机煽火树起反殖反帝国主义旗帜……”（见原书P.168）反殖反帝斗争是有人趁机煽火而树起来的吗？他把矛头对准斗争者是找错了对象。他抹黑反帝反殖人士有时到了岂有此理的地步，但我看他还不是站在斗争的对立面。在历史发展的舞台上，黑岩不是反角，他的经济背景和政治倾向构不成反角。他也不是正角，他没有符合历史发展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准则。要怎样定位？只能说他是一个怪怨这场斗争的时代落伍者。

（这篇文章曾刊登于2000年8月12日〈星洲日报〉）

离乡65载 - 忆当年

出生的年代

中国辛亥革命后第3年(1914年)，我来到这个世界。我出生在中国福建省闽清县池园镇一个偏僻落后的农村“中锋头”，这是个农民小康家庭。父亲许国涛为自耕农，粗识文字。母亲赖氏，一个旧社会善良的女性文盲。我上有两位兄长，一位姐姐，我居幼。

我可以说是生不逢时，竟在动乱不安的年代出生。当时中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各地军阀所占据的“小天下”各自为政，互相敌视，导致天下大乱。土匪多如牛毛，只要有枪杆子盘据一方，就是一个“土皇帝”，可以手握大权自成气候，可以“呼风唤雨”。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村经济萧条自不待言。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28年北伐战争时才算结束。

自耕农和佃农

自耕农和佃农有什么分别？我前面有提到我父亲是一个自耕农，才能养活一家八口。如果一个佃农就惨了！旧社会里，佃农是耕地主的田，辛辛苦苦一年到头工作，收成农作物还要与地主三七

分，地主占70%，佃农仅占30%，你说公平吗？

不管路途多远还要把晒干的谷子送到地主府上。在佃农缺粮时间向地主借粮，借来一百斤，明年要还双倍，两百斤。有什么办法？旧社会制度就是这样，佃农就是地主变相的奴仆！无怪乎他们只有盼望红军早日来，才有翻身的一天！（作者注：这一段文章原本不属于本文所应讲的范围，但为了使人们多认识一点旧社会丑恶层面的冰山一角之坏事，不妨略述一下。）

启蒙教育

1922年春，有一位逊清老秀才在农村设馆授徒，当时我9岁。父亲安排我进馆就读，念方言四书五经，长达5年。一年365天，除了传统节日外，没有什么星期天，什么公共假期。这位老师非常严格，每日功课非念到能够背诵不可。请别以为这样私塾非正规教育微不足道，可是在那年代有机会进入这样学馆的，还可算是“天之骄子”哩，乡村里头还有多少年纪相若的孩童只有望馆门而兴叹呢！

由于这样，农村人口有一大半是文盲（还只限于男性而言），女性的遭遇更糟，连生存的机会都没有保障，更不用说读书了。当一个女孩子出生时，如果父母没有能力养活她，唯有以一桶水结束了她的小生命！这种残酷的事件，在当时的社会是极为普遍的。这不是我故意危言耸听，这就是事实。

这个悲剧能够向谁控诉啊！

农村二三事

农村人民过著原始式的、封闭式、自力更生的生活。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开门七件事除了食盐要向外购买外，其他日用品都是自给自足。食油，有一种茶树，常年结果以供榨油；燃油，有一种桐树同样能榨油以供晚上点灯。我童年的晚上读书就是用桐油点“灯码”照明。农村人民半年没有上市集购物是平常事。

深山里上了年纪的人罔顾“留发不留头”的政令，仍然拖著长辮子整年没有出门，常夜观天象，留意是否有帝星出现，希望“真命天子”降世天下，就能太平了。思想保守可怜又可笑！

乱世社会的必然产物之一——土匪，也应时而生。在我农村里有一股以许保举为首的土匪，大约有百人左右，盘据农村。不过他们并没有打家劫舍，所谓盗亦有道，绝不骚扰当地居民，也不允许外来势力侵犯，好像也跟官军有默契，河水不犯井水，互不侵犯。由于这样他们恪守“不吃窝边草”的原则，偏僻的农村反而能够过著宁静的日子。

开始踏入社会

1928年，我14岁时辍学。由于体质孱弱，不宜务农，父亲安排我到离家5里的一个市镇“池园镇”里一间杂货店当学徒换口饭吃。

山地里土头土脑的小伙子初上市镇，当然生活上不能适应，感到彷徨无助，也没有人跟我交谈，唯有忍耐坚持着。每天只有勤快工作、俐落听话，以获得经理、同事认可。一年后老板自动每月给我4块银元工资，这使我喜出望外。当时市镇内最大的商店经理级人员每月工资也只有12块银元，

像我这样不入级的小人物每月能有4块银元的工资，怎不令我喜出望外呢？

友谊开始

我到市镇一年多，有两个附近商店的工作人员常常接近我。他们态度友善而亲切，年龄比我大五、六岁，文化水平高，社会经验丰富。

他们以小弟弟一般看待我，在工余时候教我读报纸、杂志，也常讲一些故事。他们一姓黄，一姓陈，都是来自中产家庭。当时，我刚15岁，第一次接触到报纸。该市镇有整百间大、小店铺，只有一间是代理邮政服务的。它代理有三份报，来自上海市的是《申报》和《东方杂志》，来自福州市的是《求是报》。报纸出版后到这个市镇大约需要三至四天的时间。由于我念的是旧制的之乎者也的文言文，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读物感到十分惊奇！

有一次《申报》刊载了一则新闻说：有一个知识份子名叫史量才，发表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内容记不清楚了），触怒了有关当局，被抓去坐牢。当时陈、黄两位感到非常愤怒而大事抨击有关当局。我感到惊讶！因为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敢于公开抨击政府。我从此对于他们两人更加敬仰、好感！

另一次，《申报》刊载上海法租界巡捕殴打一个中国老人引起人民公愤，纷纷表示抗议。陈兄问我：“小许，你知道什么叫做‘租界’吗？”我只是摇头莫能对。陈兄说：“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解释的，要从国家整个政体说起。我们国家目前没有完整的主权，可说已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当然就没有完整的领土。帝国主义列强就利用

这个弱点强迫我们政府把城市或港口划出一大块土地，作为他们的‘小王国’，美其名租界，意为租借地，其实是瓜分我们的土地！这是全世界仅有的措施！”

“实际上帝国主义者无视中国政府的存在，而变相地瓜分中国土地，以作为进行各种侵略和罪恶活动的基地！”

我听后如梦初醒，感到义愤填膺，但做为一个普通劳工，除了痛恨国民党政权外只能徒呼无奈罢了。

租界内的设施简介

“小王国”租界主要特点就是拥有“治外法权”。设施方面有政治管理、武装警察、巡捕、监狱、法庭、对外通讯等。租界里面任何活动，中国方面不能过问：中国罪犯逃到那里能得到庇护，中方不能干涉。在租界可公开售卖毒品、包娼、包赌、包庇恐怖份子。

所谓“治外法权”，总讲一句，就是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管束，不纳税、不呈报、出入行动一切自由等。这是全世界仅有半殖民地中国的唯一产物！

国民党政权失去民心

30年代，日、台浪人在福州市时常滋事。当时有一个宪兵吉简章把滋事者赶走，日本驻福州领事向省政府提出抗议。结果蒋介石责吉简章开罪友邦人士，下令把他调走。这事件使全市哗然。

福州市政府命令所有商店的账簿、单据都要贴上印花(五毛钱)，违者重罚，警察时时突击搜查，商家不胜其烦。有些没有骨气的老板宁愿向日本领事馆登记为日商，就得到庇护。只要在店门前挂上“日商”一块牌子，那么政府官员连正眼都不敢视它一下。当时老百姓指国民党政府患上无可救药的“恐日病”。

陈兄说：“这些消息只不过是官老爷剪下之漏网新闻而已，也仅是冰山一角。如果从全国来说，蒋政权所干下丧权辱国事件是罄竹难书啊！”

国共分裂

1927年国共分裂后，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消灭共产党，切断其兵力来源，在全国实施“保甲制度”。清共、防共、围剿毫不放松，严格监视青年活动，层层管制。

以10户编为一甲，10甲为一保，设保长、甲长，互相监视。甲长要向保长负责，保长要向镇长负责，镇长要向区公所负责。在1934年，我刚满20岁，无端端被委为农村里的甲长。这个小小的官儿有人求之不得，在我来说，这张委任状却是一道催命符！震惊之余，就去找陈、黄两兄商量对策。想不到，他们消息还十分灵通，一见面说：“恭喜你，小许，年纪轻轻就得到有关方面的垂青，成为一个小官儿！要是迎合得法，将来平步青云，前途未可限量！多少人求之不得呵！”我啼笑皆非地说：“请你们不要这样揶揄我好不好，我是这样的人吗？我来就是寻求你们的指导，下一步棋该怎样跑？”陈说：“这个要看你自己。”我要辞职，不被接受。黄说：“不能跑错一步全盘皆输啊！对方可能冲著我

们而来，跟我们斗智，如果你辞职，我们就是失败者。现在就是不表态默默接受下来，静观其变，使他们摸不透我们的底牌，这叫做缓兵之计。”

这样，经过了一年时间平安无事。

“九一八”事件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并吞中国，发动侵略、突击东北沈阳市。蒋介石密令守军不许抵抗。东北军挥泪撤退，使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相继沦陷。蒋政权的不抵抗主义令全国哗然！为什么这样呢？大家追问。陈、黄两位同声说：“理由还不简单？保存实力对付共产党。”蒋不是堂皇的道出：“宁给外人，不给家奴。”这是他的哲学，这也是导致1936年西安事变的主因。

西安事变

在此先介绍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真相。

蒋介石亲自抵达西安，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延安工农红军。东北军士兵闻讯哗声高喊：“打回老家去，不打自己同胞！”于是张、杨扣留了蒋介石。

这消息震动了延安。中共中央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为现阶段国难当头，在国家危险时刻，决不能伤害蒋介石。第二天，派周恩来直飞西安调解。大势所趋，蒋介石不得已，只好接受联共抗日，一场风波才告个结束。

蒋政权失人心

此时，国民党政权已失去民心，经济全面崩溃，本来可买一头牛的钱，不到十天只能买一盒火柴。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所有的物资均为蒋之手下高官所收集，资金存在外国银行。蒋经国亲赴上海，扬言要打“老虎”。在上海收集资金的最大“老虎”是谁呢？是孔祥熙大女儿孔令侃，蒋经国不敢动她一根毫毛，只抓几只小苍蝇草率收场，欺骗老百姓而已。

抢劫案发生

韶光易逝，我受委甲长已经一年多了。虽然精神上承担一定的压力。庆幸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事件，满以为不必杞人忧天自寻烦恼，谁料到祸事终于临头。

1935年春节，有一位来自外省的肩挑小贩到农村售卖女性用品如，针、线、化妆品兼收购鸡毛（俗称鸡毛客），在僻静地方被一个青年用柴刀抢劫。事后区公所报案，经过调查，该地区系属于我管辖之下，于是区公所令我该把该区所有青年召集到区公所，让受害人指认。结果被认出20多岁的许保虎，一个大好青年自毁前途，一失足成千古恨，殊为可惜。嫌凶在严刑拷打下终于招认。第二天即行枪决。

由于这样，我跟许保虎家属就结下梁子。更糟的是，许报虎堂兄许保举为该地一股土匪首领，

他恫言将对付我！导致我好长时间不敢回家！

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安全面对极大威胁，黑白两道均对我不利，处境危殆。大家认为我此地不宜久留，除了逃亡一途，别无选择！要逃吗？也无路可走。正在山穷水尽的当儿，想到一线生机！我还记得我有一位堂兄许保康居住在砂拉越诗巫。经过父母同意下，写信要求堂兄申请我来砂入境证。如果不是环境所迫，我父母绝对不会让我离开家乡。

老一辈人思想保守，认为离乡背井并不是光彩的事！

此项计划在高度保密下进行。大约经过了三个月，终于如愿以偿，接到了来砂的入境证，准备于1936年春节后动身。

当动身之前，造访长达六年来亦师亦友的陈、黄两兄。当时我情绪激动不能控制，不禁流泪，竟遭两兄疾言厉色的对待，说：“大男人流血不流泪，这是什么感情！我们关系到此为止。不许你对任何人透露，这样对你不利，也不许通讯，这样对你没有好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只要你坚持真理，天底下肯定有好人找你！记住，在群体生活中，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不走权贵之门，不交纨绔之友，能坚持这个原则，就不枉我们认识一场。

去吧，好自为之。”

人为感情的动物，我受他们教导，使我认识真理！毕生难忘。但愿两位吉人天相，能完成所负使命，幸运达到成功！为我所愿也！

奔向南洋

1936年春节，趁著大家热闹之时，我悄悄准备行程，在父母亲的允许下，洒泪拜别。母亲悲咽的说：“由儿，若不是形势所逼，我们绝不会让你离开！凡事小心自重！盼望局面转变时三年五载能够回乡照顾两老。”

这次行动完全保密以防万一，外人一概不知道，因而得以成功逃离潜伏的危机。我步行到村口时，面对漫山遍野的大雪白茫茫的一片，心中感触良多，不禁念出：

“可爱的故乡土地，你孕育我二十二载，今日离别了，不知有那一天能否重投您的怀抱！”

抵达南洋后，在1936年10月接读我父亲来信，他告诉我：“你的两位朋友数月前同时失踪，恐怕凶多吉少。如果你没有离开，恐怕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暂时千万不可贸然回乡，待时局平静时再行告知云云。”

造化弄人！不可思议，避难而逃亡，竟成为砂罗越的第二代移民！

我一生最感遗憾的是：在我父母疾病在床时，不能端一杯热水到他们床前。

思之痛断肝肠。

中国抗战时期的写照

有一个穷教员妻子死后，写了一副对联：

吃也愁，穿也愁，我苦死你；
子不顾，女不顾，你比我快活些。
这是向社会控诉 死人比活人更快活的血泪对
联！

投身砂罗越政治无怨尤

投奔南洋，我落地生根，先是成为砂罗越的公民，随著马来西亚的成立，我又成为马来西亚的公民。哺育我成人的中国只是我的故乡，不再成为我的祖国。

我在南洋，与其他华裔同胞一样，辛勤工作，娶妻生儿育女；但也有不一样，我胸中仍然燃烧著在中国时那两位好友撒下的火种，我不甘于明哲保身的生活，我追求新生，喜爱集体生活。这就使我无怨尤地参与了砂罗越的反殖反帝斗争。

1956年某一天，有个工友张浩义君（悦来公司推销员）约我到咖啡店，说是有部分工友（店员）提议组织一个工会。我满口赞成，边与一批要好的朋友商谈，大家分头去发动工友，不久便在诗巫客属公会召集座谈会，一致通过成立诗巫各业职工联合会。

第一任主席为蔡水通，秘书姚炳麟，执行秘书黄雅兴，我担任财政。

职工会成立后，领导工人展开许多活动，尤其是在第二届执委改选时，许多优秀的青年人参加职工会，带领工友们争取星期天休业和一年八天带薪假期，更使工运蓬勃发展起来，

1959年，人联党诗巫支部成立时，职工会绝大部分工友参加人联党为党员。

1962年12月8日汶莱事变，英殖民统治者趁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全砂进行大逮捕！首当其冲者为人联党以及工会。所有精英和积极分子数以千计的男女被“邀请”到古晋对面江的临时集中营“长期渡假”，我当时没有资格被“邀请”，才能够留下来。白色恐怖笼罩全砂，极度恐慌，草木皆兵，人人自危。左派政党人联党被视如“瘟神”一般，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在别有居心者的策划下，报章上退党人士日有所见，如某公会主席及财政，联名退党，除登报外，副本还寄给政治部。人联党诗巫支部几乎陷于瘫痪！

斯时也，我和存堆同志不忍坐视而不顾，认为不接手支部党的工作，如何对得起已身陷囹圄数以千计的男女同志。于是不顾自身安危，毅然挺身而出，以“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四大原则精神，接替诗巫支部工作，兼联络被拘留者家属，并适当照顾他们。

1963年5月诗巫市议会举行民选市议员。如果在平时举行，政党人员莫不争著出线。可是这一次，较忠厚老实者将政治视为畏途，没有人自动提名上阵。“识时务者为俊杰”也，目前不是时务，他们宁可明哲保身，看风驶舵；没诚意者我们又不放心；真正当仁不让者廖若晨星。于是我和存堆同志又忙著物色候选人上阵。可是这项工作并不顺利，所找对象有者一口拒绝，有者婉言推辞。最终我们认为还是劳动阶层适合，虽然有部分不懂英语，但他们有代表性，同时也比较单纯，立场较鲜明。当人联党十六位候选人名单公布时，竟惹来一些市民

的讥讽！不过当时，反殖反帝反大马是主流，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是支持人联党。投票结果，十六位候选人全部中选。我在南兰律上段第九区中选为市议员，后来由于局势关系，没有再举行市议员民选，我们这十六位议员的任期竟长达十八年。

在当选后，我以市议员身份，常常发表激烈的谈话，抨击当时砂州的联盟政府。因此，被诗巫政治部视为“颠覆份子”，受到严密监视，终于导致1968年被逮捕。在所谓公安法令下，被拘留于古晋六里集中营长达六年之久。直到1974年，斯里阿曼行动后才被释放回来！在被拘留期间，集中营曾经发生过好多次无限期绝食抗议斗争，由于我和来自泗里街的王世安老同志年纪比较大，营方恐怕老人不耐饥饿，便硬性将我们载往营内的诊疗所注射水针以延续生命！

在我被逮捕初期，关在诗巫。政治部惯于用“识时务者为俊杰”的理论来诱降，劝我放下对抗思想，做个俊杰，不必去古晋吃大锅饭...等等。

我顶咀说：“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俊杰’，有机会吃免费的大锅饭固所愿也！”气得那些官员骂我老顽固！我想起几十年前中国的那两个朋友说的“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不走权贵之门，不交纨绔之友”，我愿为人民利益，做个对得起自己良心的老顽固！

我，一个中国落后农村的儿子，能在当年成为砂罗越反殖反帝队伍中的一员，实不枉此生也！

（本文为年届87高龄的许保由老朋友所写，曾於2001年11月7日至8日，连载刊於《中华日报》。）



二000年一月一日诗巫友谊协会於诗巫乌也路二十四哩YMCA举办千禧年友谊生活营联欢晚会。当时已届86岁高龄的许保由老朋友仍关心朋友，关心会务，不顾自己身体不便，坚持参加了完整两天的大会、联欢会和座谈会。

上图示：友协顾问洪楚廷颁发敬老红包给许保由老朋友。

左起：许保由、王连贵、洪楚廷、杨祖华友。

许保由老朋友稍后发言说：“我希望，这不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种聚会。”

诗巫友协主席刘仁祥：“祝他长命百岁！”

我们大家都祝愿他下次再来参加盛会。



1965年許保由老友(前排中)在被捕前是詩巫各業職工會主席，職工會女籃球隊在公開賽中奪標時與球員、幹部合攝。



1967年，許保由老友(左一)陪同西馬反對黨社陣領袖陳志勤醫生夫婦(左二、三)訪問長屋。

编后话

《友谊丛书》之一《往事》和之二《林中猎奇》已於二〇〇〇年抄刊行。虽然文句表现朴素粗糙，但皆是以写实方式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或当时历史事实的某一方面)，和写出了同时代许多人的共同经历共同心声而引起共鸣，受欢迎。《往事》、《林中猎奇》初版各印1000本，迄今已几售完。

今年来许多老朋友继续热情地将旧著或新作寄来编委会。如今《友谊丛书》之三《悠悠岁月话当年》，也已编辑出版呈献给所有新、老朋友们。

由於各作者的各自所处历史条件，可能对某些事件皆有不同的看法，某些观点也可能不完全代表本编委的意见。本编委会为了反映当时历史的客观性(或局部的客观情况)，均予照原稿刊出(除个别会涉及纠纷者)，以供朋友们参考。

《友谊丛书》不仅是朋友们藉以回顾历史的园地，它也可反映对现实生活的看法，甚至对未来生活的展望。它也可包括多人合著或个人文集、诗集、摄影集，或长、中短篇小说集等。总之，应是多姿多彩，百花齐放。只有当更多朋友都来投稿之时，《友谊丛书》这个百花园地才能更为绚丽多彩。编委会同仁谨此祈望各地新老朋友们能在来年多多供稿，使我们的这个共同园地更为生色。

《友谊丛书》编委会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友谊丛书》之三
《悠悠岁月话当年》

出版：诗巫友谊协会
No. 31, Lanang Road,
96000 Sibu,
Sarawak, Malaysia.

印刷：诗巫联成印务公司

初版：2001年12月1日

定价：RM18.00

国际书号：983-40483-2-7

友谊丛书

1. 往事
2. 林中猎奇
3. 悠悠岁月话当年